

勤奋 严谨 求实 创新

# 壮医人

双月刊



建国70周年

## 我和我的祖国 特刊

2019年  
第3期  
总第77期



“建国七十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大学医学部离退休教职工用开拓与奉献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发展，用心血和汗水谱写了医学领域的光辉篇章。他们的经历和精神，是学校也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为此，医学部离退休工作处面向各单位征集离退休教职工回忆录，保留珍贵史料，记录岁月荣光，传承精神力量。

“读懂中国”：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拓展教育关工委工作平台，使更多的在校大学生进一步深刻感受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和伟大成就，教育部关工委开展“读懂中国”活动，让青年大学生面对面访谈学校“五老”人员（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医学部离退休工作处与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机关党委、产业、后勤、各学院和医院组织青年学生与亲身经历重大事件的本单位“五老”结对进行交流座谈，通过征文、微视频的形式，深入挖掘、记录、整理、展示、宣传“五老”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奋斗历程、感人事迹和真实感悟。

本期《北医人》杂志精心编辑了“建国70年”离退休教职工文章，和“读懂中国”青年学生访谈“五老”人员文章，以飨读者。

## ▶ 建国70年

### 03 ■ 人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

■ 文 /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李惠薪

### 09 ■ 我和祖国风雨同舟70年

■ 文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高伯山

### 11 ■ 风雨同行七十载，我与祖国共奋进

■ 文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孙立新

### 13 ■ 我和我的祖国

■ 文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徐晓明

### 15 ■ 用心守护，静待花开 ——记张绍荣老师的三院人生

■ 文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李惠杰

### 17 ■ 从干板照相室到现代化影像科

■ 文 /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张燕

### 19 ■ 缅怀我的导师——刘思职

■ 文 /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李刚

### 23 ■ 我与祖国共奋进：辉煌的年华，丰硕的成果

■ 文 / 北京大学药学院 郑俊华

### 27 ■ 我为何去护理学院

■ 文 /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洪黛玲

### 29 ■ 我与北医医史学科

■ 口述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程之范 整理 / 甄橙

### 35 ■ 感恩——纪念共和国成立70周年抒怀

■ 文 / 原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 李鹰

### 39 ■ 使用世界银行贷款，提高医学教育水平 ——北医使用世界银行贷款的历史回顾

■ 文 / 北京大学医药卫生分析中心 范宪周

### 42 ■ 七十弦歌

■ 文 / 北京大学医学部基建工程处 崔新东

### 45 ■ 一心跟党走，为祖国的富强奋斗终生

■ 文 / 原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李东方

### 49 ■ 不忘初心追日月，桃李芬芳耀余晖 ——访北大医院谢竹藩教授

■ 文 / 2014级临床八年制 马嘉翼、陈丹阳

## ▶ 读懂中国

### 51 ■ 世纪丰碑 与国同行 ——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冯传汉教授

■ 文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汪铁铮、王兵

### 53 ■ 半个多世纪的骨科情 ——记北医三院骨科第三代“掌门人”党耕町

■ 文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李危石、姜宇、赵昱暉

### 55 ■ “医”生之路，一生无悔 ——记北医三院郭静萱教授

■ 文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杭成文

### 57 ■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记职业病学家、医学教育家王世俊教授

■ 文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郑亦沐、赵赞梅

### 59 ■ 马大权教授访谈录

■ 文 / 2015级口腔医学本科生 陈一铭

### 61 ■ 荒芜中开拓，平凡中坚守 ——记为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奉献一生的侯沂教授

■ 文 /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博士生 郑苏丽

### 63 ■ 家国相连，守卫精神梦家园 ——访司法精神病学专家李从培

■ 文 /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唐雅静、孙秉玺、邵岩、张晓

### 65 ■ 责任与奉献 ——访儿童精神病学专家王玉凤

■ 文 /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钟苑心、罗翔升

### 67 ■ 知霍防祸，承任毓人 ——访流行病学专家魏承毓教授

■ 文 /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6级学生 王万洲

### 69 ■ 读懂中国 ——采访医学人文学院杨桂教授

■ 文 / 2017级医学英语本科生 曾治、熊华仪

北医人（双月刊）

刊名题词

韩启德

顾问

詹启敏 刘玉村

编委会主任

李文胜

主编

焦岩

编辑

朱树梅 孔凡红 王春虎

丁磊 李红 谷卫胜

贾春红 王雪 林军

白砚华 孙敏 王玉明

吕万良 王珣 郝卫东

陈丽颖 张进瑜 任国华

韩英红 甄娜 杨柳

雷宇 汪磊 郭静竹

胡春香 刘东明 张宏伟

张汉平 尹英 许秀菊

苏虹 刘靖 李晓霓

郎铁令 郭艾花 杨韶军

吕晓明 吴蕾 陈娟

王莹

责任编辑

徐璐

制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宣传部

编辑部地址

北京大学医学部

跃进厅445室

邮政编码 100191

联系电话 82801241

投稿邮箱

beiyiren2011@126.com

# 人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

■ 文 /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李惠薪



## 作者简介

李惠薪自1961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坚持临床工作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科教授。曾任北京市第五、六、七、八、九届政协委员，发表过20多篇医学论文，并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及多部医学专著的编写。1953年发表短篇小说《枣》，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坚持业余写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参加了第四、五、六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

晚唐诗人杜牧写的《汴河阻冻》：千里长河初冻时，玉珂瑶佩响参差。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

第三、四句，正是击中了人的内在细微变化，外表不显，恰如冰底之水，一去不回。在不知不觉中，我已过了八十二个春秋，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

## 0.2% 的勇气和希望

在我上中学时，就立下了宏愿，要当一名作家，而且付出了行动。我初中时就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描写我们自己的生活。

在一个严冬的清晨，我冒昧地敲响作家张天翼家的大门，就是这样，我第一次看见了张天翼老师。我用冻僵的手臂，费劲地从破书包里掏出了《春天的花朵》。

拿出这部小说厚厚的初稿时，我感到忐忑不安，因为它用蓝色的墨水，密密麻麻地写在了铅笔写过的习题纸上，虽然字写得还算工整。这是我第一次向我的文学老师，交上了自己的课余作业。他呢，从此也就承担起了批改我拙劣作文的义务。其实何止是教导我如何写文章，他对我一生如何做人，都起着关键性影响。

张老师对《春天的花朵》的评价是：

“你年龄还太小，不能驾驭这么多的材料。虽然有很多的情节是感人的，可你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它写成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但有些独立成章的可以优先发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帮我把书中的第四章《枣》，整理出来。是他告诉我，如何将文章抄写在稿纸上，如何写题目，如何标点符号……说老实话，比语文老师教的还要细致、具体、耐心。

《枣》这个短篇发表在《新观察》（1953年10月）上，因为小说中描写了，少先队员们热爱志愿军的赤诚之心，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远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叔叔们、戍守边疆的解放军战士们……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几百封信件。电台里不仅多次的全文广播了《枣》，还改编成了电视剧，出版了连环画的小人书……电台要我去讲话，报刊来找我采访，还要为我拍照，发文章，以备留档做资料。

这对于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孩子来说，真像看见了眼花缭乱的万花筒，被搞得心昏迷乱，飘飘然找不到北了。张老师早就预料到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为此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及时为我敲响了警钟。由于我们彼此都很忙，很难及时见面。他在信中，恰中要害的及时对我进行敲打。我把这些信件视为珍宝，在以后成长的道路上，起了指南针的作

用；它们对我来说又是一面光亮无瑕的镜子，使我警醒、清晰、真切地看见了真正的自己。

虽然经过10年动乱，几经查抄，甚至威逼利诱让我交出他写的信来，但我挺过来了，完整地保存下来。将它们写成了长篇纪实体的文学——《信札七封及其它》（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一书，并将他写给我的书信及一切文字材料，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高三毕业时，我面临着今后专业的选择。在我看来，学文当作家是必由之路。张老师一直是持反对态度，他谆谆告诫我：“你需要深入生活，了解生活，要有丰厚的生活基础。因此你要选择一个职业，有一技之长，作为深入生活的手段。切忌不要当空头的文学家。”于是，我决定弃文学医，那时我大姐已在北京医学院就读。再说，我最崇拜的俄罗斯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也是一名医生。当年的《中学教育》刊物上，曾发表了论述三好学生发展的专著，以我作为典型：文学有突出的表现，而其它各科也都能均衡发展。

1956年，我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青年创作者大会，是北京市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当时代表团中的成员有：刘绍棠、邵燕祥、李希凡、蓝翎、乔羽、柯岩、邓友梅、葛翠琳、王蒙、李学鳌、温承训等。十年后，我又参加了第二次全国青年创作者大会。

耗时一年多，长达20万字的长篇小说仅发表了4000字，如果仅就数字的加减法来讲，明显的是亏了，命中率只有0.2%。这好比播种了大面积的庄稼，到了收获的季节，虽说不是子粒未收吧，但也是所得无几的歉收年。可对我来讲，确是十分关键的一步，这0.2%给了我勇气，让我看到了希望！

母亲对此事做了极致的发挥，她说：“孩子，要记住：庄稼不收，年年种！”

这成了我业余写作的座右铭，让我亲身体验到了，持之以恒的真理。

建国十周年，我决定利用暑假去母亲的老家——白洋淀体验生活。那年，白洋淀里涨了大水，堤坝受到了威胁。我与水乡的老百姓们一样，风餐露宿在大堤上，经受雨水的拍打、蚊虫的叮咬、烈日的暴晒，不分昼夜地干着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洪水开始缓退，我才离开大堤。第一次外出体验生活的收获是，回京后，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白洋淀行》，也算是对于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吧！

## 鱼与熊掌

毕业时，校方将我列入可以搞基础的研究生名单中，颇受同学们的羡慕，甚至是嫉妒。我却毫不犹豫地找到校方的负责分配的领导，陈述了我的理由：“我既要当医生，又要兼业余写作，这样就不能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对国家是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讲，也不能发挥我的专长……”

应该讲我是十分幸运的，在那个时代，提倡党指向哪儿，就要奔向哪儿，要安心当一颗螺丝钉。不管我陈述的理由是否充分，领导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层层汇报，最后批准了我的要求，将我分配到北大医院。在医学院附属的六个医院中，北大医院最资深，不单科室配备齐全，设备精良，最占优势的是，知名教授云集。想搞临床的毕业生，最先向往的就是被分配到北大医院。

最初，我被分配在妇产科，上级大夫是严仁英主任。上班的第一天到产房报到。产房内没有一分一秒是安静的，不是“鬼哭”就是“狼嚎”，慢慢的无尽期的产程，需要耐心地等待那不紧不慢的宫缩，还要细心地观察产妇的，那不堪入目的痛

苦的表情。时常会有小家伙让我猝不及防，单方宣布“入世”。常常衣服连扣子都来不及扣，有时鞋也顾不上穿，推着产车，飞跑着进入产房。这是两条甚至是三条、四条人命的大事，谁敢保证不是一胞两胎、三胎……甚至更多。

我和产妇们共同挨过了，那痛苦、受煎熬的、难忍的漫长的时光，当她们沉浸在享受母爱的无比幸福时刻，我则是遭受着疲惫、乏力、耗竭的吞噬的侵扰之中。我觉得自己快要面临崩溃了，不得不再次向领导申诉：“妇产科只能接触人类的一半，她们是半边天。而我要了解整个的天！”

说实的，我从没有考虑过，我讲的理由是否充足、可信、有道理，而脑子里的唯一想法，必须尽快地逃出“火坑”。天公作美，内科有一名毕业生想到产科，院方为我们之间进行了“调整”。我如愿以偿了，从1961年进入了内科后，干到今天。这一干就是将近一个“甲子”了。

当我走进内科的那一瞬间，真有大舒一口气的感觉，终于圆了自己想当作家又要当医生的梦！我也深知医生与业余写作，就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样。经过认真的斟酌、考虑、权衡，我决定暂时放缓后者，当然不是放弃，这是缓兵之计。我既踏进了等级森严、考试频繁、淘汰无情的资深教学医院，不可能为我另立标准；也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尽力追赶上佼佼者的队伍。谈何容易啊！但我仍不放弃要仔细观察，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缜密思考，大量累积素材。因为我就置身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

## 认识生活、贴近生活、了解社会、拥抱世界

1964年，我在报纸上看到，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杨仁忠医生创造人

工喉的事迹，非常感人。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偷偷完成了一部五幕四场的话剧，定名为《放声歌唱》。

初稿写成送至北京市作协，有关领导看过后，认为剧本有基础，建议我到山东去体验生活，进一步丰富内容，完善提高剧本的水平。纸里包不住火，既要去济南，就必须将事情全盘托出。让我颇觉得意外的是，院方不仅慨然准假，而且答应报销旅差费用，真是令我喜出望外。市剧协将修改后的《放声歌唱》，组织了有关的剧作家、话剧演员、医生们进行了认真地讨论……但由于十年浩劫的开始，使我这个将要演出的剧本，顷刻间化为乌有了。

1964 年 10 月，我国在西北部地区，第一次爆炸原子弹。卫生部组织了医疗队，任务是测定原子弹爆炸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我乘上了奔赴大漠的火车，后又换乘敞篷大汽车。年三十晚上，我是在戈壁滩上，颠簸的敞篷大汽车上度过的。穿过人迹罕见的茫茫的沙海，强劲的大风将浓重的黄沙，劈头盖脸地向我们抛了过来。到了目的地后，我们一个个都成了“沙猴儿”了。

三个月后返京，我听到院方正在组织赴西双版纳的第一批医疗队，内科人选一直是悬而未决。去边疆医疗队，绝不是美差，这是难以定铎的主要原因。我静候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地考虑、思索、权衡后，决定毛遂自荐，主动请缨去西双版纳。

应该说，西双版纳留给我的一切都是和谐的、美好的、难忘的。咆哮的澜沧江、枝叶扶疏的油棕、高大茂密的椰林、挂着串串金灿灿果实的香蕉、还有那挺拔的剑似的长叶的菠萝……就连哈尼族用茅草达成的茅楼，也让我倍感亲切。当然生活中，也常常有不和谐的音符发生，那就是阶级斗争，无论在医疗队内或是在寨子中，都是永远离不开的话题。我开始构思要写一部描写医疗队的长篇小说，主人翁是一位年轻的女医生。那

是在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的时刻，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离经叛道的。为了避免凶猛的蚊虫叮咬，《澜沧江畔》的初稿大纲，是我匍匐在帐篷里，趴在竹楼的隔板上，借着手电筒的微光写出来的。

从西双版纳回京后，我为自己定下了硬任务，每天下班后，都必须至少完成 3000 字！节假日必须超额。这样历时 3 个多月，一部 30 多万字的小说的初稿，就完成了。在完善修改《澜》稿的过程中，张天翼老师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心、耐心和信心。对于脾气急躁的我来说，这种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的示范，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谁能预料《澜沧江畔》在正式出书前，竟历经了三年的磨难，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1974 年底，《北京少年》杂志有一个去山西吉县农村采访任务，主人翁是已故北京知青赵凤琴。稿子催得很紧，编辑部找到了我。我迅速地办理了一切采访的必要手续。吉县属于临汾专区，火车只通到临汾，去吉县要乘长途车，到赵凤琴插队的中垛塬则需要坐牛车。

采访工作很顺利，知青们和当地的乡亲都很配合，也十分热情。临走前的一晚，中垛塬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地面上积累了有一尺多厚。从吃过晚饭的农家走出来，只靠着手电筒的微弱的灯光。由于初来乍到，我这人又不记路，一脚踩空了，从一家窑洞的顶上，摔到了下一层的院子里，两者间的距离大约比两层楼还要高。我顿时觉得腰部疼痛难忍，挣扎着想站，却无法起来。脑子里立刻闪现出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念头：截瘫！

当地没有照 X 片的条件。应该感谢那些在中垛塬插队的北京知青们，他们将不能行动的我，用牛车拉出了中垛塬，亲自送上了临汾开往北京的火车。遗憾的是我没能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但那烙印在脑海中，浸渗在心扉中的情景，我永远都会铭记在心的。回到医院后，经 X 片证实为第 3、4 腰椎，被压缩了

1/3，成为不稳定性骨折，需要卧床休息半年。关于赵凤琴的稿子如期交到了编辑部，我是躺在床上，用了一周时间写成的，题目是《战火中永生》。谁知这场意外的事故，竟让我因病得福了。

病后恢复临床工作时，恰值医院成立了“特殊门诊”，病人大都是原在北京医院就诊的高级干部。其中大多数是由秦城监狱放出来的，经过长达数年的精神、肉体的折磨，成为这个门诊的主要的诊治对象。特殊门诊的设施比较齐全，病人也少些。领导照顾我，先到那儿工作一段时间，为投入紧张的临床工作作为过渡。

如果我不去特殊门诊，就没有近距离接触、结识、熟悉这些老干部的机会。他们都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知识渊博。特别要提及的是地质部长孙大光，他人长得高大、伟岸、矍铄、声音很宏亮，一派学者的风度。看病时，孙部长常常提及地质工作的艰苦和重要，遗憾的是并不为常人所了解，非常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到地质部门去接触他们、熟悉他们、了解它们、讴歌它们。当他知道我是业余作者后，诚恳、热情地邀请欢迎我去地质部门体验生活，并说他会尽一切可能地为我提供工作和生活的便利。这无形又向我打开了一扇通向地质工作人群的大门，扩大了我的眼界。

不久，孙部长的秘书找到了我，他向我介绍了西藏羊八井热田开发的情况。那时是处于初期阶段，地质部在那里竖起了一面藏、汉合编的旗帜——1243 钻井队。他问我愿不愿意去西藏采访，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在我看来是千载难逢的绝好的机会。我曾于 1978、1979 连续两次进藏，深入到海拔 4300 米的羊八井热田。这是与地质部门合作的开始，以后，我又去了攀枝花地区、东海勘探的平台、南海石油勘探队……每次回来都会有写作方面的收获。我陆续地发表和出版了描写地热的长篇小说：《热海欢歌》、《这里不是台风眼》、《秋帆远》，



还有数十篇散文：《藏北高原杜鹃红》、《天葬》等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我由衷地感谢这些为我提供认识生活、贴近生活、了解社会、拥抱世界的人们。

### 积攒时间的“悭吝人”

“在占有时间这个财富方面，我是一个捉襟见肘的乞丐，因此在花费每一分钟时，都必须是一个‘悭吝人’。”这是刊登在《解放军画报》(1985 年 11 月)上，我写的格言。这是我的生活的真实的写照。

既然是医生，就应当首先保证做好八小时内的工作，而有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可能还要拖班。这样我就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每当拿到新的一年的日历年时，首先注意那标有红字的公假有多少天，除将教学医院每年固定的三周假列入活动计划之内，还要用积攒的公假外出体验生活，这样不仅夜班要多值，节假日也要工作。

在我的记忆中，有关过节、过年的

印象十分淡漠。我就是发扬聚沙成塔积腋成裘的精神，在积攒时间，两次进藏，去东海、去攀枝花、去南海等地深入生活。为了能延长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我常常是在下夜班后起程。第二次进藏就是因为这样连续工作，下了拉萨的飞机，我就发生了严重的肺水肿。对于一名内科医生来讲，我深知这种疾病的严重性，在当时的医疗水平，病死率为 50%。

我非常欣赏数学家苏步青先生讲的“碎布头做衣裳”的妙论。整天的时间固然应该重视，可每时、每分、每秒都不应该被忽视。人的生命就是由这些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短暂的瞬间组成的。

上班时我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这基于我从事的人命关天的职业，不能有半点马虎。我这个人不惜力气，身体好，腿脚勤快，不管病房哪儿出了事情，我都会冲在前头。如果发现了疑难的或者有教训可以汲取的病例，我和住院医师们一起查找文献，翻阅医院中存档的老病例，总结其中存在的规律性的特征，写成论文发表。

1992 年，北京医学院校庆时，出版了一本“近年来学院及所属系统的教工们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摘要目录。我竟是呼吸内科发表论文数最多的，排在了第一位。

十年浩劫中，打乱了北京作协原有的专业作家的队伍，专业作家正在进行调整。当作协的党委书记和秘书长到我家来，正式地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婉转地回绝了。“小时候，有要当作家的梦想。干了二十多年的临床，对医生这个职业也很喜欢，而且有了很深的感情。就目前情况而言，两者兼顾我还能对付。”应该说市作协的领导们十分大度，并没有认为我不识抬举，而把我排斥在作协的活动之外，他们仍然为我提供学习的机会，并让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员的身份赴日本、菲律宾进行交流访问。这种机会就是专业作家也极难轮到的。

### never too old to learn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以汹涌澎湃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国内各

个角落，科技界首当其中。我身边有许多熟悉的人，通过各种渠道公派或是自费出国，涌向了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是美国，关于那里的各种说辞，已经灌满了我的耳朵。我要亲眼去看看。这只是一种热切的愿望、期盼，要想付诸实施，需要有一段漫长的、崎岖的甚至是艰辛的路要走。我深知这不同于以前的攒假，在国内体验生活。踏出国门，首先语言要有充分的准备。当然必要的物质基础，也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

当时我已是四十岁开外的人了，因为高中、大学学的都是俄语，我英语底子薄。可我知道秉烛读书为时不晚，关键在于持之以恒。我参加了医学院为在城里医学生办的英语学习班。乍一开始，我去上课十分不习惯。医学生们年轻，基础好，英语水平本身就高出我很多，反应也快，而且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们坐在一个课堂内。最初走进教室的门时，我必须克服自己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好虚荣的心理，但我依然硬着头皮迈过了这道坎儿，当了最年长的、学习基础最差的“老学生”。

我在课堂上，讲的第一句英文话就是：“never too old to learn!”意思是活到老，学到老。为了讲这句英语，我请教了不少的人，能者为师嘛！后经反复练习，虽然发音并不十分准确，但外籍老师听懂了，她热情地鼓励说：“很好！”

下班时间与上课时间间隔很近，我根本来不及吃饭，饿着肚子听课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到了严冬的数九天，真有一种饥寒交迫的感觉。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寒来暑往，我都坚持下来了，从不缺课。去美国的决心已定，我知道只参加业余的英语班学习远远不够，必须再上一个历时半年的脱产英语强化班，医院准备派出的人都有资格去培训。我曾正式不只一次地向领导提出培训申请，始终没有接到有关通知，直到发现有几个预备公派的人，都不来上班了。原来他们早就接到了入学考试的通知，

休假在家，为考试做准备。可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离培训班考试还有两天，不要说准备了，连考试资格都没有。我立即将自己出版过的作品搜集起来，装在大书包里，骑着自行车飞奔到医学院。我找到了办班的教务长，向他讲述了我要进英语口语班的理由：“我在临床工作二十多年了，我也很想了解当今美国的诊疗技术的新进展；同时我也是作家，从写作方面来讲，我要亲眼看看美国这个世界……是的，目前我尚没有接到对方寄来的邀请信，请相信我，一切都正在联系之中……”

教务长非常通情达理地解释说：“我了解你的情况，你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虽是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但也不能独断专行。我们研究后，再作决定！”

考试的前一天，我接到了正式的通知，可以参加考试，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考够了分数线，才能入学。我如愿以偿了。毕业时，外籍老师为我写了一份在班中独一无二的评语。“此学生进步很快，现在已能用英语表达抽象的概念。去英语国家，只要短期适应就能正常生活。”

这时恰好有一次出国的机会，对于我的英语水平进行了实际的检验。1987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应菲律宾作家协会的邀请，派代表团赴菲律宾访问。我有幸成为代表团的成员。英语是菲方的官方语言，由于代表团中仅有一名翻译，这样在与菲律宾作家进行交流时，就显得人手紧张。我主动地承担了译员的任务。

### 自费赴美进修：“拼搏”与“挣扎”

一位老朋友，原是IOWA大学的毕业生，她为我在IOWA大学的临床医院呼吸疾病部门，联系到了一个访问学者的名额。对方提出的条件是不提供资助，那就是意味着应该是我方公派。医院当

然不肯为我支出这笔费用。我做了认真地权衡，仔细地核算了去美国的一应开销，再检查自己的经济实力。我个人得出的结论是：“自费公派”。

我要自费赴美进修，母亲不单单在物质上要支持我，必须动用多年来家中省吃俭用的积蓄。我的母亲已年过八十几了，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我的远走高飞，会给她的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母亲一直为我打气，鼓励我，帮我做着行前的各种准备，就连针线包儿都帮我带上了。我曾想过，如果母亲不同意我去，即使稍稍给我一些暗示，我一定会毫无怨言地留下来。

在美国生活了近两年时间，白天在病房、实验室，晚上以“live in”的形式，住在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太太的家中，这样可以省去了在美国的最大的一笔开销——房租。代价是在下班后，帮她做一些家务：打扫卫生、倒垃圾、给狗洗澡……总之是一些杂事。夜间她如果发生突发事件，要及时与子女联系，也可以算是夜间的陪伴吧！周末，我要到已故律师的夫人安娜家中，料理三餐及她的生活。她已经过了九十岁。有时我还会去中国餐馆打工、到农场去摘草莓……

我常常想，从字面上看来，“拼搏”与“挣扎”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实际生活中，他们竟然扭绞在一起，难以区别开来。比如你尽管谙熟水性，可当你在进行一次超过自己的体力、耐力以至潜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泅渡时，这种体会就变得十分深刻了。水深浪急，当你搏击前进时，可以称之为搏斗或拼搏；如果强大的涌浪将你掀翻到了水底，你在拼命地挣脱出水面时，也可以理解为挣扎。甚至可以说是垂死挣扎，得胜了，依然可以前进，否则就会沉入水底……

在IOWA生活近两年的时间里，有了这样的感受。《流浪姐旅美打工记》就这样诞生了。而此书的开头几章，是



在IOWA的图书馆里写的。两年后，回国的路上，在旧金山停留期间，我也没有停笔。有些关心我的朋友问：“你去美国那么长时间，是否赚回了钱？”

如果仅就金钱方面来算加减法，我是彻底地赔了！但我完成了预设的任务，发表、出版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两部长篇小说：除《流浪姐旅美打工记》外，还有《梦断天堂》；中短篇小说集《海外学子心态录》，及数十篇散文、随笔，这都是可以量化的。可就认知世界、增长见识、开阔思路、拓展胸怀、广交朋友来讲，此一行的收获是巨大的，是无法用货币的单位和数字来衡量的，不论是人民币还是美元！

从国外回来的访问学者，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医院提供的一笔科研经费。我选定了军团菌这一课题。那时，在世界上这是一个刚刚发现不久的新病种，对于国内来讲，更是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1987年全国确诊的病人仅有10例。呼吸科虽有实验室，但却没有有关军团菌病检测所需要的设备和试剂。一切从零开

始，小至试管，大到冰箱……恒温器、试剂盒都要一一开出清单来，请设备处采购。这中间有许多扯皮的事情，而军团军病的高发季节是在夏、秋时节，如果错过了，这一年将变成了“蹉跎岁月”。

我深深感悟到了，科学与文学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属性。前者需要的是准确、严谨、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后者可以想象、演绎、发挥、任思绪驰骋，这样才更具有超前的浪漫主义的色彩。非常庆幸的事，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军团军的大战之前，我已经完成了《流浪姐旅美打工记》的创作，这应该理解为两者是不同阶段的战役。

我曾以《中国军团病的流行概况与临床特点》一文，投寄到世界第七届传染病大会，后被大会选中。我于1996年6月赴港，参加了世界第七届传染病大会，并在刊物上发表了。1996年赴香港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那就是香港面临着回归祖国。

人应该面对现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像以前的托钵僧一样，云游四海、浪

迹天涯，恐怕精神体力都难以支撑。应该感激张天翼老师远见卓识，从小就耳提面命地叮嘱我，让我从事一种有技能的工作。我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临床实践，对医生的职业也产生了感情。改革开放后，医药卫生界的变化，成了国民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也是社会舆情的焦点之一。庆幸的是我一直生活、工作、在这片沃土之中，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我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平日里看到的、听到的、觉察到的，会令我产生想把它们写成文字的冲动，希望有更多的人与我分享我的感悟。为此，我采用散文、随笔、短篇小说等短、平、快的形式，将他们记录下来。已经出版了两本文集：《冰底水》、《水长东》。现有第三部《东逝水》已完稿，正在联系出版中。

我深深地感觉到，人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自知在漫长的赛程中，我并非是捷足先登的领跑者，但我永远不会停下向前迈出的双脚，将永远置身于赛程中！

# 我和祖国风雨同舟 70 年

■ 文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高伯山



## 作者简介

高伯山，男，1941 年，生于河北省滦南县。  
1968 年毕业于南京铁道医学院，医疗系。  
毕业后，一直在铁路系统医疗机构参加临床工作。  
1985 年调入人民医院，从事核医学临床及教学工作。  
2006 年退休。

1941 年，我出生在河北。1949 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年，我来到了北京。伴随着开国大典的雄浑国歌，我开始了读书生活。

新中国的诞生使全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我们的国家经过多年的战乱，伤痕累累，百废待兴。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共产党毛主席为国家安全，为保住人民刚刚得到的胜利果实，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反击了帝国主义的侵朝战争。珍宝岛反击战、中印边界反击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保住了家园，人民过上了安详的生活。

当时，我的祖国一穷二白，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赢得了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大大改善。

我就是在这个环境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学习。红旗下长大的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医疗战线的战士，爱党，爱人民，爱国家。我遵照党的指示参加过巡回医疗队，到过祖国边疆，去过偏远的山区。艰苦的环境使我锻炼了意志，提高了技术。我始终怀着对国家的赤诚，对知识的追求和救死扶伤的梦想。风风雨雨的岁月，青葱的我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走过。

八十年代初，我才有幸正式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院先后送我到北京医院、北大医院、国外进修、学习，使我提高了业务水平，提高了思想觉悟，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全国人民怀着兴国的梦想。那时的我有着满腔的热情，有着充沛的精力和用不完的干劲。正是那时，我们的医院从白塔寺老院搬到扩建后的西直门的新院。我们扩大科室，壮大队伍，攻坚克难，培养大批年轻的学生，医院也进入了全市乃至全国高水平医疗行业之列。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人民医院经过了洗礼和锻炼，这是我们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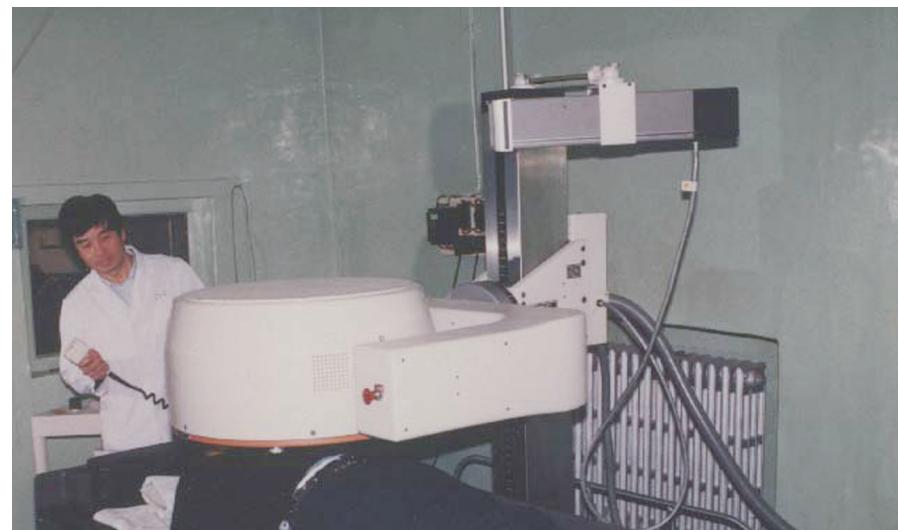


是人民医院给了我交流平台，是国家给了我施展的舞台，它像温床让我成长，它像雨露给我滋润，它像臂膀给我坚实的呵护。那是我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在人民医院我奏响了我人生的华彩乐章！

70 年的历程，共和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浩劫、经历了唐山大地震、“非典”、98 年抗洪，汶川地震等等，这里是我的家园，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和我热爱的医院和我爱恋的共和国，一起经历沟沟坎坎，走过泥泞，风霜雪雨。为了不变的追求，在岁月深处写下光辉，全景历史中浓缩复兴之历程。70 年的沧海桑田，几代人的奋斗，铸就出了祖国的辉煌。

共和国之恋中唱到：“晨曦里你拔地而起，我就在你的形象里。”如今我的祖国已是世界第二经济体，我们的高铁、大飞机、航天工程、天眼望远镜、深渊科研技术、航母都已在世界前茅。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的祖国已进入了新时代。

现在的我已经退休，过着幸福安逸的生活。托党的福，托伟大祖国的福，能与祖国风雨同舟 70 年，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我衷心的感谢这个时代，在我的祖国 70 岁华诞之际，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 风雨同行七十载，我与祖国共奋进

■ 文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孙立新



## 作者简介

孙立新，女，出生日期 1949 年 7 月 9 日，籍贯河北，1971 届工农兵学员，入读北京医学院医疗系，1974 年毕业留校分配于人民医院内科，历经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至退休。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作为一名五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此时此刻回忆与共和国同行 70 年的历程，不禁感慨万千。

小的时候，虽然不懂中国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什么，但是发自幼小心灵的真挚每日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上学后学习了各种知识，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会将共产党、毛主席视为“大救星”，也明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懂得了“没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闹革命，就不能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就不能过上没有剥削压迫，扬眉吐气的好日子”。

尽管那时年轻的共和国那么贫穷，但是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信心满满，始终坚信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人民群众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发扬吃苦耐劳，不惧千难万险甚至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在建设新中国的各条战线上努力奋斗。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几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就甩掉了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穷二白”的帽子。

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总是与饥饿相伴。那时正是赶上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不足，物资匮乏，买粮必须有粮票，买布得有布票……国家实行统一计划供给，定人定量，副食几乎没有，

只在过春节时才能给每人半斤花生二两瓜子。那时尽管生活过得清苦但是人们信念不变，没有攀比，没有斤斤计较，没有抢劫，没有黑社会。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全国人民一道过着清苦的日子，共渡难关没有特权。我们这一代人是吃苦长大的，吃苦锻炼了我们的筋骨，吃苦锤炼了我们的意志，吃苦更加让我们珍惜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没有经历过父辈遭受的兵荒马乱的战争，流离失所的逃亡，国破家亡的痛泣，妻离子散的悲哀。

记忆中，当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英明决策，将士们再苦再难也没有放弃原子弹的研发试验，当蘑菇云出现在西北大沙漠腹地罗布泊上空时，全世界惊呆了。新中国成立不久，贫困尚未摆脱，没有工业基础，没有技术，没有图纸，苏联专家的撤出，竟然搞出了原子弹！从此，中国一步迈进了世界核大国的门槛。西方列强惊诧得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他们明白了，中国人民对西方世界仰人鼻息的时代真的结束了，中国人民的腰杆子真的挺起来了，再也不会给他们肆意欺辱中国人民以任何机会了。中国人民真正的站起来了！现在回忆那时的欢乐情景仍然是心潮澎湃兴奋不已。当时身为中学生的自己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

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革前一年我已考入了部队院校，但是随着文革的到来，确实没能学到多少应学的专业知识。文革结束后，我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从部队来到了北京医学院，进入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虽然我和我的同学们没有经过传统的高考就进入了大学校门，虽然与当时上山下乡的同龄人相比我们是那么的幸运，但是“幸运儿”并非“天之骄子”，我们每个同学都明白，这不是来高等学府镀金的，我们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及原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殷切期望，他们期待着我们学成回去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尽管我们都是全国各地各单位选拔上来的基层医务人员，但不可否认的是基础底子薄弱，水平参差不齐，没有合适的教材却又担负着“教学改革”的任务。可想而知，那时各课的老师肩上的担子有多么重，压力有多么大，况且还要时时避开“左”的风头。回想这些，对老师们当时为我们的付出由衷的感谢。自知短板的我们更加努力，更加自觉的学习，要求自己一定要千方百计多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因为我们毕竟在基层卫生单位工作过，有一些粗浅的实践经历，知道基层需要什么。没有外语书籍，我们就从旧书摊上买，当时北医校园内的小马路旁经常有人摆旧书摊，那是我必经之路，也是必定要浏览之处。各位带教老师也给予我们极大的鼓励，同时，同学们那种吃苦耐劳、质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品质也使老师们深受感动。

在校期间，学校组织同学们进行拉练，老师们带着我们下乡教学，与基层老百姓密切接触，在服务中学习。这种学习方式是好还是不好，我不会评论，但有一点是，我们至今都不会忘记生我们养育我们的父老乡亲。由于同学们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任务——学成后回去为人民服务。没有同学会逃课，上课打瞌睡，甚至谈情说爱，只会嫌老师讲的还少，希望多听多记多学。尊师重教渴望学习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因此，毕

业后为数不多的留校同学被分配在当时极其缺少人手的基础部或各附属医院的临床科室后，都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做好每一项工作，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中就没有受过名利思想，个人利益至上的熏陶。既使已经毕业，我们仍在实践中自觉的充实自己，努力跟上医学进展的步伐，甚至退休后仍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发挥着余热。因为我们深知，自己掌握的一点为病人服务的知识和技能是祖国人民给予的。

回忆 70 年来的成长经历，我深深的懂得，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党的教育，人民的哺育，祖国的培养。我为生长在社会主义伟大新时代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尽管我们是幸运的，但我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付与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与嘱托，我们永远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时代在前进，祖国在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前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了江山，后辈的建设者们如何继承革命斗志，传承革命精神，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紧跟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使十四亿中国人民全都过上小康的生活而努力。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全国人民奔小康的极大热情，各行各业都有了空前的大发展，尤其是高科技、航天、深潜、超级计算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天眼、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国防事业的诸多功绩、“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不胜枚举。短短四十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无数事实再次证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祖国才能强盛，人民才有幸福的生活。毋庸置疑，祖国的强大、人民幸福的生活是靠党领导着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扎扎实实练内功、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十几亿中国人民奔小康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祖国的大好形势也促使医疗卫生事业良好发展，北医的发展就是一个缩影，

人民医院也惠在其中。目睹医院的巨大变化，作为员工感受很深。这些年，不仅面积在扩大，科室增加了很多科研力量，临床一线的诊疗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在全国乃至世界卫生事业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老年科的一各普通医师，我也曾经历了创建科室的艰辛，没有足够的人手，病房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作为一各共产党员，我除了完成门诊的诊疗工作，主动请缨去病房值夜班，甚至不分一，二，三线，哪线缺值班就去顶哪一线的夜班，直至陆陆续续毕业生的到来。回顾几十年来在为病人服务的一线工作岗位上，我处理过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从中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同时也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和病人的认可。我无愧于党对自己多年的教育与培养。

在人民医院的 40 年工作生涯中，我带过教学，参加过唐山地震医疗队，经历过“非典”，自己由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小小学员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白衣战士，把自己的青春和一腔热血全部奉献给了为病患服务的一线工作上，此生无悔。我由衷的感谢党对我的教育，由衷的感谢祖国人民对我的培养。虽然我已至暮年，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余生不忘初心，势必砥砺前行！



# 我和我的祖国

■ 文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徐晓明



## 作者简介

徐晓明，出生年月：1953年10月28日。籍贯：河北省枣强县。于1969年12月入伍在武汉军区总医院工作，1976年3月退伍后在武汉市结防所任护士工作。1992年正式调入原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在泌尿外科碎石研究所任技术员、技师。1994年调入该院设备处，负责医院设备固定资产账目管理和高值耗材账目管理，2008年10月退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努力下，在无数仁人志士百折不屈的斗争中诞生了。她结束了百年来被蹂躏奴役、分割统治的局面，结束了国家长期以来社会动荡、人民流离、民族纷争、外敌侵犯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响亮的名字，终于让她的儿女们昂起了头，骄傲地在自己的祖国开始了宁静祥和、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年，我们这一代人被称作是“解放牌”，没有经历过战火的硝烟，是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我们的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期沐浴着祖国的阳光健康成长，无忧无虑、幸福快乐。

新中国刚刚建立时一穷二白，是一个没有石油、没有大型工业，连火柴和铁钉都生产不出来的国家。老一辈人可能都还记得那时的火柴叫“洋火”，汽油叫“洋油”，北京的大街上跑着的公共汽车背上背一个大袋子。那时90%以上的中国人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寿命只有35岁。可是在某些国家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看看我们的共和国自力更生做出的成绩吧。

六十年代，我们的科学家，啃着窝头咸菜，在西北大漠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七十年代，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枚洲

际导弹。两弹一星的拥有，让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立刻提高了一大步。1965年，我们的科学家研制成功人工合成胰岛素。1971年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下水。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1978年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

到1975年，中国人90%以上接受了初等以上文化教育，那时的人均寿命就达到了65岁。国家的兴旺发达也带来了每个单位和个人的幸福。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变化，无论从工业、农业、经济上和国防科技上各方面都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衣、食、住、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是只讲吃饱穿暖而是讲究美食，衣着光鲜靓丽，住房不是只要有遮风挡雨的小屋而是居住宽敞明亮环境优美，高铁的快速发展让中国人走遍天下，坐飞机出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中国人正迈着大步奔向小康。

我们的蛟龙探海、嫦娥奔月已不是科幻片，我们的第二艘自己设计制造的航母即将下水，第三艘第四艘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加入人民海军，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成批生产喷气歼击机的国家之一。我们拥有的东风系列导弹包括近程、中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国产大飞机C919翱翔在祖国的蓝天。国力的增强，军力的强大让我们的祖国更

加坚定地屹立在世界东方。

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达到了75岁，在一些地区甚至已经达到80岁以上。今天的中国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每到节假日各个景区满是幸福的人们，出国旅游也不再是少数经济条件优越的人享有的。通讯交流的便捷和顺畅让许多外国人羡慕，如今走到哪里没带钱不要紧只要带着手机，微信支付、支付宝的快捷支付都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一部手机全世界的各种商品都可以买到，物流的发展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任何心仪的商品。

我从1969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部队医院工作，从那时起我的工作就离不开医院了，我到人民医院的时间不长但也是亲眼目睹了医院的发展和变化。

刚到人民医院就有幸在西直门新院区工作，崭新的病房大楼，宽敞明亮的病区和工作环境令人心旷神怡，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据老同事们回忆原先的白塔寺老院区因为建院时间早又经历过战乱，病房楼已经很陈旧，设备也是破烂不堪，床位少、医疗条件差根本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病人需求。在老院长及全院职工的努力下和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新的医院大楼终于在西直门破土动工了，五年之后一座崭新的人

民医院矗立在西直门立交桥的西南角。从此人民医院以飞快的速度迅速发展为集医、教、研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医院。

1994年我调入人民医院设备处工作，负责管理医院医疗设备固定资产账目。那时800元以上的设备光账本就有9大本，每一笔账都要用手工写入账本，每月的报表和年终数据统计也是用小计算器一点一点算出来的。1996年医院建立了信息中心，所有医疗、后勤管理都存入了计算机，每笔账目只需录入计算机，报表和年终数据统计打开计算机一敲键盘就都自动生成了，医院的信息联网让所有的工作都快捷方便，从那时起医院正式进入了信息化管理。

去年我们刚刚庆祝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建院一百周年，有着深远历史的人民医院如今已是在全国名列前茅的集科研医疗为一体的综合医院，不久我们的通州院区，西二旗院区也即将开业。在为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患者服务上，医院加强了各方面的管理和建设。全院职工始终是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衷，秉承着“仁恕博爱、聪明精微、廉洁醇良”的院训，人民医院也随着祖国的发展而发展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出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这说明祖国要发展但是不能建立在盲目的破坏生态浪费资源上，既要发展又要让人民群众有充分的幸福感，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碧水蓝天的美好家园。

70年来祖国以飞快的速度蓬勃发展，与共和国一同诞生一同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最有发言权，如今无论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还是海外的游子，当耳畔传来“中国”这两个字，不约而同的会想起祖国那高山大川、江河湖海、乡音乡情、家乡的美食美味。

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每天播出音乐MV——祖国各地，在机场、火车站、著名景区黄鹤楼、长沙橘子洲头等，到处都响起“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依偎在你的心窝。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每当听到这里，我和现场的人们一样心情激荡，热泪涌出眼眶。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走过了七十年，即将迎来祖国七十周年华诞，跟随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在祖国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我要大声的说一句：我爱你中国！



# 用心守护，静待花开

## ——记张绍荣老师的三院人生

■ 文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李惠杰



### 人物简介

张绍荣，1940年1月8日出生于北京市，副主任护师，1958年毕业于北京市第一护士学校，同年分配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工作。来院后，参加建院劳动、筹建病房。1960年始任病房护长，作为基层护理管理者，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了护理团队急救能力、护士观察病情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显著提升了医护配合的效果，1960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集体”。1984年始任护理部副主任、主任，履职期间工作重点是在全院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信息化的管理，重视了人才的培养和护理教学工作。1987年始任中华护理学会理事，任职期间努力推动院际经验交流，承担部分科普知识的撰写及审稿工作。

迈入医学这个神圣的事业，我是骄傲的，是激动的，是热爱的，更是小心翼翼的。作为一名三院人，我很感恩，感恩命运，让我从事医学事业，做一名白衣天使，救死扶伤，除病人之痛苦，焕健康之幸福。我很有幸在入职一个月后听到建院老前辈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她的话一遍一遍回想在我脑海里，让我不断温先辈之路，感恩前行。她奉献的是丝丝温情，暖暖关爱，滴滴汗水，份份真情；奉献的是最宝贵的青春，换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健康。她就是我们三院护理人的榜样和领路人张绍荣老前辈。

现年78岁的前护理部主任张绍荣老师，是北医三院第一批建设者与护理人才，从一名普通的护士到护士长，再到护理部主任，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了过来。她无愧于自己所钟爱的护理事业，因为她对护理事业的挚爱和执着；因为她无私的奉献和爱心；因为人们对她的尊敬和赞扬！作为榜样和领路人，张绍荣老师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大学医学部“终生护理成就奖”，她所在病房被评为北京市“共产主义先进病房”。她把自己全部的爱给予了患者，把自己的全部的精力奉献在了三院。

六十年前的北医三院，周围还是一片旷野，院内各种设施建设都不齐全，甚至连病房都没有。在当时院领导的带领下，张绍荣老师和同事们作为第一批建设者开始参加建院劳动和病房的筹建，安装病床，修理水电，种树除草……三院的每一个角落，都滴撒着她的汗水，

瘦弱的肩膀可以挑起几十斤的担子，可是当时年轻的她并不觉得建院劳动很辛苦，反而觉得这样的劳动锻炼了她的体能与毅力，从开始的步步维艰到后期的健步如飞，她逐渐成为一个“铁姑娘”。

经过半年多的建院劳动，北医三院初具规模，成为当时在北京市有名的花园式医院，引得不少同行前来参观学习。可以骄傲地说，是张绍荣主任和她的团队的努力和汗水，奉献和付出让今天的三院更加美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三院人，我也一定会遵守规章制度，规范操作流程，不简化，不违规，真真正正从病人的角度出发，把生命之光再次点燃，因为用生命呵护的生命，显得高贵而又无比坚强。张主任讲过，不仅要有崇高的品德，无私奉献的精神，更要领悟到护理的精髓，理解救死扶伤的含义，提高自己的操作水平，操作技能，用扎实的基础知识，专业的护理技能去慰藉天下绝望的灵魂。

张主任说过，护士工作可能忙到一天都没空坐下，连水也顾不上喝，面对多重性格的患者，面对急晕了头的病人，面对不理解的患者，会有委屈，会有眼泪，但是，护士工作是平凡而伟大的，唯有用崇高的职业道德，博大的情怀才可以感化病人，理解病人之痛苦，满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无私心地工作。南丁格尔曾说过：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

作为一名三院人，在三院不仅精炼了操作，更增长了知识，发挥了特长，专业，温馨，尊重，成长。每次大手术前医生会为我们讲解手术的基本过程及围术期的主要问题和注意事项，每周一次医护大交班，可以更好的向医生请教自己不懂的问题。经过每天一次的小讲课学习与每周一次的医护交班学习，在基础护理技术操作与理论知识两方面都会有很大的进步，收获颇丰，让我不再是一个懵懂的小护士，同时也能够做到及时解决病人需求、解答病人问题，大大提高了医护配合的效果。张主任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不是蛮干，而是理论联系实际；不仅知道怎么做，更学会了为什么；不仅拉近了医生和护士的距离，也更好的加强了医护合作，更增添了彼此的一份儿默契，病人也就又多了一份安全。

有一种关爱是无私的，有一种爱是伟大的，有一种奉献是平凡的，张主任的精神不断感染着我，在情感的沼泽地面前，张主任不仅能做到关爱病人，带给患者摆脱病魔的勇气和一份生存的基本需要，用医学知识为患者补充疾病康复的健康指导，更懂得关爱同事，关爱下属，做一个有担当，有爱，有责任的好领导，做为当今三院护理人，我也一定会努力领悟护理的真谛，在琐碎而又繁杂，艰辛而又充满挑战的护理工作中正视平凡，做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做一名被需要的护理人，做一名领导眼中的好下属，同事眼中的好搭档，病人眼中的好护士。



今日的三院，得益于像张绍荣先辈这样老一辈人才的奉献与付出，在先辈的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护理人的踏实、奋进、无私与专业。在护理岗位上，她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更值得我们学习，张主任说：“人一生从出生到去世都离不开护士，护士是个为他人解忧、创造幸福的职业，我们护士要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做受人尊重的护士。”

她对护士职业的深刻理解，让我体会到一名护士的光荣价值与使命责任，感恩命运让我成为一名护士，成为一名可以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新的三院护理人，我们一定要像张绍荣先辈一样，心系患者，做病人眼中的好护士，情系事业，做领导眼中的好员工，关心同事，做同事眼中的好姐妹，温先辈之路，感恩前行。

# 从干板照相室到现代化影像科

■ 文 /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张燕



## 作者简介

张燕，女。1980年5月毕业于北京卫校放射诊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肿瘤医院前身、北京肿瘤防治研究所干板照相室工作至2012年退休。

影像科的前身是干板照相室。八十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影像科一穷二黑，穷得只有一台干板照相机，所见之处都被干板的成像物——碳粉污染得黑黢黢的。全科六七个人，我正赶上研制干板照相机的尾声。

在我工作之前，影像科没有科班出身者。大夫是文革时期下放劳动，脱离正规的临床实践多年，落实政策后回来的，技术员有些是护校毕业的护士，还有一些是由师傅带出来的熟练工。

我作为放射专科的毕业生，在老师和病人们期望赞许的目光中，踌躇满志地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干板是相对湿板而言，不用水洗照片而俗称干板。在胶片匮乏的年代聊胜于无，就好比饥荒时树皮也有人吃。

干板照相机的原理和复印机一样，只是光源不同，一个是X光，一个是可见光。它性能极不稳定还污染环境。成像部件是硒板，复印机里是硒鼓，冷了不行热了也不行。雨天得用电炉祛湿，风天得洒水润燥。可气的是没有规律可言，昨天因为潮湿烤得我满头大汗，今天精心伺候到昨日的湿度又转印不全。傻大憨粗的黑李逵，却有着盖过了林妹妹的矫情脾气，难以琢磨让人抓狂。

自动扫板扫不干净，每照完一个病

人都要用脱脂棉手工擦拭硒板，再怎么小心也会弄脏手，黑黑的指甲缝儿成了干板人的手饰。擦板的时候望着布满齿轮和电线的黑洞，手伸进去都是战战兢兢的犹如虎口拔牙，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电着、被机器转起来绞着。害得我上班的路上就紧张，心里总是不住地暗暗祈祷：拜托拜托今天机器可别出什么幺蛾子。我太怕那样一种情形了：病人奔着高科技在门外排队翘首以待，门里哥儿几个对着机器绞尽脑汁无计可施。

那时照乳腺相是病人躺着照，抱着病人庞大的身躯把乳腺摆放在硒板上，再把X光的管球对准乳腺照。遇到胖点儿的、不太灵活的病人干脆就得当搬运工，属于重体力劳动。夹乳腺的夹子是两块透明的有机玻璃板，夹住乳腺用尼龙绳绑紧，干不了多一会儿绳子就把我的手指勒开金鱼嘴般的血口子，伸手能打一名著——《红与黑》。一上午照二十个病人就累惨了。

好不容易一张片子出来了，得拿在电炉上烤，为的是让碳粉里的胶粒受热融化达到固像的目的。稍微离电炉近了点儿片子就糊了，糊了的片子发黄、脆性加大无法长期保存就得重照，一天不知要多少次捶胸顿足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烤片子的过程有刺鼻的浓烟相伴，

吸进呼吸道，擤鼻涕咳嗽出来的分泌物都是黑的。时间久了，烟雾沉积在诊室的每一个角落，因为有胶还擦不掉，整日被黑色恐怖笼罩着。

这样的机器在闭关锁国的年代还获得了北京市科委的科技进步奖真让人啼笑皆非！改革开放后，发达国家的乳腺片让我们眼前一亮，照片清晰度高，外行都能看明白肿块形态，不淘汰干板怎能振翅高飞？！

我们倾尽所有买了一台西门子的乳腺机，开辟出一间照相室，配上空调，工作环境宽敞舒适。机器性能稳定，操作简便自如，病人站着照相便于移动，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劳动强度。乳腺照相从青铜器时代一大步跨入了现代。在干净整洁又恒温的机房里，轻松自如地操作机器，一上午检查三四十人不在话下。

乳腺机成了影像科的奠基石，九五年建院的时候，放射科的机器都是从美国买的二手货，只有一台乳腺机是新的。

经过二十年的打拼，病人每年百分之二十多的递增，我们的家底儿逐渐厚实了起来，如今的放射科早已鸟枪换炮：核磁三台，CT三台，钼靶乳腺机两台、胃肠机一台、DR（数字摄影机）两台、移动DR两台，科室壮大到七十人，大多数还是硕士博士。原来的西侧楼道放不下这么多机器，在后院的地下开辟出3740平米的医学影像科，窗明几净的工作环境就不用说了，先进机器为肿瘤病人的治疗提供精准的定位定性诊断，大幅度地提高肿瘤的治愈率才不辱影像学的使命！

我，曾经的放射专科毕业生搁现在就是一白丁儿，除了解剖、生理还支撑着医学基础，放射方面的知识已经完全被颠覆，胶片时代一去不复返，暗室技术早被扔到了太平洋里。

我见证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现在我作为三十多年的老放射回科参观，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只剩目不暇接啧啧称奇的份儿了。



# 缅怀我的导师——刘思职

文 /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李刚



## 作者简介

李刚，1952 年出生，籍贯陕西。1981 年北京医学院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导师刘思职教授和杜国光教授。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生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主任助理和深圳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当我第一次听到学术泰斗刘思职的名字时，他就象天边的一颗闪烁的星星，离我是那么的遥远。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末期，犹如吞噬万物的海啸潮水开始逐渐褪去，革故鼎新，百废待举。1978 年我参加了刚刚恢复不久的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前的准备阶段，我开始收集资料和查找选考学校。

那个时期能够收集的资料寥寥无几、十分有限。张昌颖主编的《生物化学》（1978 年第二版）当时还没出版，手头能够参考的资料是，1977 年北京医学院生化教研组编写的肿瘤学习班进修生学习资料。

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我经常到图书馆去查找。西安医学院的图书馆经过文革已经没有什么人去光顾了，我在尘封的书架上一本一本地去翻腾，老天不负有心人，我最终找到的一本 1954 年刘思职主编的《生物化学大纲》。我手捧着这破旧泛黄满是灰尘的书如获至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思职的名字。

我当时并不知道刘思职是谁，就去问学校的老教师，无论哪个专业的老教师们似乎都知道这个名字，从他们的介

绍中我也就对刘思职有了初步印象。

刘思职是北京医学院生化教研室主任，1929 年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大学，他是中国生物化学和免疫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先驱者，1957 年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他对生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是与吴宪一起创立了蛋白质变性学说，该理论从此进入国内外教科书至今。

我们西安医学院许多老教师当年都聆听过刘思职的授课，凡听过他讲课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美誉称赞，说他讲课从没有多余的话，有条有理版书工整，下课铃一响刚好讲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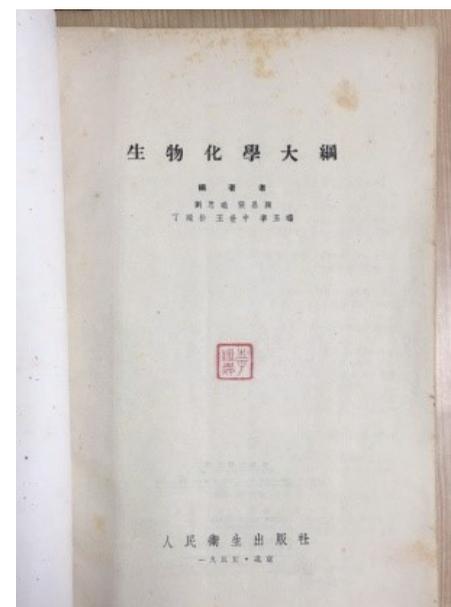
哇，这么一位伟大的学者对我产生了巨大诱惑力，我暗自下定决心去报考北京医学院的生化研究生。当时幼稚的想法是希望能到北医目睹大师一面，如此则此生足矣。

作为文化大革命无数不幸社会弃儿之一，我又有幸成为不幸中的幸运儿之一，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在 1979 年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生化研究生。生化专业当年共招收了 8 名研究生，按岁数排下来他们是贾弘褪、杨世欣、侯伟敏、白若力、王新民、曹西南、李刚和王苏。按招生章程上规定，我们 8 个人是一个

研究生小组，只学习理论课程，不需做实验，学习通过考试后即获得硕士学位。

进到北医后逐渐了解生化教研室的一些情况，当时生化教研室共有三位教授，他们是刘思职、张昌颖和丁延祚。还有四位讲师，他们是陈明、张迺衡、董苍玉和梁康。助教有杜国光、童坦君、张家萍、周爱儒、顾文霞、张宗玉、黄宝珊、李敏媛，这些助教以后都成为国内著名学者，其中童坦君被选为科学院院士。当时教研组最高称谓是“大夫”，能称的上“大夫”的只有刘思职和张昌颖两位教授。丁延祚和四大讲师是“先生”，其余都是“老师”。之所以称刘思职和张昌颖为“刘大夫”和“张大夫”，那是因为解放前他们都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那时就称他们为“大夫”。丁先生因身体不好，我在北医两年多期间我只见过他一次。他因腿脚无法上楼，那次他来教研室还是我们几个学生用藤椅把他抬上楼的。刘大夫身体更差，自我进教研室后他就没来过单位直至去世，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没有见过他。

1979 年底学校突然修改规定，我们也要经过科研实验过程，并通过论文答辩才能获得学位。因此我们每个研究生都分配到各个导师名下，非常幸运的是，我居



然被分配到刘大夫名下，他成了我研究生的导师，我当时心里激动溢于言表，但又感觉巨大的压力。刘思职的实验室在生化楼 237 房间，这个实验室也是我后来工作的场所直到退休。辅助刘大夫指导我实验的是杜国光老师，杜老师在五十年代也是刘大夫的学生，也有着非常坎坷的人生经历，他早我一年于 1978 年刚从下放十年的农村返回北医重新工作。当时社会上正在上映一部印度故事片“流浪者”，其中拉兹的一句名言“yes boss”在同学中广为流传，此后大家私下里都称导师为“老板”。现在老板这个称呼早已经成为学生对导师的通称，不带有任何贬义，所以我从此就有了一个大老板和一个二老板。

当时我的实验工作完全是由杜老师指导，在随后工作的交谈中，我逐渐对大老板有了一些更多的认识。

刘思职，福建仙游人，1904 年出生，1929 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1930—1942 年期间应聘到北平协和医学院，1942 年开始执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刘思职在协和医学院任教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作为我国卓越的生物化学家吴宪教授的助手，在吴宪实验室从事生物化学和免疫化学教学与研究。他在吴宪教授直接指导下，进行蛋白质变性的实验研究。他是“蛋白质变性学说”实验的主要完成者，为吴宪“蛋白质变性学说”提供了实验基础。

1949 年解放前夕，刘思职完全可以离开中国到海外去，他曾说：“北京解放前夕，为了动员我走，他们送来了飞机票，但我深信我的事业在祖国。使生物化学这门学科根植中华、根深叶茂是我的宿愿，我愿为此竭尽全力。我毅然留了下来，迎接北京的解放！”

解放后刘思职先后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理学杂志》和《科学文摘·生化与营养》主编。

1950 年代前，中国不仅没有一本用

自己的文字编著的生物化学教科书，即使一套完整的生物化学中文名词也付阙如。有鉴于此，在抗战胜利后，刘思职曾组织部分生物化学学者讨论生物化学名词的中文稿，这遭到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原燕京大学美籍教授窦维廉（W.H.Adolph）的反对，窦维廉认为这样做是脱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中心任务。直到 1950 年初，刘思职才有可能邀请几位同道专家开始编译生物化学有关名词。他们将名词草案分送全国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后，终于拟订成一部比较系统的《生物化学名词草案》。该草案不久为全国采用，统一了全国的生物化学名词，并给以后的生物化学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54 年他与其他几位教授编写的《生物化学大纲》，这是我国第一部自编的中文生物化学教科书，全书 70 万字，内容丰富，取材新颖，条理分明，逻辑性强。该书一改过去科技教科书完全照搬外国教材的惯例，具有我国自己的特色。刘思职讲课效果之佳，有口皆碑，这是因为他备课极其认真负责，他的讲授原则是考虑什么可以不讲，从而使内容更加精练。他很欣赏清代袁枚所著“厨者王四余传”中所说的“一肴上，则吾之心腹肾肠亦与俱上”，他认为这与他讲课时的心情同出一辙，玩味起来是何等生动令人陶醉啊。一个学者，能够使其教学与情趣融为一体，将此感受升华到了如此境界，就像武林高手将武功练到了无出其右、登峰造极的最顶级。他在讲台上总是意气风发，严肃认真，条理清楚，没有废话，逻辑性强，注重启发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吸引了全体听课学生，使他们精神高度集中。

他曾饶有趣味地形容生化代谢特点：生者化，化又生，生化即化生；新则陈，陈乃谢，新陈恒代谢；横批是：动态平衡。听他的课不仅能激励大家对生物化学学科的兴趣，而且还是一堂美的享受。他的教学风格和重视教学、热爱教学的思

想，对中国生物化学界和教育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刘思职院士一生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蛋白质化学研究，他在蛋白质变性和免疫化学理论上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我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二件是著书从教，呕心沥血，桃李成行，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刘思职治学严谨，在科学研究上鼓励晚辈要做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要有胆识，敢于向科学的高度和深度进军，告诫他们切忌目光短浅，对突破重大课题缺乏信心，老是怕近期出不了成果会影响自己的“前程”；而是首先要以发展中华生物化学为己任。他在实验中一丝不苟，未经他亲自过手过目的结果，他对之总是持慎重态度。刘思职提倡尊师重道，教学相长，团结同道，为生物化学根植中华辛勤耕耘。

如今，刘思职桃李成行，人才辈出，在当年曾受教于他的教师、研究生、学生中，有张树政、周同惠、李载平、张友尚、巴德年和童坦君等，都已是学有所成的院士。

然而，这样一位功绩卓著的科学家后半生却是命运坎坷，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上世纪 50 年代被打成右派。据说可能的原因是在 1948 年，以胡适为首 16 名北京知名教授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解放军不要进北京城。这 16 名教授中有刘思职的名字。真实情况是刘大夫当时根本不知道此事，是别人冒用了他的名字。但在此后却成为罪状之一被打成了右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此毁掉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后半生，令人唏嘘感叹。在特定的年代中有时黑白是分不清楚的，分的清也说不清。

刘大夫虽然是我的第一导师，但他长期疾病缠身，不能到实验室来。所以在进入北医后的前两年我一直未能与刘大夫谋面，每次都是杜老师拿着我的实验数据到刘大夫家或病房向他汇报。第二年实验终于有了好的进展，



左起杜国光老师、刘思职院士、作者

我斗胆向杜老师提出能否带我去见刘大夫，杜老师在征得刘大夫的同意下终于如愿。

一天，杜老师领我到北大医院病房，终于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刘大夫，这是我见刘大夫的第一面。刘大夫躺在病床上，看上去面容憔悴清瘦，但仍不失学者的大家风范。

他不能坐起来，由杜老师介绍我的实验进展。他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并不时地就一些问题与杜老师交谈，这时我也可以就一些问题插话。刘大夫非常和蔼可亲地与我进行交谈，完全是一个善良且平易近人的长者。

在交谈的过程中，刘大夫要小解，但却不方便起身。杜老师把尿壶直接送进被子里，让刘大夫放松自如。在平时的接触中，也可以感觉到杜老师一直把刘大夫当亲人一样对待，这一细节至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去看望刘大夫是在 1981 年底论文答辩前，那时我的论文已经写完，并油印装订成本。杜老师拿着我的论文，领着我到三里河刘大夫家，那时刘大夫已经出院回家休息。

刘大夫家在三里河一栋非常旧的老楼里，是一个两室间，面积最多 50 平米，与他解放前在王府井有 18 间房屋形成极

大反差。家里陈设十分简陋，连一般的装修都没有，天花板很低，一个很小的客厅里摆着一套老式藤椅和一张方桌。刘大夫还是不能起身自由移动，只能坐在藤椅上接待我们，但气色和精神比先前有了一定好转。

杜老师把我的论文递给了刘大夫，因刘大夫事先已经看过并进行过修改，所以这次就没有提更多的问题。杜老师与刘大夫就我答辩的时间、答辩委员人选等事宜交换了意见，刘大夫让我不要紧张，认真准备。离开刘大夫家时，我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一部老式 120 海鸥相机合影留念。为了取景方便，刘大夫坐在藤椅上，我和杜老师把他抬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由刘大夫的儿子刘冀琼老师给我们合影。

刘冀琼老师当时是一个帅小伙，十分精神，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2004 年后由于为刘大夫立铜像之事，我和刘冀琼老师才有了较多接触，遗憾的是他于 2010 年不幸突然去世。我给刘大夫也单独照了相，这两张照片可能是刘大夫有生最后的留念了，遗憾的是当年这部照相机破旧不争气，照片洗出来才发现聚焦有问题，所以照出的照片也比较模糊。

按照学校要求，我们这批研究生与上一届研究生合起来在 1981 年底完成答



铜像竖立仪式，左起邹承鲁院士、韩启德院士、作者

辩。这是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答辩，没有先例可以参考，完全不知如何进行，感觉十分神圣也比较紧张。

杜老师组织我在实验室进行了预答辩，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指点，告诉我具体地方应该怎么说，特别是在开场白和语速上进行了叮咛和嘱咐。按照刘大夫的提议，我的答辩委员有北大医院刘培楠教授、医科院王世中教授和本教研室的张颖教授组成，生理教研室王志均院士当时旁听了我的答辩。

答辩前我先预想答辩委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我总结了 76 个可能问到的问题，然后把这 76 个问题写在纸上，每一问题下附应该的答案，最后把这 76 个问题和答案死背下来。最后不出所料，答辩委员所提出的问题都在准备之列，甚至都没提尖锐的问题，事后我想这一定有刘大夫的面子在里面，这样我顺利地通过了答辩。也感谢杜老师在两年半时间里为我付出的心血，我的研究成果最终写成了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 1982 年和 1983 年的《中国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上。

1982 年初我离开北医回到母校西安医学院任教，1983 年噩耗传来，刘大夫久病缠身不幸去世。在我离开北医在之后，刘大夫因健康原因再也没有招收研

究生，我成了他最后的关门弟子。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命运安排着每个人的人生。2000 年我又调入北京医科大学大学生化系，重新回到我原来的 237 实验室。2000 年 4 月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2004 年在刘大夫诞辰 100 周年之际，由杜老师、姚仁杰老师（北京大学教授）和我共同商量，在生化楼为刘大夫树立了铜像，以纪念我国这位杰出科学家和我们敬爱的老师。刘大夫的学生同事闻讯纷纷捐款，其中包括有吴宪的儿子、美国著名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吴瑞。铜像由国内著名雕塑家何鄂完成。在她听了刘大夫的坎坷人生后，决定只收取 2 万元的成本费。

在铜像完成之时，我作为刘大夫最后一名学生主持了整个仪式，参加的人除了刘大夫的家属外多是刘大夫的学生和同事，其中有邹承鲁、韩启德、张树政、童坦君、巴德年、韩济生、陈慰峰、张志新等八位院士，大家一起缅怀这位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这尊铜像一直树立在生化楼一入门的楼梯正中央，以便于人们瞻仰，以致在此后的日子里，每当生化的研究生在实验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们就到铜像前合掌祈祷，指望祖师爷能够保佑他们早日渡过难关。

我回到北医后，与其他老师一起先后写了几篇刘大夫的简介和纪念文章。其中“著名生物化学家刘思职的科学生涯”刊登在《生理科学进展》（2004；35 卷 4 期 p.379）；刘思职人物简介分别收录到梁栋材 2013 年主编《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生物学卷）》和许智宏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

还有一件巧合的事，刘大夫于 1950 年初主编了《生物化学名词草案》，后被生化学术界广泛使用。时隔近 70 年后，我受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托，目前正在主编新一版《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感觉虽不能做到祛练神明，圣贤可致，但仍觉得刘大夫正在冥冥之中引导着我前行。

最后，我用刘大夫的一句话来作为此文的结尾：我深信我的事业在祖国。使生物化学这门学科根植中华、根深叶茂是我的宿愿，我愿为此竭尽全力！



竖立在生化楼中的刘思职院士铜像

# 我与祖国共奋进： 辉煌的年华，丰硕的成果

文 / 北京大学药学院 郑俊华



## 作者简介

郑俊华，出生于1935年，男，汉族，原籍：福建省德化县。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国家级重点生药科学学术带头人之一。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

1957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专业，1983年至1984年在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埃大学学习。1985年应邀到日本合作研究中药大黄化学分析，并参观访问和学术交流。

研究方向：生药品种鉴定与质量研究、生药活性成分研究、生药学科生物技术应用研究、新药研制等。

我的父亲13岁下南洋，在橡胶园当童工。后来大概是20多岁时得了红眼病，据说用童尿洗眼睛就能治好，但苦于找不到童尿，就用自己的尿去洗，不料双目失明！之后，他在当地华侨朋友的帮助下回国，到福州、南京、上海等地学习盲人文化、技艺，学成后被派往莆田黄石教会的盲童学校从事盲人慈善教育事业。之后，他在教会和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支持下，到海内外募捐，创办盲人学校，从事盲人慈善教育工作。父亲因积劳成疾于1947年病故，终年52岁。

## 我的童年——流浪儿的生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学开始，我就学会种菜卖菜挣钱交学费。父亲去世后，盲童学校解散，盲校学员及教职员工由政府遣送到康乐新村收容。我们一家生活极度艰难，我要给地主打工，帮母亲维持生活，小小年纪学会插秧看牛放羊，地里什么活儿都干过。最后实在走投无路，全家四口也投奔康乐新村受救济。

康乐新村人们叫它“乞丐村”。是福建省最大的收容所，我们一家四口，

年幼的妹妹随母亲一起住，母亲在成人教养院挑水做饭，弟弟进康乐小学，我编入中学组。在这里，村民、村童过着极端凄惨的生活，经常受凌辱、挨打、受骂。

1950年1月28日永安解放，解放军当即进驻康乐新村实行军管。康乐新村改名永安人民政府救济院。应该说幸福生活的日子刚刚开始，但是没多久，救济院的某些领导经不起糖衣炮弹，和永安中学某些人相互勾结，贪污腐化，欺压院民院童，使救济院的生活沦入比以前康乐新村时更加悲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借助语文课“华威先生”为体裁，全班同学写作文，我写“老粗先生”，讽刺那些不良倾向和“三反”罪行，但却招来横祸，以我为主要斗争对象，召开两次永安师范和永安中学两校师生联合批斗大会。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作了最后的抉择，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救济院和永安中学“三反”运动的情况，没想到，几天后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寄给永安中学校长转交给我的回信，并赠送毛主席照片一张。这件事对永安中学和救济院震动很大。与此同时，福建省教育厅调

查团进驻永安中学，对于压制学生参加“三反”运动的人作了处理：“相关校领导调离永安中学，并派来新校长”。救济院的领导也作了调动和处理，对我们中学组的院童作了很好的安排，从此以后，我得以安心学习迎接高考。

## 我的大学——成长的摇篮

1953年9月我考取了北京医学院药学专业，在永安中学校长和救济院新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下，顺利地到达北京医学院办理了入学注册，开始了我的四年大学学习生活。

中学校长，救济院领导，经常来信鼓励我：“在毛主席身边上大学，更要响应毛主席的‘三好’号召，努力学习，学好本领，锻炼好身体，为建设祖国作好一切准备。”

在我床头上还贴着保尔·柯察金的画像，常常用他的英雄事迹鞭策着我，我始终牢记他们的鼓励，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

我很清楚我的首要任务是炼好身体，当时入学体检，体重不足25公斤，身高不到1.4米，瘦骨如柴，皮包骨，外号叫小瘦猴，与此同时，医院为我诊治了各种疾病，特别是肠寄生虫病（绦虫，钩虫等），加上坚持体育锻炼和学校良好的伙食营养，我的身体像雨后春笋节节高，体质也不断地增强。

在大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各个方面，我都更加积极努力。但时间是个常数，我每天只能睡上4到5小时。三年级时，我被评为北京市高校“三好”学生。至此，我真正响应了毛主席“三好”的号召。

## 政治运动——被失去的时光

1957年，正当我准备迎接毕业前的实习，人民日报刊登了《工人说话了！》的文章，一场“反右派”的政治运动，

迅猛席卷祖国大地，尤其在知识界、高等院校，斗争更为剧烈。我也遭到批斗，例如：给党员提意见，对全面学习苏联，对专业设置等有看法和意见，这被说成是“反党，反苏，反对社会主义”。最后，我被定为“严重右倾”，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时党支部书记和我谈话时说：“这种处分是终身的，是你历史的污点！”从此我背上了常人难以想像和理解的沉重思想包袱。1961年，我又因反对“三面红旗”和走“白专”道路，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浪潮中受到批判。

“新账老账一起算”，包袱越背越沉重，思想压力越来越大。但是，我坚信组织上会给予正确结论，不要因此影响工作和学习。我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多做工作，做好工作，加强学习。我参加北京医学院德语班研究生日语班的学习，参加《中药志》的编著，以及参加药用植物的栽培研究等科研项目。

1965年，我30岁，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小家庭。先后有一儿一女，他们的学习非常好，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非常欣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班级当辅导员和班主任。文革一开始，矛头直指与学生最接近的基层党政组织。我被带上了高帽，上面写着“打倒黑帮爪牙”，在教学楼群中游楼。有个学生偷偷地塞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郑老师您放心，不会有事的。您的学生陈XX。”

过了几天，他们也觉得我是一个普通年轻助教，说不出走资派、黑帮的什么问题，就不了了之。

学校不上课了，只是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后来就开始打派仗、大串连，乱的很。我哪一派也不参加，名曰“逍遥派”，只是看大字报，参加各种批斗会。

期间，我一边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并仔细做摘要、卡片，最后编了《毛泽东语录》，由新华印刷厂印刷，然后出版发行；此外，还编了《毛主席论教



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楼之岑院士(左)丁林生研究生(中)郑俊华(右)在苗圃观察药用植物生长情况

育革命、医药卫生》，供内部学习。

1969年，我参加承德地区医疗队，称“6.26新医药学教育革命探索队”，进行农村医药实践。我被分配到宽城县，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培训赤脚医生。期间，我曾以蒲公英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出血的病人。在1969年底，当宽城县医疗队撤离时，他们前来惜别。1970年，我主持《农村药物手册》的编著、

审批和出版，同时还参加本科生《中草药学》的教材编著工作。1971年，我主持下中药四厂开门办学，边劳动边调研，编写教材，开设实验课。为教育革命探索新路实践出力。

1979年，知识分子的春天终于来到，组织上正式给我平反，我从思想上卸下了长达22年之久的沉重包袱！平反后，我心里想的就是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可以说是决心“争分夺秒”努力忘我地工作，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做出最大的成绩，以报答毛主席、共产党、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



### 奋斗的三十年——辉煌的年华，丰硕的成果

在领导和组织的安排下，我学习英语，作好出国学习的一切准备。1983年至1984年，我作为美中教育学院成员、北京医学院赴美医学代表团成员到美国学习、参观、访问和学术交流。在这一年，我在美国14个州的46个单位和加拿大5个省的8个单位参观访问和考察，学习了很多东西，开阔了视野，吸取了美国和加拿大与本专业相关的许多现代科学知识和最新技术，为回国后开展我后半生的事业奠定基础，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和最辉煌的历程。



郑俊华在向药学院作题为：抗癌中草药的学术报告

1985年，应日本生药学会的邀请，我由卫生部派遣到日本合作研究中药大黄。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用一个多月完成了三个月的任务。在日方合作者的陪同下，我又访问考察了日本大多数和本专业相关的单位，学习和吸取了日本在药学方面的许多现代科学技术。随后，我购置了仪器、试剂和药品，回国后准备建立研究室，把从西方的美国和东方的日本学到的科学知识和现代技术尽可能融汇贯通。在楼之岑院士的领导下，我们把中药大黄的现代化研究进行到底。



1983~1984在北医郑俊华（左1）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伊利诺埃大学药学院学习、考察与院长Dr.Manasse（左2）、导师Dr.Cordell（右2）合影

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我还是

日以继夜，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倾心于科研和教学工作，决心作出更大的成绩。但终因过度劳累，积劳成疾，我得了心肌炎。此时我还是没有听从医生多次劝我住院治疗的忠告，以致于错过治疗的最好时机，最后带上了“冠心病”的帽子。

在这几十年中，我全神贯注于从事以下几项工作：

培养人才：包括研究生（硕士9人、博士16人，博士后8人）、访问学者（25人）、进修生、毕业专题生（数十人）以及许多合作者，促使他（她）们德才兼备。

科学研究：完成40多项国家、国际合作和自选研究课题。发表学术论文250多篇，国外引用或转载70多篇。新药基础研究：已完成10多项新药研制项目，所得经费都用在培养研究生和科研项目上。

成立生物技术研究室：把生物技术引进到中药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包括药用植物细胞工程、克隆技术、生物合成、生物转化、分子鉴定等内容，尽力去追寻新知识、新技术，敢实践，不怕失败，终于作出了不少成绩。

教学工作：主编《生药学》全国统编教材第三版和《生药学实验指导》（第一版），以及《生药学》网络教材等，把相关的学术思想观点贯彻始终。此外，还担任一些社会兼职，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专家等20多个兼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关心下一代，尽我所能献爱心，贡献微薄的力量。

### 古稀之年——壮心不已

2000年10月，我退休了，但其实退而不休，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壮心不已。

2001年，我着手《大黄的现代研究》专著的主编筹备工作，2008年出版发行。2002年最后一名博士生毕业。2003年到



1997年1月北京医科大学生药学生物技术研究室正式成立。校、院、系各级领导及研究室师生合影，前排至右蔡少青、果德安、吕忠生、郑俊华、彭瑞聪、程伯基、李长龄、赵玉英



郑俊华继续参加药学院教育督导组活动

2004年，我到美国考察大黄叶柄的研究与开发利用。2005年，我进行食用大黄的栽培、叶柄的研究，协助药学院天然药物系到福建永安市考察医药的开发项目。2006年，应出版社邀约主编《生药学应试指南》，协助组织药学院天然药物系参加福建（泉州）永春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发展报告会，并作大会发言，会后进行考察，洽谈产学研合作。

2007年，我还继续参加药学院教学督导组工作，协助药学院的理论课教学、实验课教学、青年教师规范化培训、长学制二级学科培养以及教学管理进行全方位的检查、监督和指示。

在经历了与疾病的斗争后，如今我已经步入耄耋之年，实际就是风烛残年，

寿年将尽。然而我的心境犹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内心总是感到仍有许多事情尚未做完，尽量争取能给我多一些时间去把它做完，尽量不留下太多的遗憾。人生短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真是微不足道，如果在这么短暂的瞬间能尽量做出一些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祖国的事，哪怕只是一、两件，也就足以。

不忘初心，是祖国人民和母校教育培养了我，毫无疑问，我当尽心尽力努力工作，直到人生尽头。值此祖国七十华诞之际，我衷心地表达我的无限感激养育之恩！敬祝祖国繁荣昌盛！北医母校发展蓬勃！

# 我为何去护理学院

■ 文 /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洪黛玲



## 作者简介

洪黛玲，女，1941年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专业，之后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从事儿科临床工作26年。1991年进入北京医科大学护理系从事护理教育工作，至2005年退休。历任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儿科教研组长、护理学院工会主席、教授。洪黛玲教授是护理学院儿科护理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主编参编写各种护理教材10余本，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洪黛玲教授曾多次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教师，并于2004年荣获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称号。

## 在医院的日子

我曾是儿科大夫，后因北大医院恢复心外科心脏手术，需要儿科心血管医生支持，因此医院便找机会让我进行了儿科心血管方向的学习。我先是被李树政教授派去阜外医院导管室和监护室参观学习了3个月，但没有得到亲自操作的机会。结束在阜外医院的学习后，我又去上海第一儿科医院学习了一年，这一年的学习让我在心脏病和导管操作方面都受益良多。

1984年底我回北京，在小儿心血管内科任副主任医师，后来又被调去心外科的ICU任副主任医师，心外科ICU当时人员紧缺，只有我一个人。我在这个科室一做就是六年，当时这里工作环境比较艰苦，没有女医生休息室，只能到护士休息室与她们挤在一起休息。在心外科ICU的工作比较繁忙，如果病人回病房后心率正常、呼吸平稳，人已清醒，就可以拔氧气管，拔氧气管后，再看引流瓶，如果出血不多，我就可以回去休息。但休息过程也正是护士交班的时间，护士休息室里大家进进出出，没有安静的休息环境。此外，半夜里病房有事还会打电话到传达室，值班师傅会用大喇

叭喊医生下来，这时我就需要骑着二手破自行车赶到病房看病人。后来，医院给每个科的主任发了BB机，以便呼叫医生，我也结束了被大喇叭喊下来的日子。那时我一天的安排基本上是六点钟起床依次查看病人，准备交班，交完班参加主任查房和医生讨论下一个手术的病人的问题，每周日休息，周六上午还有一次门诊，周日还要去病房两三个小时，每天忙碌而又充实。

## 我在护理学院的工作和生活

我爱人在51岁时发现了胃癌，做了切除手术，还要进行一年的化疗。所以有时间照顾我爱人成为我当时最迫切的需求。因为护理学院学时较少，节假日不用轮流值班，有寒暑假，除了上课，对时间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因此1991年，我来到护理学院工作。

在护理学院的日子没有在医院那么繁忙，我也慢慢适应了护理学院的工作。当时赵炳华老师规定每个周六下午大家集体学习，学习内容包括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学习的目的是帮助大家适应护理学院的工作，适应护理教育的特点。集体学习让我收获很大，通过不断的学



洪黛玲老师和学生们在一起

习积累，我开始主编教材，我指导学生的文章登上杂志的也慢慢多了起来。

在护理学院，我带的研究生共5人，我带研究生的方法是：先给他一个方向，让他们查阅文献结合实际制定调查表，我再根据他们调查表给她们修改，然后由她们根据修改后的调查表去找病人进行调研，最后根据调研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这几位学生的文章都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纷纷登上杂志，现在在儿童医院做护士长的梁护士的文章更是登上了《中华护理》杂志。

因为参加学校考试出题，我在上课之余会选择去图书馆看书找题目。除了

学校的考试出题工作，我还参加全国性的考试的出题工作，直到71岁还参加了2013年春的考试出题工作。结束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2013年我左膝关节软骨磨损严重需要关节置换，在三院运动医学手术过程中，关节腔外的小动脉断了，病情需要我必须休息一段时间。好在经历曲折的术后康复，我很快就恢复能走路了，这使我很高兴。回复走路后，我一边吃着中药和西药回复身体，一变恢复了回学校上课的工作。我虽然2005年退休，但是退休后返聘，直到2015年春节才真正停止工作。

2015停止在学院的工作后至2017

年春我身体还算硬朗，可以到处走，因此会参加学校附近的一些活动，甚至坐公共汽车去稍远一点的活动。但2017年春发生气喘，我走路开始吃力，走到我们家巷口的工商银行都不行，所以2017年4月份就住进肾内科检查，后因为肾衰，改在北大医院的肾透析室透析，直到现在。

从事医生工作和护理工作这么长时间，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希望护理学院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注重加强学生的临床实习，护理教育和护理理论不应该脱离实际，只有结合临床的护理教育，学生毕业后才能胜任临床工作。

# 我与北医医史学科

■ 口述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程之范 整理 / 甄橙



## 人物简介

程之范（1922—2018），中国当代著名医史学家和医史教育家，自 1950 年毕业留校至 2002 年退休。曾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辑、名誉总编辑，《中国科技史料》、《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杂志编委。北京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创建者兼首届中心主任、创建北京大学医史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曾获北京医科大学教师最高荣誉桃李奖、北京市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诸多荣誉。

程之范教授倾心教学，努力探索医学史教学的主旨与方法，积极编写医学史教材，拓展医学史研究生教育，大力培养医学史师资力量，在国内外医学交流中积极推动中国的医学史研究。程之范教授在北医工作半个多世纪，为北医医史教研室的发展壮大倾尽全力，为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的医学史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

北医医史学科创建于 1946 年，是我的老师、曾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文部讲授过医学史课程的李涛先生来北医后组建的。1948 年初，我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前夕，来到医史学科做实习生。1950 年毕业后，我留在医史学科工作，并逐渐开始承担教学工作。1956 年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前身）成立，李涛先生调至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任主任。从那时起，我开始全面负责北医医史学科的各种工作，直到 2002 年退休。在我与北医医史教研室共度的岁月里，马堪温、阮芳赋、宋之琪、高铭暄、刘久茹、邢淑丽，这些老同事或已退休，或已离世。时光荏苒，岁月难忘。我视北医医史学科为家，医史的工作最重要，医史的事情最重要。

## 难忘经历

1946 年，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

系学习。在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时候，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给在校学生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伟大的医学家巴斯德”，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医学史内容的报告。

我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华医学会。1950 年 8 月，我以会员身份参加了原中法大学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医学大会，亲耳聆听李济深、茅盾、傅连璋等领导的报告，令我记忆犹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尚未成立，但已经开始组织学术活动了。当时，我和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李涛先生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竺可桢教授组织的“科学史小组会”。这个小组每两个月召开 1 次组会，讨论有关科学史的问题，直到后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科学史小组会的活动也就自然停止了。1952 年，我有机会到中南海怀仁堂，亲耳聆听周恩来总理给大学教师做的“思想改造动员报告”。报告时间长达 3 个多小时，因为当时周总理的身体不太好，所以讲话中间，总理休息了片刻。我清晰地记得，总理就在报告席上吃了两块点心，然后继续做报告。周总理的报告语重心长，使当时还是年轻教师的我终身难忘。

1956 年，我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持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并在大会做了“梅毒



北医 1950 级学生合影（1948 年 10 月摄于北大医院住院部，后排右 5 为程之范，左 5 为王忠诚）

病历史”的报告。会议期间，我与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就中医政策问题进行了交流咨询。李德全部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议，为期一周的会期，她每天都按时参加会议。会后，我和参会者再次有机会到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非常荣幸地坐到周总理的对面。如此近距离地听周总理讲话，使我刻骨铭心，周总理讲话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每当想到这件事情，我都会回想起周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我一生再没有见过第二人有这样神采的目光。

20 世纪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北医停课，全国各行各业都陷入停滞状态，政治斗争的火药味充斥全国大江南北。在这场动乱浩劫中，许多学者和教授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甚至受到株连和迫害，他们或被批斗，或被下放到“劳动干校”。我十分幸运，在十年动乱中，不仅成为北医唯一没有被下放的教师，

而且还有幸到北大医院中医科，跟随老中医崔绍缙学习中医。后来我还独立出中医门诊，结识了许多病人。因为效果不错，很多病人长期找我给他们看病，我也在实践中提高了对祖国传统医学的认识水平。

“十年动乱”中，许多人的学术生涯因此而荒废，然而我却恰恰相反，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学习祖国传统医学，而且还与中医科医生共同编写了中医学教材。这段经历为我后来从事医学史教学和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然我在上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西医学，但却用自身的经历了解到祖国传统医学的真谛。我非常珍惜在北大医院中医科的学习和工作机会，遇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中药调理，还经常给亲友开中药方，效果不错。

改革开放后，1978 年 3 月 18 日，我有幸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次会议由华国锋主席主持，就是在这次大会上，

邓小平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报告。

## 教学工作最重要

我担任北医医史教研室主任后，一直把教学工作看得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医学史教学与医学专业课不同，医学史课程不容易被学生重视。

对于刚刚入职的年轻教师，我都是从严要求，亲自指导。1993 年，甄橙入职北医医史教研室。当时，北医的师资十分缺乏，为了培养年轻教师能够及早称职地登上讲台，我首先要求她全程跟随我听课。当时我虽然已经 70 多岁，却还在教学第一线，而且当时的医学史课程被安排在学生下临床后的第一学期，因此我要奔波于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三个不同的教学区。当时在北医的校园里，已经鲜有 70 岁的老教授还

给本科生授课。因为医史学科的特殊性，在中国的高等医学院校很少有医史学科的建制，而像北医这样，不但建立了独立的医史学科，而且还坚持把医史课程作为必修课程开设，这在中国的高等西医院校是首屈一指的，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探索，使我认识到医学史是一门学科，能使学生了解医学的发展规律。医学史虽然是讲过去的事，但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并预见将来的医学发展方向。医学史是一门重要的医学理论课，作为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生，不能只学医学技术，要有医学史知识。所以我与校领导沟通，

认为医学史课程教学最好安排在医学基础课程结束之后学习。虽然奔波于不同的医院去上课，对老师来说比较辛苦，但是对学生来说是受益的，因此我虽然是古稀老人，但依然坚持到附属医院去上医学史课。

我不仅重视培养青年教师，强调按照医学的发展规律安排医学史教学，而且我很注意完善医学史课程的教学方法。我认为能够用生动的教学吸引学生，是对医学史教师的严峻考验。每次下课结束前，来自学生的掌声，是学生对我授课效果的最好评价。我的授课形式非常独特，讲课提纲用“大字报”来书写。所谓“大字报”，就是把讲课提纲写在 1

米见方的白纸上，上课时想办法将其悬挂在黑板中央。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电脑在中国尚未普及，多媒体授课方式罕见，能够称得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常就是上课时给学生放幻灯片，或者放投影胶片，比较先进的手段就是课前与电教中心联系，给学生播放与教学有关的录像带。我讲课使用的“大字报”，文字虽然不多，但却是我精心概括总结的教学重点。我努力使讲课语言幽默诙谐，使学生们轻松上课，不用记很多笔记，却可以把上课的内容牢记。长此以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授课风格。

自从 1950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一直从事医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几乎所有解放后在北医学习的本科学生都听过我的《医学史》课。《医学史》课程虽然学时少，又非医学校的重点课，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一度还被改为非必修课，但由于我认真备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使医史课在每一届毕业生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由于教学贡献突出，1992 年 9 月我被授予“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这是北医为表彰优秀教师的教学业绩而设立的最高成就奖。

我担任北医医史教研室主任期间，始终把医学史作为培养医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手段，因此北医医学史的教学和科研紧紧围绕这一核心，我积极带领年轻老师撰写教学论文《医学史与医学院校的素质教育》、《加强医学史教育、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医学史教育的重要性，使在片面追求医学技术的年代里，明晰医学史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使医学史学科成为培养学生医学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的努力下，20 世纪 80 年代北医医史教研室获得批准，成为医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点。20 世纪 90 年代，我为北医医学史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建设积极奔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断地努力，终于使北医成为全国

西医院校中唯一的医学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对于医学史这样的边缘学科，能够申请到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都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申请博士学位授予点的过程中，我凭借多年的学术功底，得到吴阶平、吴英恺等老一辈医学大家的信任和尊重，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终于获得成功。

获得了医学史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意味着北医医史教研室不仅要承担本科生的医学史教学任务，同时肩负着培养高水平医学史人才的任务。

在研究生教学方面，我认为应该严格与宽松兼顾。我的硕士研究生尹银亮入学后，我发现他对医学史学科并不是很适应，尤其不适于讲课，反而很喜欢做医学的科学实验研究。我没有强迫尹银亮坚持做医学史研究，而是在指导他完成硕士论文的同时，鼓励他坚持自己的兴趣，并帮助他到北医相关学科学习。尹银亮没有辜负我的期望，顺利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阶段学习结束后，又先后到瑞典和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后应聘到香港科技大学。在我看来，对学生的因势利导是研究生导师的责任。

我对研究生的选拔非常严格，虽然博士点的获得来之不易，但我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至 80 岁退休，只精挑细选培养了两名博士生。

我非常关注中西医问题，在我看来研究中西医问题上应该坚持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承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的；其二，目前的医学，无论是西医学还是中医学，相对于其他自然科学来说还是比较幼稚的，由此注定中西医比较研究的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此，我专门撰文，倡议关注中西医学史比较研究，并将其作为北医医史教研室的研究方向之一。所以，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分别为“中西医学伦理学史比较研究”，和“18 世纪中西医学比较研究”。

## 编写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医学史教材

医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20 世纪以后逐渐完成了其体制化的学科建设过程，但是在中国，它还属于身处边缘的小学科，20 世纪 30 年代才开始有中国学者从事医学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医学院校鲜有医学史教学机构，当时只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开设过医学史课程。从医学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来说，都很欠缺。我自踏入医学史专业以后，开始积累素材和经验，力图在北医的平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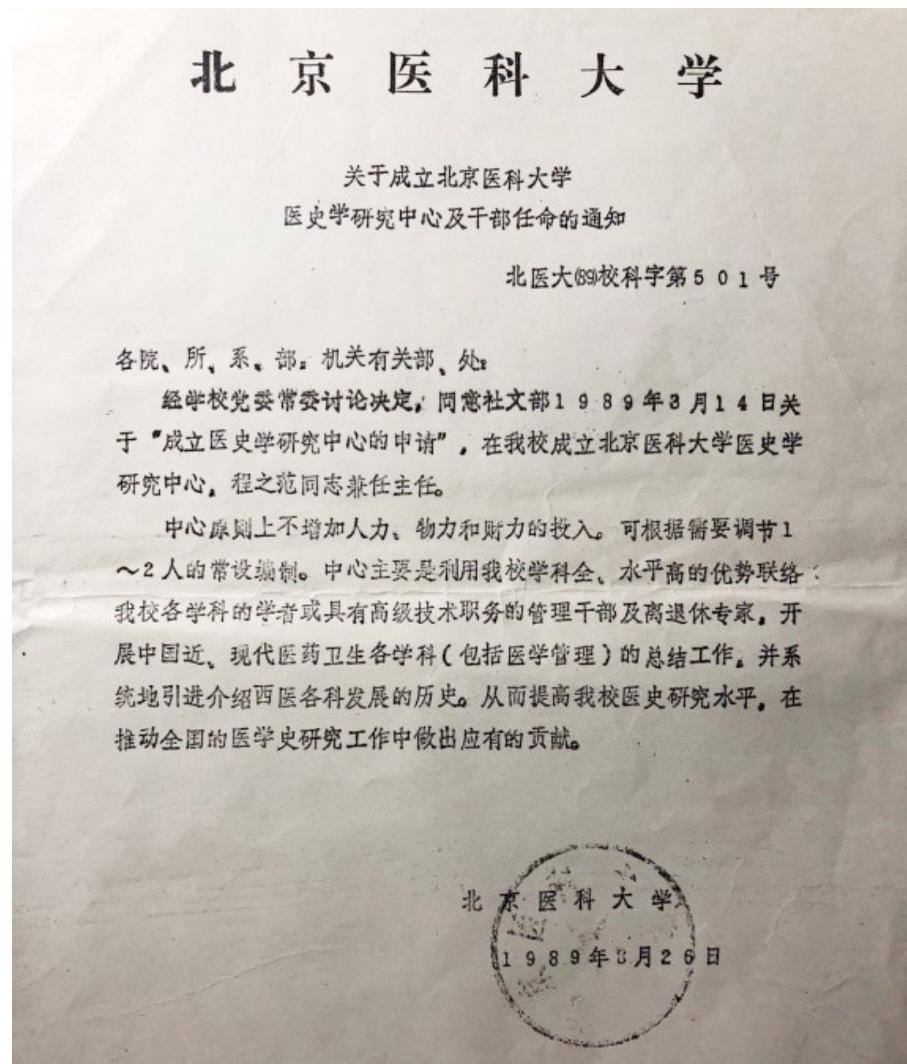
带领医史同道编写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医学史教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友好，中国的一切建设，包括教育都效仿苏联，医学史教学也是一样。于是我组织人员，翻译了苏联医史学家彼得罗夫的《医学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 1957 年出版。我从编写内部印刷的《世界医学史讲义》开始，在 1990 年终于编写出第一本适合我国医学史教学使用的教材《简明医学史》。这本教材虽然篇幅不大，但重点突出，详略得当，非常适合课业任务繁重的医学院学生使用。曾经有北医的学生，已经从学校毕业了，后来回到学校购买此书。

为了适应 20 世纪的时代需求，我决



程之范教授（中）与 2 位博士生合影



1989 年 3 月北京医科大学批准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的文件



1981年参加东西方比较国际医学史研讨会（前排左4为程之范，左5为日本医学史学会会长小川鼎三）

定充实医学史教材的内容。根据 50 余年的教学经验，采取世界医学史、中国医学史、近现代医学史三段式编排方法，精心挑选医学史插图，编写了近 36 万字的《中外医学史》，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为了提携后学，在 2000 年教材再版过程中，我担任主编，让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做副主编，鼓励年轻教师花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我认为只要是对教研室发展有利的东西，就应该积极推动执行。帮助年轻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帮助他们规划好专业方向，是我作为一名老教师应该做的事情。

作为教研室主任，我深知教研室是一个集体，要想让集体有凝聚力，必须把大家团结起来。对于北医医学史教研室来说，首要任务是培养后备力量。我常常告诫年轻教师，医学史要生存，教师必须把课程讲好，因为医学史课程的性质，与解剖课、生理课、生化课等课程不一样，更与临床技术课不同，对于医学史这样的医学人文课程必须依靠教师的魅力来吸引学生，使其知道医学史的重要性。因此医学史的教师任务更艰巨，必须练就过硬的教学基本功。教育年轻教师一定要热爱医学史事业，并且专门撰文，增强人们对医学史的重要性的理解。

我不仅对北医医学史教研室的老师这

样要求，对进修教师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许多院校的青年教师完成北医医学史教研室的进修后，传承了北医医学史的教学精神，回到各自的学校后积极开展了医学史教学活动。

### 科研与交流

由于我国世界医学史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一方面坚持亲临教学第一线，一方面积极向中国学者介绍西方的医学史著作，并对经典的医学史著作做评介，目的是帮助中国学者有目的地选择阅读。虽然付出很多劳动，但补充了医学史教学需要的素材，使很多医学史的中文译著能够在中国问世，带动了中国的医学史研究。在大量翻译工作的基础上，自主性的医学史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

20 世纪 50 年代，我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得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夸赞。他称我是课堂里唯一学过医学的学生。我坚持把哲学与医学史结合起来，首次提出医学史研究要分为三个层次：低层，历史事实的解释、描述；中层，将事实联系、分析、归纳；高层，用哲学分析史学。这一认识使我国当代的医学史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为了增加北医医学史教研室的影响力，1989 年我

在医学史教研室的基础上，聘请相关临床医院的专家参与，成立了“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医学史中心”），我担任中心首届主任。此中心的成立，不仅是中国高等西医院校中第一个专门的医学史研究机构，更重要的意义是通过搭建这样的研究平台，推进中国的世界医学史研究水平。

医学史中心成立后，以医学史中心为依托，开展了多个大型的研究项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医学史》的编写工作，我不仅把北医医学史教研室的教师纳入到研究工作中，而且发动医学史中心的力量，动员医学史中心的临床专家共同参与，集体开会讨论，给大家做了合理的分工，1993 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顺利出版。1998 年我参加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基础医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书成为医学史专业的重要工具书。《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的编撰工作是由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和我共同主持的另一个庞大工程。我带领北医医学史教研室的全体教师，联合医学史中心的有关专家，倾力投入此项工作。结合每个人的专业背景和特长，尤其为教研室的同事，宋之琪、覃卓明、张大庆、甄橙各自分配了任务，邵丹做了很多联系工作，让大家把此项科研任务作为集体工作来完成，定期督促检查，

2000 年此书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顺利出版，广受好评，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重要著作。

2000 年，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2001 年 12 月 15 日，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我与韩启德院士共同担任中心名誉主任。以坚实的医学史教学为基础，以严谨的医学史科研为动力，二者双向促进，推升北医医学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是我的愿望。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是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对中国医学史颇有研究，多次访问中国。1957 年李约瑟博士再次来到中国，希望拜访李涛先生。因为李涛先生当时已患中风，所以由我接待，我与李约瑟博士探讨了医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当得知我正在进行有关盖伦（Galen, 公元 2 世纪人，古罗马著名医学家）的研究时，李约瑟博士非常高兴，与我饶有兴致地探讨了盖伦与中国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的交流比较有限。1979 年，加拿大医学史学家贝斯（D. G. Bates）来北医访问，我负责接待。来访前一天，我专程到贝斯教授下榻的北京饭店拜访。贝斯教授原本想到北医做一些医学史报告，准备的演讲题目是一些医学史常识，如血液循环是怎样发现的，血压计是怎样发明的，听诊器是怎样发明的等等，但是次日他来到北医后，发现我正在组织翻译百万字世界医学史名著《卡氏医学史》。贝斯对此非常惊讶，他没有想到中国学者的医学史知识已经达到如此水平，所以贝斯临时改变了演讲题目，改为介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图书馆与医学史藏书。后来贝斯还将他访问北医医学史教研室的情况撰文在国际著名的医学史杂志，美国《医学史通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上发表，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

改革开放不久，1981 年我应邀到日本参加“东西方比较国际医学史研讨会”。

类似这样的国际会议在今天看来已不稀奇，但在当时却是难得的机会。我认真进行了准备，从历史的角度作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的大会报告，与会学者反响强烈。我还把中国的医学史研究情况向各国学者做了介绍，让世界同行了解到北医医学史教研室，及中国学者的医学史研究。

### 服务社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众对人文历史知识也越来越需要了解，《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收到公众的好评。我感受到医学史不仅要向医学生教授医学的历史，也有责任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医学的发展历程。我通过《健康报》、《健康时报》、《中国卫生画报》等报刊积极宣传医学史知识，同时也鼓励教研室教师多向公众宣传医学史。

2003 年 SARS 突然降临。在爆发初期，当医学专家尚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时候，北医医学史教研室承担了向公众介绍人类征服传染病历史的任务，老师们积极参与相关书籍的编撰和影视节目的录制工作。我受聘医学顾问，带领年轻教师，与中国科技馆合作，完成了大型科普展览“征服瘟疫之路”的文稿创作，2003 年 5 月该展览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顺利展

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方伟岗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在社会突发事件的危机时刻显示出医学史的作用和价值，并能够彰显出北医医学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我感到很骄傲。医学史教研室的教师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抗疫史话》节目的录制，在全国 36 家省市电视台播出，并由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向全球播出，在 SARS 流行的非常时期，发挥了非常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中西医学论争是中国近百年医学史上不可回避的话题，至今仍然没有结束。2006 年我接受香港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的记者采访，参与录制“百年中医”节目，力主西医不是绝对的科学医学，中医需要继承发扬的观点。在中西医问题上，显示出医学史学家的态度和观点。

2002 年，我年近 81 岁，虽然正式告别了北医医学史教研室，也远离了三尺讲台，但是我的心永远与北医医学史教研室紧紧相连。时代在发展，学科在进步，希望北医医学史教研室同仁不断耕耘，使北医医学史教研室不仅在中国保持领先地位，而且向世界高水平的医学史研究看齐，为中国的医学史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2011 年程之范教授 90 岁生日讲述，甄橙记录撰写）



2011 年程之范（中）与著名医学史学家傅维康（左）、李经纬（右）合影

# 感恩

## ——纪念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抒怀

■ 文 / 原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 李鹰



### 作者简介

李鹰，1983 年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毕业；同年分配到北京医学院学生处工作；1986 年调任北京医科大学校刊编辑部编辑、副编审；1993 年调任北京医科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7 年晋升为管理学研究员；1998 年到 1999 年曾赴美国 Emory 大学访问学者；2000 年北京医与北大合校后，被任命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2002 年 11 月至 2016 年，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先后分管审计、行政、保卫、后勤、基建、产业、档案等学校保障体系；2005 年至 2017 年 8 月，任北京大学副秘书长。

今年是建国七十周年，我们这代被称为“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的人。没有经历父辈们戎马生涯、社会动荡的年月，我们出生在和平时期，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变，我们是祖国建设发展的亲历者、建设者，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大好时光，见证了国家由弱到强。虽然在我个人生长的六十年里，有坎坷和伤害，但是幸运始终伴随着我。伏案思索，提笔回忆，我在北医工作的三十四春秋，如电影般一幕幕出现在我的脑际。

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八路军和解放军，他们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建国后先后转业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工作。父母都具有坚定、刚烈的军人气质，也有旧时代识文断字知识分子桀骜不驯、清高独立的素养，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三岁进入中科院幼儿园；七岁开始在中关村小学读了六年半（中间经历了 1966 后停课一年的革命运动）；1971 年升入北大附中初中；1974 年特别幸运的赶上恢复高中教育和普及高中教育，得以在北大附中高中部学习；1976 年高中毕业，作为“知青”到北京延庆县花盆公社前山村插队。插队一年后，幸运地赶上 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我一边插队劳动，一边复习功课，1978 年我在延庆千家店公社中学参加高考。虽然总分超过录取线几十分，无奈当时高校教育刚刚开始调整和恢复，一下子无法接纳众多青年。幸运的是，时任北京市长林乎

加支持北京市高校办分校的政策，所以我 1978 年参加高考，1979 年 2 月被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录取，寒窗四载，受教于周一良、张传玺、许大龄、张洪柱等大师的传授，得益于太多的老师熏陶，祝总斌先生是我毕业论文导师。

### 工作启蒙——师恩难忘

我刚进北医，就幸运地遇到好老师和一群性格各异、聪慧善良的同事。1983 年，中国社会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充满了纯粹的希望和理想。国人在经历了长期的封闭和极端的禁锢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思想突然挣脱了束缚，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面临着反思、调整、重建的过程。

在我们之前，北医学生工作系统的辅导员没招过文科毕业生。八十年代初，国家处于承上启下、百废待兴的转折期，高校思想教育政策也处于转型期。从教条僵化、与现实脱节、不注重人与人差异的传统模式，转变到亲和务实、摆脱空洞口号、承认个性、针对人的工作方式。当时，吴景春副书记主抓学生思想工作，在她领导下，这支队伍从人员结构到工作方式开始了重要转变。

首先，辅导员群体从构成上调整，新的年轻人来源有二：一是本校毕业生留校。杨丽君、江航、吕兆丰、廖青平、李立明、林慧青、李青、郭岩、徐韬、霍知明、刘亚南、张抗等人，这是一批 77 和 78 级的优秀生，他们既有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又有政治思想觉悟。二是组建了德育教研室，北大分校和人大分

校哲学、政治经济学、中文、历史等文科毕业的石敬慈、王鹿、祝明、李维娜和我都是按照德育老师的接收函进入北医学工系统。学校组建这样一支队伍，目的在于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在学生思想教育领域探索一种新的工作模式，改变原本刻板、教条、灌输式的思想教育方式。

刚到北医，王赤民老师就分别找我们谈话，说虽然北医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学校，但是在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人参与。吴景春老师用信任和鼓励的语调向我解释：“你们文科生以非医学专业背景进入北医，不是短处，而是长处，所以要在日后的工作中发挥所长，发挥个性。”她希望我们的到来能为北医的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增添活力。

吴景春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慈母，大大的眼睛，暖暖的笑容，态度亲切而不失严肃，语调温和而不失果断。虽然她是北医六十年代初的正统毕业生，但对我们这些来自文科院校、风格有些另类的年轻人不但不抱成见，而且充满信任和期待，想来这与她天地宽广任遨游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吴景春老师祖籍常州，生在河南，早在 1951 年就参军并远赴藏，同年入党，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批达到拉萨的女兵，曾在部队里担任护士班长，后在拉萨人民医院当护士长，在高原工作了六年，将青春献给了西藏的妇幼保健事业，离藏之后才进北医医疗系学习。吴老师是看过大世界、经历过大风雨的人，她既了解北医学生的特点，也清楚北医学生的弱点，因而能在工作中有的放矢。

辅导员的工作要适应学生的作息规律，所以很难像其他教员那样搞坐班制。针对这个特点，吴景春老师要我们在早中晚饭时间去学生食堂，晚饭后留在办公室，因为学生们如果有事找我们，多在这个时间段。当然，那时候我们都单身，住教师集体宿舍，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的概念，办公室的灯通常亮到半夜才熄。我原以为夜里只有辅导员同事或学生才会上门，没想到当时学生处处长刘美算老师，副处长王儒珍老师分别好几

次在晚上九、十点钟推门而入，跟我们谈心，交换意见。

后来听说，有人告我们新来辅导员的“状”，说我们工作涣散，白天有时不在办公室。是吴景春老师没有偏听偏信而是让学生处老师亲自调研，然后向对方解释说：“我做过调查，他们夜里九、十点钟还在办公室看书，讨论工作，或找学生谈话。辅导员的工作时间跟别人不同，要因学生而异，那样工作才更有效率。”我这才明白，刘老师和王老师多次晚间登门，是来“查岗”。

虽然吴老师只管了我们半年，之后被调到国家计生委任职，但这半年对我们的教诲和呵护，让我受益非浅。即使她后来当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仍不忘询问我们的工作，关心我们的个人生活，她那种实事求是、公正待事、平易待人的工作风格对我影响很大。

接替吴老师工作的是徐天民副书记，他在生活和工作的阅历上与吴书记有相似之处，都在入北医学习前接受过社会洗礼。徐书记是昆明人，早在 1949 年 7 月就加入了“云南青年民主同盟”，意气风发地投身革命，1955 年入党，1958 年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不仅在北医系统的党委、宣传口任过职，还曾远赴甘肃担任平凉地区的政治部副主任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他的工作视野远超出高校，思维和判断自然也比从象牙塔到象牙塔的干部开阔许多，因此他能够不温不火、合情合理、游刃有余地理智处理许多敏感、棘手的问题。

徐书记和吴书记还有一点很像，就是都把青年师生的德育教育当作一门学问去做。吴景春老师曾亲自给学生讲德育课，是北京第一届高校德育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徐天民老师更是将德育教育提升到学科和理论的层面，组织成立德育教研室，亲自主编《大学德育》杂志，出任北京高校德育研究会理事长，后来还出任北京政治青年学院院长，是一位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员和德育学教授，并且涉足伦理学研究，著作等身，在北医人的心目中很有威望。

在跟徐书记接触过程中，我发现他是一位平易而严格、细腻而坚定、理智且充满情感、待人接物很有人文精神的可敬师长。他待人从来不端着，谈工作从不以势压人，跟我们这些“后生”打成一片。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徐书记做了一件对后来思想政治工作影响很大的益事，他亲自筹建了“辅导员政治思想工作研讨会”，将大家定期召集到一起，了解国家的发展变化，分析学生思想动态，讨论如何改变传统的政治灌输，真正做到跟学生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润物细无声。要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身为领导率先摒弃社会上已经习以为常了的形式化、概念化、灌输式、奖惩式的政治教育手段，是需要魄力和卓识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984 年我带学生上山劳动，回来之后写了篇文章。结合自己插队的体验，探讨如何在劳动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增进他们对农民和社会感觉和认知，并对学生劳动做了具体的点评。若用现在的眼光看，那篇文章可能并没有什么，但在当时还是有争议的，至少不像老派政工期望的那样“正统”和“高调”。要知道，对于一个也刚脱掉学生身份的新教师来说，内心很抵触那种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空洞说教。万没想到，在辅导员递交的许多文章中，徐书记偏偏看中了这篇，他从朴素、平实的文字里看到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潜在影响。于是，在徐老师的坚持下，我被安排在讨论会上宣读，这对我的鼓励很大。

当时，学校虽然吸收了一批优秀的留校生和文科生当辅导员，但在个人奋斗热、出国留学热的大环境下，不少人做辅导员并不安心。因此，如何能让大家安心又不影响个人发展，如何能让大家各施所长而不埋没人材？这成了徐书记最关心的事。一方面他帮助有医学背景的辅导员进入教研室，让他们在搞政工的同时不荒废专业；另一方面他从公共教学部抽调了惠荪老师到学生处组建德育教研室，安排我们文科来的年轻人

担任德育课的老师，结合我们各自学科特点，发挥特长，为学生们讲政治思想课。

记得，当时按照有关规定，学校是有个德育教学大纲的，我提出可否结合中国近代史，单以圆明园的题材来讲？虽然我感觉到徐书记和丁老师都有些诧异，因为毕竟是脱离了教学大纲，但是他们没有拒绝我的提议，而是让我尽可能地结合大纲的有关内容靠近去讲。我认真查阅了许多资料，也分析了学生的一些现状，想尽办法把历史和现实德育的要求结合起来，我生平第一次给学生讲课，是通过讲述圆明园的历史，告诉学生要面对我们近代的耻辱，启迪他们的爱国心，激发他们的复兴梦。

徐书记很懂得人，会尊重人，知道如何与人沟通。他根据辅导员们的不同特点去开发他们的潜力，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循循善诱地启发我们的工作兴趣，保护我们的工作热情。逢年过节，他总把大家请到家中，毫无官气地跟年轻人沟通，把辅导员团队营造成一个充满友好和团结精神的“大家庭”。平时，他也像一位开明家长那样公平待人，帮助大家彼此沟通。那时候的辅导员，打破了不同系之间和不同人之间的背景隔阂，大家如同兄弟姐妹，我后来走上北医管理层岗位，很多待人接物及工作方式都或多或少有吴老师和徐书记的痕迹，我能够一直保持真诚和坦率的性格，和他俩的影响分不开。

### 重拾专业——编撰校史

为了迎接北医百年庆典，2011年3月，学校组织了校史编写组，由我牵头做两件事：一是从1912到2012年的校史展览，一是合校后十二年的历史文字整理，进而将北医百年的文字资料整理成册。王德炳、徐天民、程伯基、张质、姚树印、廉志坚等老领导为校史专家组，彭瑞聪老书记和马旭老院长是顾问。

在北医，彭瑞聪三个字，是高山仰止的代名词，不夸张的说，百年北医发展中最有份量和厚重的历史人物，非他莫属。我不是一个容易崇拜谁的人，我和彭



书记在工作中几乎没有交集，我做辅导员时，集中精力于学生中，对行政办公楼知之甚少。当我后来调入校长和党委办公室工作时，彭书记退休了。所幸的是，彭书记退休后，他的办公室还保留，更幸运的是，我负责校史编写和百年历程展的编制，和彭书记有了深度交谈，彭老精神上 and 骨子里的那种坚毅、高尚、超凡脱俗的品质让我折服。这个期间彭老因为健康原因，几乎都是在医院，而我和我的写作团队，多次在人民医院和彭老比较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北医的发展历程。

校史之前，仅有一两次涉及写人物和彭老有过接触，印象极深。那是2000年前后，北京市教委组织编写新中国北京高等教育的开拓者，胡传揆院长在名单之中。当时两办都是年轻人，对于胡传揆老院长几乎不了解。我和李晓霓接到撰写任务后，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当时王德炳校长说，关于北医的历史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最了解情况的就是彭老书记，吩咐我一定要请教彭老。

彭老和胡传揆院长在一个领导班子里共事多年，他们那代人正好经历了建国前后教育体制的转型变化，我把北京市教委撰写提纲给彭老，彭老看后沉默不语，我和晓霓尴尬的坐着不知所措，他反复看着提纲不说话，后来我为编写校史多次采访彭老，才了解这是他激烈思考的一种方式，只有遇到复杂问题，彭老才会这样，他在脑子中回忆、思考

和组织词语。过了好一会，彭老说：“胡传揆院长是一位治学严谨、潜心学术的专家，写新中国后胡院长在专业领域，特别是胡院长在刚建国时期带着医护人员对华北地区性病的消灭做出的贡献，更贴近胡传揆院长的真实情况。”

我们根据彭老的指点去整理、收集胡传揆的资料，当我们完成文字稿请彭老审阅时，彭老说：“写一个人物，比如写新中国教育开拓者这样的人物，要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里写。北医最宝贵的是一批教授和从国外回来的人才，在建国前后对医学教育的坚持和坚守以及后来的转变与改造，胡传揆院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段历史背景的复杂是你们需要了解的。因为旧知识分子对医学教育的理解和建国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期望是有不同的。如何协调建设、发展和改造等之间的关系，党的干部在当时起的作用非常大。文章资料的组织和表达要全面，要贴近历史真实，而不是一种套路和框框。写人物要实事求是，要放到一个大环境背景下去分析，不能因为某些政治因素有不实的美化或牵强。”

我原本对人为想象拔高的宣传笔法就有抵触，而彭老的这次谈话，而且是一个老的地下党、老书记在和我谈历史人物，除了我们共鸣以外，对我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影响很大。

彭老在2015年1月7日故去，胡传揆和彭瑞聪都成为医学教育发展史中

的人物，当教育处俞赤卉老师邀请我给2018年入职的新教师和带教研究生讲校史，我重新整理建国这段时期的医学教育发展线索时，胡传揆和彭瑞聪两位前辈跃然眼前，两个人的成长途径和所处的时代，我才明白彭老二十年前所讲的新旧教育制度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梳理校史中关于建国后北医的管理体制问题。文字档案资料显示，建国后北医的管理体制依然是院长和院务委员会负责制，直到1954年11月，第一次党代会后，确立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梳理这个时期的历史，在体现管理体制的文字表达上，有专家认为，建国后全国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北医这个时期要写上党委领导。言外之意我当然明白，就这个问题，我和彭老交流，老人说：“北医地下党一直都在工作，建国后按组织指示，一直做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新管理体制建立的工作，虽然是配合工作，但并没有离开党的领导，这也是建国以后，高等教育过度阶段的一个实际情况。”

彭老对这段历史的文字表述非常支持并认同，对我说：“依据史料表达文字，事实是什么就反映什么。校史专家组的老领导们和彭老的意见一致，这也让我们编写人员轻装、严谨、求实的梳理北医历史脉络。”

采访彭瑞聪，我惊叹于老人的记忆，对北医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件重要事情，在细节上的记忆非常准确。在校史“改革开放”部分里，我们把科学大会的时间写成1980年，他马上纠正：“你不用再核查，是1978年”。当然，我们事后还是查了，钦佩于他对历史了如指掌。在医院里，彭老手执放大镜逐字逐句地看我带去的历史长卷，之后抚卷感叹：“不容易啊不容易，难得能把北医的历史脉络梳理得清楚。”同时，他会指出几处需要考证的细节，并特别指出：“在梳理建国后历史时，应该给曲正同志一个公平评价，他对北医的发展功不可没。”

我和彭老是忘年交，每次采访，老人都超过规定的探视时间，总是意犹未尽，我既想多听他讲，又担心老人太过疲劳。老人只要能下床，就会送我到电

梯门口，继续边走边谈；后来他病弱的下不了地，但会吃力而倔强的举起右手，与我告别。这种时候，我心里每每都会感到发紧，想为老人做些什么，但又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的思想和他的亲身经历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存入档案。

在校史工作中我遇到许多难题，其中一个：由于时代的不同和对问题看法的角度不同，老人对有些历史问题的评价与现任领导的有很多差异，当时身为班子成员的我，常处在纠结、焦虑的矛盾焦点，弄不好就会遭人误解，两头为难。是与彭老的几次访谈使我沉静下来，因为他身上，我体会到那种真正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风骨。正因为有这批值得尊敬的北医老人做榜样，校史梳理工作才能让我从紧张、忙乱、被动的焦虑状态里逐步解脱出来，变得从容自信，有的放矢。

合校前的历史，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我都和彭老交换过意见。其实我们有时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不同的角度，会影响对事件和人物评价。作为老人和长辈，作为北医资历最深的领导，我对他的观点和看法尊重和钦佩，但我认为很多事情和人物，如果不拉开一点距离或是更加客观一点分析看的话，主观意愿会带到文字的表达中。比如对文革期间的事件和人、对各个时期的运动等等，我更加希望对事件和人物的陈述多些，少一点形容和带有情感的语言，老人对此非常认同。让我感动的是，每次我们长聊历史，老人除了把自己的经历的事情、人和盘端出外，更多时候认真的倾听和观看我们送去的文稿。北医百年历程展的初展和预展，彭老都亲临现场；百年校史的套书，彭老亲自撰写总序，深刻反思学校的发展，其实也是在总结和思索他自己的人生。我真的庆幸因为编写校史能走近彭老，和他就封尘的事件和人物对话，阅读彭老，就是阅读北医，这份厚重的长卷，无处不体现彭老和北医的一个时代精神：严谨、求实、坚毅、承担、包容、探索。

编纂校史的18个月，是我人生中最

艰难的时期，感觉自己仿佛走进茫茫沙漠或遮天蔽日的雨林，收集资料，艰辛编写，在历史里穿越。幸亏由王德炳、徐天民、程伯基、张质、姚树印、廉志坚等老领导组成的顾问组，他们都退休多年，但在北医百年的感召下重聚一堂。这些年愈古稀的老前辈都是北医历史的亲历者，学校管理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定期参加校史组讨论，从事件到人物，从提法到措辞，提出问题和建设性意见，不厌其烦地搜集记忆，核实史料，让人身临其境地讲述北医历史上的昨天，对我们了解并且提炼历史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要客观写史，就得保持冷静和距离，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历史，不仅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还预示了我们该往哪里去。历史发展虽受条件限制，历史事件和历史任务虽然都已“过去时”，但对它的评价并非板上钉钉，需要后人客观地评说。北医还会有许多个百年，我们从现在开始更要具有历史意识与责任感，尊重前人留下的遗产，并为后人留下值得书写的篇章。

编写校史的过程虽然不易，但事后回想，那五百多天的编史工作，也是五百多天沉着的成长，是对历史与今天、个体与集体、政治与科学、局部与整体关系的悉心思考。人生是由许多驿站连接而成，每一站都是独一无二的。退休，只是一个节点，是人生又一个阶段的开始。

回想自己在北医工作的三十四年，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学校的名字也从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到北京大学医学部三次更名，每一个阶段学校的重大事件，都是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从一名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入校从事学生思想工作开始，到职业生涯的后期专注编撰校史、编制校史展并留下一卷北医校史，我做了我想做的事，也做了我能做的事。我非常感恩自己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感恩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我成长的轨迹离不开党的教育和培养，离不开北医诸位前辈的关爱栽培，更离不开国泰民安、民富国强、安定繁荣的祖国。

# 使用世界银行贷款，提高医学教育水平

## ——北医使用世界银行贷款的历史回顾

文 / 北京大学医药卫生分析中心 范宪周



### 作者简介

范宪周：研究员，高级教师，河南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留校任教。1961年调入北医新专业放射医学基础教研室。1981年调到学校项目办公室，专职负责世界银行贷款工作，后又调到学校直属单位，医药卫生分析中心任副主任。2000年北京医科大学合到北京大学，时年64岁退休。1990—2000年曾连任两届北京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会理事长工作。

为了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1980年国家教育部从世界银行得到50年还期的无息贷款，给北京医学院（以下简称“北医”）500万美元。1982年国家卫生部又从世界银行争得高等医学教育贷款，给北医200万美元。卫生部从农村卫生项目中专项给北医临床药理研究所50万美元。北医先后共得到750万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以下简称“世行贷款”）。

为了用好管好“世行贷款”，学校成立了项目办公室（有的学校叫贷款办公室），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并从学科教研室调出来教学人员加强这项工作，经学校党委彭瑞德书记亲自谈话后，我从放射医学基础教研室加入到项目工作办公室，在设备科任副科长，后又参加组建了物资处并担任副处长，专门负责“世行贷款”工作。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世行贷款”在北医的使用情况及对北医的影响，也是记录新中国发展过程中，高校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发展的一段历史。

### 使用“世行贷款”建设的项目和成效

根据世界银行（简称“世行”）的要求，北医要提交使用“世行贷款”的项目报告书，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所具备的条件，

通过引进仪器设备和人员培训的方法，达到预期的项目目标。在学校教育处的配合于支持下，如期完成了贷款项目。“世行贷款”主要用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 1、成立中心实验室——分析计算中心

为了提高大型精密仪器的使用率，发挥更大效益，成立了分析计算中心，实行专管共用，并分为以下三个组，分别是：

（1）化学分析组，由高从元负责。引进的主要仪器有：气—质联用仪，核磁共振波谱仪，红外分光光度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等。

（2）生物医学组，由郑富盛负责。购入主要仪器有：电子显微镜、冷冻切片机、照相放大机、显微分光光度计、图像分析系统、流式细胞计等。

（3）计算机组，由王义宗负责。购入日本富士通 M340S 中型计算机、20个终端机、个人计算机等。

分析计算中心的成立，为全校医药卫生各个学科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服务技术，特别是后期还通过了国家对精密仪器的计量认证，使得所测数据得到国家和世界的认可，大大提高了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水平。计算机的引入，率先实现了计算机教学，在科学计算、学生实习等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也为后来的信息化、网络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 2、视听教育建设推动了教学科研工作

成立电化教育中心，购置全套语言实验室，引进彩色摄像机、编导录像机、编辑放像机、监视器、投影系统、复录机等仪器设备。为基础医学课、临床课、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拍摄教学片六百多部。为医学教育提供了现代化技术，并把这些技术推广到各个方面，如：科学研究片、外语培训、闭路电视网等等。

#### 3、加强了图书馆建设

在新任图书馆馆长李学愚教授的指导下，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微缩胶卷摄像机、微缩胶片制作设备、微缩胶片阅读机、复印机、微型计算机等仪器设备，开创了微缩阅读服务和复印服务。以后又发展为微机网络服务。购置了350多册原版书目，又派李学愚、尹源、刘桂兰、张大生等人到国外培训、学习。大大提高了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技能。

#### 4、提高了基础医学课的实验技能和科研水平

（1）为生物化学学科引进了高速冷冻离心机，柱层析系统、电泳仪、薄层色谱扫描仪、紫外分光光度计等先进仪器，在教学和科学实验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时任教研室主任的张昌颖教授带领全室同志开展了一系列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来自参加实验，指导研究生工作。

（2）为生理学科引进了神经信号微电泳系统、医用数据处理系统、立体定位仪、双线记忆示波器，拟定程序电—血压测定装置、连续记录摄像机、血气分析仪、电刺激器、生理记录仪等。这些先进仪器的引进，对当时的生理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先进技术和手段，促进了学科发展。韩济生院士利用这些仪器带领研究生做了一系列科学实验，取得了重大成果。

#### 5、公共卫生学院成立中心仪器室。

王耐芬教授任主任，引进了原子吸收光谱仪等化学分析仪器，为公共卫生学院的科学实验提供了服务。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世杰教授多次到实验室检查指导工作，督促公共卫生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 6、为药学院中心实验室引进设备。

药学院中心实验室引进了高压液相色谱仪、荧光分光光度计、红外分光光度计、元素分析仪、高速冷冻离心机等分析仪器。同时还为生药学和植物学两个学科分别引进了高档自动照相显微镜、相差显微镜以及相关辅助设备，推动了药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生药学家岑教授和植物学程静容教授、都分别带领自己的团队和研究生做出了多项科研成果。

7、为学生的形态学实验室更新和补充了600多台生物显微镜，保证了组织胚胎学、生物学、寄生虫学、病理学、生药学和植物学的学生用显微镜。加强了显微镜室的管理，基本做到了学生借用显微镜不出楼。

8、为学生的机能学实验室购置了12套四套生理记录仪，取代了古老的熏烟记纹鼓，使得本科生的机能学实验室（生理学、药理学和病理生理学）有了一个可以说是时代性的变化。

#### 9、推动了几个特殊项目的建设和发展

##### （1）口腔医学建设项目

在口腔医院鞠九生副院长的主持下，引进了15套牙科综合治疗台。2台牙科X光机，还有自动幻灯机、仿头模、五人共览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等设备。在教学、科研和临床服务工作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1985年，鞠院长接待了卫生部、贷款办公室李洪年主任和高上处长对口腔医学项目的检查工作，在参观和听取汇报后，卫生部领导对该项目的执行情况和效益表示满意。

##### （2）继续教育项目

继续教育项目是卫生部要求立项的，在学校教育处郑鸿模处长的主持下，统筹了医院和基础的关系，配备了各种类型的设备，如：五人共览显微镜、倒置显微镜、解剖显微镜、眼科用同视机、



1985年，生化教研室主任张昌颖教授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引进的仪器指导侯伟民研究生进行科学实验

裂隙灯显微镜等，还为各教学医院配备了电子显微镜，对学校的继续教育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 (3) 临床药理项目

在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李家泰教授的领导下，引进了高效液相色谱仪，薄层层析扫描仪、告诉冷冻离心机、荧光分光光度计、电泳系统等科学仪器，使临床药理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使其研究水平赶起了世界。

### 10、培养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才

世界银行规定，我们的贷款项目，必须把 10% 的资金用于人才培养，主要是技能培养。我校使用“世行贷款”出国培训的人员近百人，时间有长有短，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提高了业务水平和能力，对贷款项目的完成、对学科建设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 对“世行贷款”的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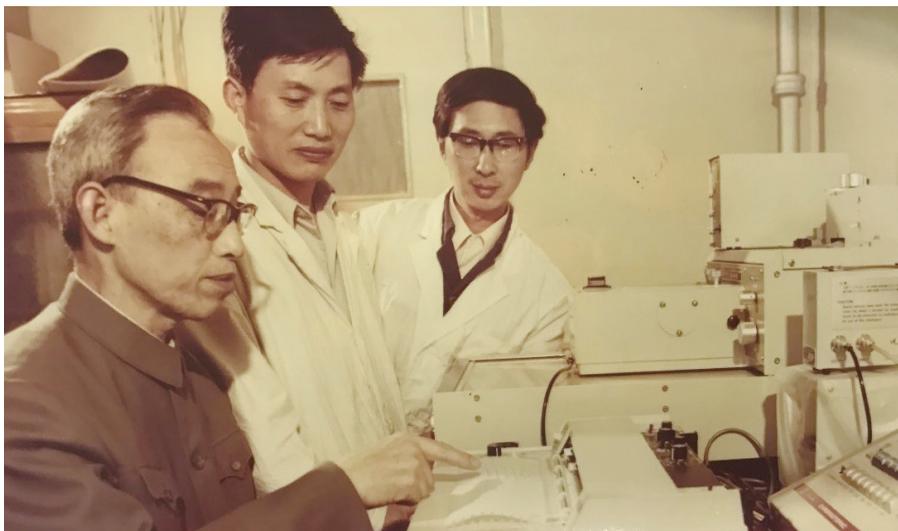
关于世界银行贷款对北医发展的影响，北医原党委书记彭瑞骢教授在回忆录中写道：“1980 年教育部有世行贷款，经过教育部的王镛大力协调，我们获得了 500 万美元。这笔贷款既可更新设备，也可用于人员培训。当时的党委常委、院务委员会成员统一认识，根据教研室的发展，决定以培养学科带头人为主，要在全校选拔人员出国进修。通过各种渠道，北医要实现人才队伍水平的提高。……事实证明，这些举措为巩固当时北医成为国内医学院校‘排头兵’的地位，以及尔后的新发展做了很好的人才储备，打下了坚持的基础。”<sup>1</sup>

就个人来看，我认为世界银行贷款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的体现，在国家还不富裕的情况下，采用向世界银行贷款的方式，为高等院校购置科学仪器，培训科研人员，提高教育科研能力，赶超世界水平。这体现了我国党和政府

<sup>1</sup>彭瑞骢：《彭瑞骢回忆录》，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版，135-138 页。



1985 年韩济生院士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引进仪器进行科学研究，指导研究生分析实验结果



1985 年楼之岑院士利用科学仪器指导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

对人才培养和提高高校科研水平的重视。教育部和卫生部通过认真组织实施该项工作，要求和指导各个院校积极组织落实，制定计划，管好、用好“世行贷款”，把教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北医领导非常重视这批贷款的使用，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积极组织人员，制定计划，落实具体实施工作。成立了校、院两级的中心实验室，购入大型精密仪器、实行专管共用，管供结合，提高仪

器使用效率，发挥更大效益。“世行贷款”虽已成往事，但是其意义重大，在当时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这笔贷款为各个学科配备了急用的科学仪器，在老教师的带动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也提高了教师的水平。最为重要的是“世行贷款”为学生实验室更新和补充了科学仪器，强化了教学改革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实验技能，为北医乃至整个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 七十弦歌

文 / 北京大学医学部基建工程处 崔新东



## 作者简介

崔新东，男，1937 年 11 月出生，1956 年参军并考入防化兵预备学校，1960 年军校毕业。历任：军事教员，政治干事，学员队副政治委员。1985 年转业到北京医科大学。历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后勤党委副书记，基建处处长。副研究员。1998 年 2 月退休。

在历史的长河中，七十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我们共和国的七十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作为一名年逾八十的老者，我见证了共和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历史性卓越飞跃的光辉历程。同时，我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跟随共和国的脚步，不断进步、成长和提高。我深感三生有幸。

## 龙的新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国的老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龙的新生，真是来之不易。是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所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于一九三七年出生于河北冀南老区，家境贫寒，上小学时当过儿童团团长。记得四九年春，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到大路边排队，我带领同学们喊口号，欢迎东北大军南下。当年在我年幼的心里，就对部队的威武雄壮，非常地崇敬和热爱。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积贫积弱，不要说飞机，就是汽车也不能制造。而美帝国主义却在此时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妄图趁机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毅然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谱写了一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雄赞歌。当时，我正在读中学，老师让自拟题目写作文，我写的题目是“给杜鲁门的一封信”（杜鲁门时任美国总统）。文中痛斥美帝的侵略罪行，同时歌颂了志愿军英勇作战的光辉业绩，作文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为了报效祖国，积极报名参军，并考取了防化兵预备学校。我到广东佛山学文化，学军事，并担任了学员队的班长。由于学习努力工作积极，思想要求进步，我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到一九五八年毕业时，无论是文化课程，军事训练还是体育项目，我都获得了“5”分的优异成绩。此后我又转入北京化校本科学习，经过摸爬滚打的艰苦训练，于一九六零年军校毕业，并被授予少尉军衔，留校任军事教员。

六十年代初，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以为有可乘之机，蠢蠢欲动，叫嚣要反攻大陆。党中央命令我军做好一切应对准备，以重兵开赴东南沿海备战。我和同事一起被派往浙江平阳县前线。当时，我们在海边上和战士们一起构筑防御工事，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彼时，打仗的气氛很紧张，

每人的领章上填血型，以备受伤救护时用。每个人填写好家庭籍贯住址，以备牺牲后往老家寄送遗物。我作为军官，能以身作则，无所畏惧。我带领战士们，坐在海边的沙滩上，快乐地唱着“海风吹，海浪响，人民战士守海防”等革命歌曲，给战士们讲故事，鼓舞大家的战斗热情。

由于我军的重大举措，严防以待，把蒋介石吓破了胆，最终未敢来犯。

我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一向以开拓创新著称。毛泽东主席就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诚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面对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形势，在进行革命探索中，也曾出现过重大失误，但是我党有着自我革命的光荣传统，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

### 社会主义的真谛

经过了一番风浪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和践行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拨乱反正。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九七八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平反冤假错案，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经济特区，抓大放小，把经济搞活。当时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万元户”，成为大家羡慕的一个新风景。

在此期间，我在部队由训练部门调到政治部工作，先任政治干事，后又调到学员队任副政治委员。我在学员队的工作，紧张并快乐着，同时也不断积累着做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才干。这时，党中央对时代特点和国

内外形势进行分析和研判，为了减少军费开支和加强国家经济建设，决定裁军 100 万。

我于八五年转业到北医，任后勤党委副书记。由于多年在部队做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历，我到后勤党委工作，应该说是轻车熟路。但考虑到地方和部队不一样，我决心踏下心来，积极学习，深入职工群众，摸情况，搞调研，了解各个科室职工群众的所思所想，各个单位工作的重点难点和诉求，以便从实际出发，针对其特点，积极开展并努力做好后勤的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工作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被学校评为思想政治教育副研究员。九四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到基建处任处长。对基建工作，我是个门外汉，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重托，我是边干边学，恶补建筑工程知识，向书本学，向处里有经验的同志学，不耻下问，在工作过程中学。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不断增长才干，虽然有苦有累，但在学校坚强领导和处里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建好了五栋楼，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任务，取得可喜的成绩。

### 厉害了我的国

我们共和国的七十年，超越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几百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国家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龙腾虎跃。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所以老百姓常说，厉害了我的国。

习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为解决当今世界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习总书记的大国外交，彰显了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和中国力量。他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已树起了一个解决世界经济合作的光辉典范。因此，老百姓说，习总书记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世界领袖。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加强经济建设，稳中求进，富国强军，建设生态文明，创建美丽中国，特别是打好脱贫攻坚战，一个不落。实现全部脱贫，走上富裕道路，这是中国几千年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即将将它彻底解决。真可谓功高盖世，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所以我们生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深感幸福和自豪。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奉献到老。

我是一个诗歌爱好者，面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心中充溢着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大好局面，正所谓：“国运亨通奔富强，筑梦路上凯歌扬家，党的光



辉暖人心，让人怎能不歌唱”。美好的大环境，更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十几年来，我创作了百余首歌颂伟大的党、祖国的诗歌，弘扬主旋律，传播真善美，并且汇集成了三本诗集：一曰《春天的歌》，二曰《柏树的琴声》，三曰《秋天的枣树》，分送给了亲朋好友，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鼓励。

由于大家的信任，我被选举为后勤退休第三党支部书记。按说，我在岗位上做过多年的党委工作，担任支部书记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我并不掉以轻心，而是为如何加强退休党支部这个堡垒的建设，认真思考和研究。我针对退休党支部的情况和特点，积极开展工作。考虑到支部党员年龄大，体弱多病，居住地分散等情况，我就经常主动与党员电话联系，嘘寒问暖。我把每一次的支部活动，都精心设计为一个主题党日活动。2008 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我组织了“迎奥运，树新风，当好东道主”的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大家学习十句迎外宾的英语。每次支部活动前，都进行学习和朗读。

我还积极带领党员献爱心，为困难群众、地震灾区捐款，并带头捐献新棉被。在担任支部书记的十几年中，曾多次被后勤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退休第三党支部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立德树人，示范引领，为党旗增辉”主题党日活动优秀奖。

我积极参加医学部、海淀区及花园路街道办事处组织的文体活动。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年都参加离退休工作处和社区居委会举办的迎新年，纪念党的生日“七一”和重阳节等联欢娱乐活动。有时我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有时朗诵古典诗词，都获得了大家的鼓励 and 好评。2019 年 1 月，我受邀参加了后勤党委举办的表彰后勤工匠大会，在会上我朗诵了我创作的小诗“后勤工匠赞”，赢得了热烈掌声。2018 年 6 月，我参加了花园路街道办事处组织的传承红色文化迎“七一”诗词朗诵比赛，我朗诵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荣获优胜奖。2016 年，我参加了海淀区在北京女子学院举办的古典诗词大赛，我朗诵了岳飞的“满江红”，荣获优胜奖。

为了强身健体，我参加了学校门球队，同时被推选为门球队队长。由于我在门球活动中，积极努力，热心为大家服务，后来又被选为花园路街道门球协会会长。街道门协下属 30 多支球队，队员总计 300 多人，我和门协的同志们一起，精心组织一年五次门球比赛。门球活动搞得生动活泼，风生水起，在参加海淀区的门球比赛中取得了优良成绩。在此期间，我还义务担任北医社区 25 号楼的楼组长 10 多年，我不顾年老腿痛，上下楼梯的困难，一家一户认真收齐卫生费，通知传达各项相关事项，发放物品等，热情周到地为居民服务。

我感到生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很幸福，很充实。仿佛变得年轻了。诗曰：勤奋拼搏几十年 无怨无悔心坦然 劝君莫道桑榆晚 新的长征勇争先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2018 年，我荣获了北京大学老有所为“学习之星”奖，倍感振奋，写下如下感言：

八十有一喜获奖 学习之星不敢当 未名湖畔春风吹 阳光心态再起航

# 一心跟党走，为祖国的富强奋斗终生

■ 文 / 原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李东方



## 作者简介

李东方，男，汉，1942年11月19日生，北京市人，大学学历，研究员，副局级干部，共产党员。1960—1968年，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六年毕业。1968—1971年，甘肃省榆中县水岔沟煤矿医务所，医生。1971—1980年，甘肃省榆中县卫生防疫站，医生。1980—1983年，北京市东城区卫生防疫站，副站长。1983—1990年，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副局长。1990—1994年，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1994—1997年，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书记。1997—2002年，北京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08年底退休。2004年，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科学养生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

我生于1942年。因为赶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上小学，所以在国民党统治结束前的北平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时的北京，读了两次小学一年级，可以说自己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孩子。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他不朽诗词中所写的那样：“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伟大祖国成立70周年，70年风云变幻，70年天翻地覆。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我为祖国的日益强盛和欣欣向荣而倍感自豪。

## 大学前的教育为我奠基了好的基础

我的童年是幸福欢乐的。父亲在北京地安门内东板桥大街经营这个区域内最大的酱菜园。就像电视剧《芝麻胡同》描写的那样，生产黄酱和各种酱菜。除了制作场所外，父亲还在这条街上开设了天增号副食店及天增栈菜店，又在西安门大街北大医院附近设了两个分店。所以，我童年的生活水平处在社会的中等。

我的小学是在东板桥小学度过的。我最早加入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每年都能参加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五一”、“十一”庆祝活动。我放过气球与和平鸽，每年国庆节都能在检阅游行结束前跑到天安门城楼下，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向

我们招手，真是无可比拟的欢乐和幸福。

初中阶段，我是在家族纷争、财产分家下，经历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改造。划家庭成分，我家定为商业资本家，我不可避免地产生思想包袱和压力。但我喜欢读书，还是毅然考入了北京二十二中学的高中部。

高中阶段，党团组织在政治思想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忙，培养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教导我放下思想包袱，正确认识家庭出身。当时我学习成绩虽好，但不敢在大众面前讲话，组织上让我们参加了多方面的文艺体育活动，选我做学习委员。我参加话剧队、京剧组，还学会了说相声。党团组织又支持我参加全区和全市的作文比赛，我描述总结参加大炼钢铁的场面和体会，取得了好成绩。到高三后半年，党团组织让我担任农医班干部，并动员我报考北京医学院比较新的专业即公共卫生系。

## 北医“厚道”精神培养我成人

很庆幸，我没有辜负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入了北医公共卫生系。使我记忆如新的是，报到那天，在新生报到处，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非常欢迎你成为北医的一员，你要先到生理楼见一下校宣传部杜部长。一下子，我很忐忑，摸不着头脑。原来是让我到学生会红旗广播台担任播音主持，业余做社会工作。

我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北



医跃进厅舞台西北角的广播台播音室接受任务。这个难得的经历，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除了完成繁重的学业外，我几乎每天中午饭前都要到广播室播音，等全校师生饭后回宿舍休息后，我才能去吃饭。但是，我受到食堂师傅们的关心和照顾，我感到十分温暖。那时没有电视和手机，广播台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除了学校新闻，师生来稿，我还要直播国家的重要文章，还要播新出的小说《红岩》等。每天半小时连播，重要播音内容经常要在深夜人静时提前录音。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播音在北医也是小有名气了。这项业余工作一直干到上临床实习。这项业余志愿服务的社会工作，对我的能力与毅力锻炼很大，意义深远。我体会到在上学期期间，学生应努力参与社会活动，从事尽可能多的志愿

服务很有必要，而且十分有益于学生的成长。

大学期间，面对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磨炼，以及每年去农村的劳动，都对我一生的成长意义重大。学校教书育人，学会做有道德的人才才是首位。由于社会工作多，对于怎样提高学习效率，不影响正常学业，我摸索了一些学习方法，取得了好的效果，学习成绩仍能保持优良水平，1963年我获得了北京医学院三好学生奖状。

1966年6月，在毕业分配之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停课闹革命期间，我没有选择逍遥派，而是参加了当时掌权派八一八联合总部的广播密传工作，这期间还参与中央卫生部慰问医疗队的密传工作。我到武汉制止武斗流血事件，直到1968年国庆后，我才被重新进行毕

业分配，奔赴大西北，到甘肃省榆中县贫困地区工作，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 知识青年到艰苦农村去大有作为

在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及“6.26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去”的指示下，我在1968年10月被分配到甘肃省榆中县工作。当时的政策是这些大学生必须到县以下卫生机构，我想留在市地区、县等大的医务部门的幻想破灭了。

头一个月，我被任命为巡回医疗队队长，率10名医务人员，包括县医院2名护士，先去最艰苦的北山农村。由于没有干净水喝，更没有洗浴条件，不到两星期，我们大都肠胃炎病倒，只能受命回县城待分配。

由于只有我一个人学过职业病，就被分配到县属水岔沟煤矿医务室。这里离公路 30 里，没有电，喝缺碘矿泉水，矿工提煤油灯在下井挖煤。在这样艰苦条件下，除了矿工门诊及三个矿区出诊外，我还要为北区农民昼夜出诊服务。

近三年时间，我学会了上山采七十多种中草药，也学会了抓药配方，炮制草药与中药丸，掌握了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技术，这是在北医学不到的。除此，我运用在北医公卫学学到的职业病防治知识和技能，在无电条件下，把煤油灯换成从北京门头沟煤矿采购来的电石矿灯。同时，我帮矿领导策划，从公路电站接通了电，更换了充电矿灯，改造了湿式采煤掘进机。我还在矿区建立一个小型广播室，培养了一个播音员，每天宣传新闻及防病安全知识。我们从中体会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贫困落后的地区，传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是大有作为的。同时，我也在艰苦环境中不断磨练自己的思想和意志。

1971 年，我被调到榆中县城，负责筹建恢复防疫站。回归专业本行后，我负责专业技术。工作了近十年，我摸索了一套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中西医结合的疾病控制工作体系和适宜技术，在有效控制传染病爆发流行，保护生产和健康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流行病调研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北医公卫学院连志浩教授的指导，我完成了榆中县不明原因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有效控制了这起引种食用马牙豆的慢性中毒疾病的流行，这个案例报告一直在北医公卫学院流行病学教学中使用。

### 在北京东城区卫生系统的开创性工作

1980 年 8 月，为照顾老母亲，按政策和组织关照，我调回北京市东城区工作。

在东城区卫生防疫站流行病科工作仅半年多，就赶上中央组织部要求，从

40 岁以下高学历知识分子中选拔一批各级领导干部，我刚好 39 岁，很多老学长们都超龄了，这样，我就担任了防疫站（现为疾病控制中心）副站长。此期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承接北京市卫生局任务，试点在各医院单独组建肠道门诊，肝炎门诊和发热门诊的可行性及管理标准与监督办法。我领导了此项工作的调研，以点带面创建这几个隔离区门诊，亲自写出了调研报告及相关管理办法。试行一年后，市政府决策全市各级医院推广东城区管理试点，完成了全市性医院防病管理改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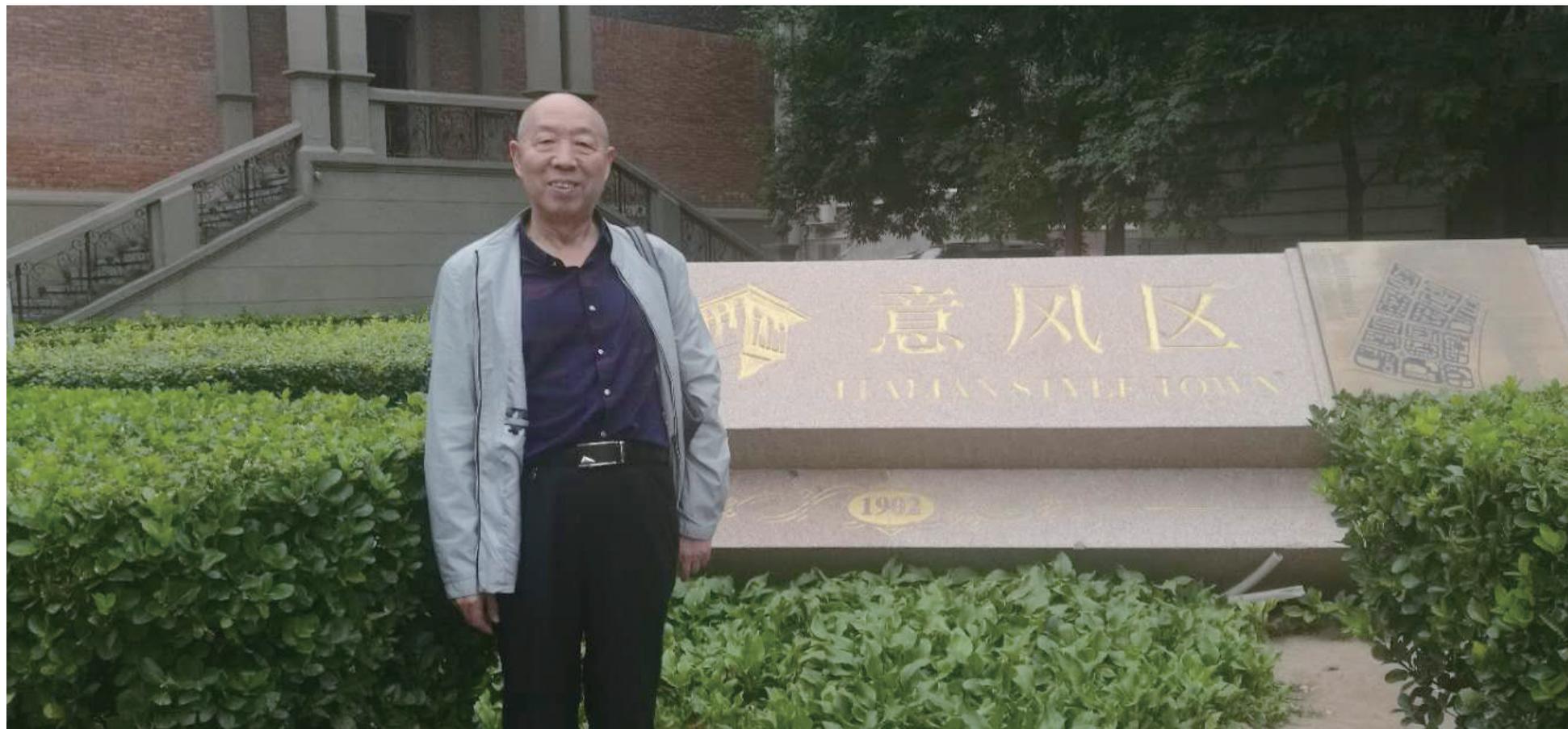
任职防疫站副站长两年后，我调任东城区卫生局副局长，并被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我任职东城区卫生局副局长及正局长的十年中，除了改革与管理全面工作考核中取得全市十八个区县第一名奖励外，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卫生部和市卫生局领导下，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研究推行城市卫生发展项目。我们开创性建立全区街道的初级卫生保健网，并在街道社区试点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老年人家庭病床。我们建立全市第一家临终关怀病区，把城市居民的健康，从小到老形成系统管起来。此项改革探索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并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赞许，授牌成立《WHO 中国北京东城城市卫生发展合作中心》，任命我为首任主任。可以说，这项改革成果成为目前全国推行社区卫生服务体制的重要基础。

### 渴望回母校工作的愿望终于实现

离开母校在外奔波二十多年。虽说得到了锻炼，也取得了点成绩，但终究感到不适应官场的生活。我非常希望能再在母校讲台上教几年书，在学术圈里深度研究一些重大问题。

1994 年下半年，我终于离开北京东城区卫生局，在母校领导支持下，调回



北医公共卫生学院，除了兼任学院党委书记外，还承担社区医学部课程的教学任务，把理论知识同自己在城市与农村社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体会相结合，在本科生、研究生及专科生课堂上，传授自己的观点，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感到十分幸福。

没想到的是，1997 年初，学校领导调我担任副校长兼后勤党委书记，我又回到了行政管理领导岗位。

从接任这个岗位到退休，只有五年时间，实际上仅有三年，后面两年因为与北大合并，我已退居二线。除了日常管理工作外，印象最深、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基本建设与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探索。

任职期间的基建工程，主要是宿舍楼改造及新建，完成了家属楼 25 号、26 号、27 号及 7 号职工筒子楼改造。在原破旧的五一楼、五二楼位置，我们从工商银行借款五千万，建成 5 号楼新

学生宿舍楼，同时，完成了 2 号、3 号、4 号老学生宿舍楼的加层改造，这一系列工程大大缓解了学生住宿及家属住宅的困境。

高校后勤系统社会化改革是党中央的重要决策、顶层设计，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亲自抓，要求北医和北科大试点先走一步，以改造教职工住筒子楼问题为突破口。我校率先完成了原 7 号筒子楼改单元楼任务，受到李岚清同志的好评，并在北医召开了筒子楼改造现场会。接着就是后勤社会化机构改革，由理工大、邮电、北医、北科大、清华五所大学先行试点。我校组建了后勤系统小机关大实体的机构，成为北医后勤集团总公司领导下属扩大的各实体，由我兼任公司董事长，徐善东为总经理，郭富堂为监事长。这种体制下，各实体主动性强，企业化管理有活力，后勤职工收入及福利明显提高。对这项改革，

学校上下争论很大，因此，我亲自在学校各部门、各附属医院举办报告会，宣讲对中央决策的认识及北医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方案与规划。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北医同北大合并的体制改变，北医后勤社会化改革失败了，但是，我认为改革的大方向正确，贯彻党中央决策的态度积极。由于国情、校情不同，这种改革为时过早，虽然，我挨了不少骂，非议也多，但我努力为北医改革费心出力是值得的，也是自己一生中的很大锻炼。

### 退休后发余热为健康中国多做贡献

退休生活开始后，我被邀请参加了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的工作。我担任过理事，主要在科学养生专业委员会任名誉主任。这十几年来，我走遍了

全国二十几个省市，也去过一些小县市及农村，做了大量的提高居民健康素养的科普宣传工作。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健康中国”的号召，“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中央“健康中国 2030 年规划”正在实施，我将在此项伟大事业中继续努力工作，把余生奉献给人民的健康事业。

我快进入 80 岁了，新中国 70 周年的巨大变化历历在目，一生相伴伟大祖国的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共渡难关，共享幸福，亲眼目睹着 70 年的变迁，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的正确坚强领导，就不会有富强中国的今天。作为一名党培养的普通干部，今天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为祖国画出了让中国强大富裕的蓝图，创造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我决心一心一意跟党走，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人民的健康生活而努力贡献终生。



# 不忘初心追日月，桃李芬芳熠余晖

## ——访北大医院谢竹藩教授

■ 文 / 2014 级临床八年制 马嘉翼、陈丹阳



### 人物简介

谢竹藩，男，1924年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名誉所长。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后参加工作。中西医结合学界奠基人之一，中医药国际交流领军人物，曾获科技进步奖3项，国际科技合作奖1项。2017年被评为第三届“首都国医名师”。

谢竹藩教授是中西医结合学界奠基人之一，是学生们仰慕已久的老前辈。他16岁就进入燕京大学，后来因为战乱，燕京大学停办才改读北京大学医学院。一开始学的是西医，后来转学中医，之后的几十年他孜孜以求，矢志不渝，专注于中西医的理论融合和相互借鉴，最终成为中西医结合学界奠基人之一，中西方医学交流的使者，是当之无愧的中西医结合泰斗。

采访中我们和谢竹藩教授相谈甚欢，老人家给人的印象平易近人，随和风趣，听谢竹藩教授娓娓道来他70多年里难忘的从医经历，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激励。

上世纪60年代，谢竹藩教授随医疗队赴甘肃民乐县农村支边。在缺医少药条件简陋的农村，他使用廉价的中医针灸和草药，竭尽全力为当地农民消除病痛。据谢竹藩教授讲，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个1岁多的幼儿，患呼吸道感染合并心力衰竭，口唇青紫，奄奄一息，当地的医生已经放弃治疗。谢竹藩教授靠非常简单的中药结合针灸治疗，最后患儿竟然痊愈了，这事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后来谢竹藩教授被调到北医，负责编写《农村卫生工作队医疗手册》，手册成为全国广大农村医疗战线的标准工具书，对农村基层的医疗卫生工作贡献很大。

改革开放让中国把视角转向世界，世界也对新中国投来好奇的目光。谢竹藩教授预见到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益加深，中医必要逐步走向全世界，同时也

也认识到想要向西方介绍传播中医理论，最重要和紧迫的就是中医的英译工作。

为此，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谢竹藩教授便和北医外语教研室主任黄孝楷教授开始探讨中医英译的工作。时至今日谢竹藩教授仍然笔耕不辍，坚持中医翻译工作，先后参与及主编了《汉英常用中医药词典》、英文版《中医内科学》等多部词典和专著，为中医走向世界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谢竹藩教授是在架设中西医交流的桥梁，那么这些著作和专用词典就是交流之桥的桥墩和钢索，如今已经95岁高龄的老教授仍然在为她添砖加瓦。

1981年，谢竹藩教授受北京医学院的委派，到美国旧金山太平洋医学中心开班给当地的针灸医生讲授中医基础理论。在首次安排的中医介绍会上，他使用了统计学的数据处理方法向外国专家展示了中医的疗效，消除以中心临床药理主任Levy教授为代表的，美国医学专家对中医的误解，使报告获得圆满成功。

中医的推广有了一个好的开端，相关机构的邀请纷至沓来。出访期间他受邀到过Palo Alto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Davis分校，Sacramento分校，甚至到东海岸波士顿哈佛大学讲中药课。培训结束后加州政府教育部特地开会他向颁发嘉奖令，指出“谢竹藩教授在东西方文化隔阂之间架起了桥梁，使两种医学体系能够相融。”

谢竹藩教授先后11次担任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在此期间，谢竹藩教授为中

医药理论，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向全世界推广传播起到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他不愧为传统医学名词英译标准的制定者，是中医走向世界的领路人。

此外，谢竹藩教授还是国内心电图检查的第一人，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心电图检查；60年代初，在吴阶平教授的亲自指导下，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经皮肤肾脏穿刺活体检查。

在访谈的最后老教授还不忘嘱咐我们，他语重心长地说，“作为医生，一定要以人为本，有大爱精神。”并希望学子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好时光，发奋学习，努力拼搏。”

从老教授家出来我们感到少有的充实，激动，内心久难平静。因为老教授用毕生精力诠释的医者大爱与担当；因为谢竹藩教授融入血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深震撼了我们的内心，那既是召唤，更是鞭策！

以谢竹藩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医者，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他们为了祖国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上下求索，奋斗不息，精益求精的大医精神在我们内心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这种精神经过历史的不断沉淀，凝练成为北大医院厚德尚道的核心价值观，已经嵌入了北大医院人的文化基因；这种精神也必将指引我们医学生，以老专家、老前辈为榜样，发奋向上，不忘初心，为北大医院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为北大医学的腾飞，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1955年北大医院临床内科教研组全体人员合影，第二排右为谢竹藩



1996年10月参加WHO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咨询会全体合影，第一排左四为谢竹藩



# 世纪丰碑 与国同行

## ——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冯传汉教授

■ 文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汪铁铮、王兵



### 人物简介

冯传汉，广东番禺人，1914年1月26日出生于湖北汉口。著名的骨科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

1932年，冯传汉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获理学学士学位。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协和医学院，1940年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获得“外科学奖”。毕业后冯传汉留在协和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1942年5月来到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从此扎根在这里，整整77载。

在动荡艰苦的岁月里，他为解人民之疾苦，矢志学医，始终心怀坚定执着，仁心济世；在缔造新中国、捍卫新中国的艰苦斗争中，他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满腔热血奔赴抗美援朝一线，救治伤员保家卫国；在建设新中国、发展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上，他更是苦心孤诣，推动中国骨科发展，致力于医学教育，并为国家早期对外医学交流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百岁高龄的他，孜孜不倦，每天伏案阅读笔耕不辍，关心国家建设、关心医学发展，成为一个时代的丰碑。

他就是我国骨科泰斗、著名骨科专家、医学教育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科建立者，106岁高龄的冯传汉教授。

### 为解人民疾苦矢志学医

1914年1月26日（民国3年春节），冯传汉诞生在湖北汉口江岸区一位京汉铁路汉口江岸铁路医院普通医生的家中。父亲行医的品德风范、同胞的贫瘠苦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烙印，成为矢志学医的原始动力。

1932年冯传汉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协和医学院，1940年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留任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师。

1941年12月8日，侵华日军占领协和医院，责令医院解散，全体职工被迫离开协和医院。动荡的时代背景下，

身边的朋友和同事纷纷做出不同选择，有的南下，有的出国，冯传汉最终选择留在北京，跟随钟惠澜、林巧稚、孟继懋等多位专家教授一起来到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工作。

北京中央医院始建于1918年，是中国人自行集资建立并管理的第一家综合医院，我国现代医学创始人、卫生防疫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任第一任院长。

从1942年，冯传汉在北京中央医院担任外科住院总医师，到现在已经整整77个年头。当年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成为了德高望重卓有建树的医学大家、骨科泰斗，为我国骨科学发展和临床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听从祖国召唤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年轻的冯传汉在孟继懋教授的支持下，成立骨科组，1949年8月赴英国Robert Jones骨科医院进修骨科，并到Derby郡医院学习手外科。

冯传汉听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激动地热泪盈眶。为祖国为人民而学习，让他更加充满干劲。

1950年5月，由北平中和医院申请，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批准，卫生部全面接管医院，医院更名为“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得知祖国建设和医院发展需要，冯传汉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环境，于1950年10月回国，任骨科主任、医务主任，全力推动中国骨科学

发展和医院建设。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规模的扩大，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面向全国发出组织医疗队的通知，1951年3月7日，冯传汉任北京市第二批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副队长、医务主任奔赴长春野战医院。冯传汉在长春十八陆军医院36队担任队长，带领手术队先后治疗了400余名伤员，并培养了大量的部队医疗专科医生。冯传汉因陋就简，建立了功能锻炼室，全面促进了伤员的恢复，得到十八陆军医院领导和伤员们的一致称赞。

冯传汉提及这段历史时谦逊地说，通过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最重要的是使他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伤员为患者服务的信念，为日后致力于医学专业，潜心钻研为患者解除痛苦的医疗技术打下了基础。

### 苦心孤诣推动中国骨科学发展

50年代初期，冯传汉回国后率先在国内开展屈指肌腱损伤的修复手术，这种手术要求高，当时国内很少有人问津。1960年他报告了《41例手部肌腱损伤的修复》，是为中国第一篇正式手外科的论文。

随后冯传汉在国内首先采用“膝关节注气造影法”针对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可以在手术前明确诊断，使手术有的放矢；针对习惯性肩关节脱位，设计了消灭“疝囊”同时加强关节囊壁的手术，术后远期效果良好；针对股骨颈基底有较大的动脉瘤性骨囊肿，在国际上首创了“串联式”骨块植骨法，重建股骨颈及部分大转子，编入1983年美国出版的《骨肿瘤切除关节重建假体设计与应用》书中。

冯传汉教授是我国骨与软组织肿瘤研究的奠基人，1964年冯传汉在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了《骨巨细胞瘤》一文，从此开展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骨巨细胞瘤的系列研究。1982年，冯传汉应邀赴

美国出席美国骨科医师学会（AAOS），介绍中国骨巨细胞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成果。1984年，在冯传汉教授的倡导下国内第一个骨肿瘤研究室成立，致力于骨巨细胞瘤研究，清晰的勾勒出骨巨细胞瘤细胞生物学、细胞遗传学及免疫学特点，这些成果得到国内外专家同行的广泛认可。

在冯传汉的精心培育下，经过60年的发展，成立伊始才有5—6张床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科，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包括了骨关节科、创伤骨科、脊柱外科、骨肿瘤科四个专业，在中国现代骨科发展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冯传汉用其一生在不断的发掘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他说，最欣慰的事情，就是看到他的学生成为中国骨科发展的中流砥柱。

### 德高望重，肩负医学交流使者的重任

冯传汉教授的足迹不仅仅踏遍了中国的广袤大地，更作为仁爱使者把中国医生的济世之行传向了全世界。在中国医学的对外交流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62年夏受卫生部委派赴非洲索马里考察，冯传汉负责考察医药卫生情况。出发之前，周总理接见了全体团员并作了具体指示，考察项目包括农、医、渔、纺织等多项。1969年10月他受卫生部委派到几内亚执行医疗任务。1970年2月卫生部再次派他带医疗组赴几内亚治疗抗击葡萄牙雇佣军入侵的伤员。1972年春赴阿尔巴尼亚，执行文化协定，在地拉那大学医院工作半年。1973年他被派赴朝鲜执行医疗任务。1978年5月他随参加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瑞士、英国、德国。并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考察了22家现代化医院，回国后冯传汉教授写了“现代化医院与医院现代化”一文，摘要刊登于《建筑学杂志》上。1984年春，已年逾古稀的冯传汉教授再次随卫生部代表团参加WHO会议，为国际医疗卫生事业奔波忙碌着，面向全世界唱

响中国医疗卫生的洪亮合声。

### 孜孜不倦“做一辈子的学生”

冯传汉在进入耄耋之年依然勤勉耕耘——

82岁时主编了《肩关节外科学》；

84岁时他主持的“骨巨细胞瘤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研究”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87岁时协同徐万鹏主编了《骨科肿瘤学》；

89岁时主编了《临床骨科学》和《中国现代骨科史料》；

90岁时收集整理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科成长发展的60年》；

93岁时编著了《基础英语概要——英语读写指南》；

95岁时完成了“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治疗及其相关基础知识”笔记约6万字，并且开始研读2000年以来新出版的医学教科书《基础病理学》、《基础及临床药理学》，以了解现代医学进展，不断更新自己的基础知识；

99岁高龄时，每天都在阅读剪贴政治、经济、人文、历史等方面的报刊资料，认认真真的进行排版粘贴，每月研读骨科、外科期刊学报，了解最新研究进展和最尖端技术，每周精读非医学的英文论著一篇，写出数万字的《大学教育与医学教育的再教育和再认识》的读书札记，并整理成册……

106岁的冯传汉因为视力原因不能读书看报，但依然每天坚持收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祖国的发展变化。

冯传汉说道：“在我百岁的人生道路上，与国家同行70年。党和人民给予我很多鼓励和肯定，但我做得还远远不够，还要再继续学习，我要做一辈子勤奋的学生。”

悠悠岁月铭记着他奋斗的足迹，辉煌历史映射出他不朽的功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冯传汉教授，心怀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书写着与祖国共同成长的70年，流传下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



# 半个多世纪的骨科情

## ——记北医三院骨科第三代“掌门人”党耕町

文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李危石、姜宇、赵旻暉



### 人物简介

党耕町，1935年1月6日出生，男，汉族，河北省临西县人，大学本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专业研究方向：脊柱外科，重点是颈椎病、颈椎外伤、寰枢椎畸形及脱位、脊柱肿瘤、腰间盘病等临床与研究。1957年—1962年7月，北京医学院就读；1963年至今，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外科及骨科工作。曾任北医三院副院长、代院长、大外科主任兼骨科主任、脊柱外科研究所所长。主编《脊柱外科学》；副主编《临床骨科学》；参与编写并出版骨科专著16部；主持翻译专业著作二十余部；2002年“颈椎病诊断与治疗的系列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3年“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临床研究”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以第二作者及第三作者身份获得卫生部科技三等奖二项，教委一项。

1963年，28岁的党耕町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医学院的第三附属医院（现北医三院）工作，从外科及骨科助理住院医师做起，自此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至今仍勤耕不辍的骨科医生生涯。

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医院将骨科设为临床专科。1958年，北医三院建院，在大外科成立了骨科教研组。当时科室只有20多张床，主要治疗骨折，后来逐步开展了半月板损伤、腰椎间盘突出症、关节成形和颈椎病的的手术治疗。那时候，国内外对脊柱肿瘤、脊柱畸形和脊柱创伤等许多疾病的治疗水平还不高，临床上在这些领域还有许多难题没有解决，寰枢椎疾病的治疗更为困难，被许多人视为手术的“禁区”。

党耕町教授根据骨科实际情况和团队成员的特长兴趣，以及科里的科研和临床发展方向，以解决骨科疑难重症为目标，围绕脊柱外科逐步划分了腰椎组、普通脊柱组、颈椎组、关节组、创伤组和颅椎组6个专业组。划分专业组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跑道、任务和责任，大家专心致志地去发展自己的专业，专注于某个领域去攻坚克难，同时也能相互支持，三院骨科得以迅猛发展。

1990年，继杨克勤、张之虎两位教授之后，党耕町教授接任北医三院骨科第三代“掌门人”。跟前任们一样，党教授非常重视对年轻医生的培养。写病历是令年轻医生“头疼”的苦差事，对此，

党教授从医生基本功训练的角度向他们分析着这份“苦差事”的重大意义。他说，写病历除了记载医疗档案，也在训练医生的“侦察能力”，有助于医生从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挖掘深藏其中的疾病本质，形成医生思维、总结临床经验。“学医很苦，而学医就应该是很苦！”在党教授看来，医生接受的训练和磨难与应该掌握的知识成正比。“医学生要想成为一名能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好大夫，成为一名能独立处理问题的大夫，必须要经过这种科学的训练，这是前人总结出来的医生成长必经之路，是一种日积月累的熏陶、浸泡。”党教授说，医生良好的思维方法、工作作风、职业修养的练就，需要在这种“缸”里“腌泡”而来。后来，这种“浸泡式”培训风格也被他延续到对年轻住院医师的培养中。

例行查房历来是住院医师手心冒汗、舌头打结的事。党教授的观点是，查房不仅是检查病人状况，更是病房行政管理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关口。查房过程中的检查、询问、讨论和决定，主要功能在于解决诊断治疗中的疑难问题，它既能督促医生的责任心，也能培养年轻医生。三级查房制度对医生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和科室学术氛围的养成都很重要。

除了业务工作，年轻医生们的业余时间他都管着。有一天，他听说有个年轻大夫礼拜天钓鱼去了。于是，他就问这个“去享受生活”的年轻人：“按照计划，你一个礼拜要看多少书？该记多

少英文单词？你完成了吗？”他认为，相对于享受生活，年轻医生应优先考虑完成学习计划。

党耕町教授常提醒年轻医生“要活得清醒一点”。“清醒”的意思是，主治医师阶段要有长远的成长计划，首先是要有足够数量的临床实践积累；其次是要尝试去提高科研技能和思路，并进行基础训练；第三，要树立明晰的外语听写阅读、专业交流程度的目标，制定每周、每月和每年的基本计划。同时，适婚年纪的年轻医生还要处理好家庭问题，否则会影响事业进步。

“团结包容、相互支持、学术氛围浓厚”是三院骨科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强大的团队，每个人事业心都很强，都朝着明确的目标在努力，这对年轻医生的成长很有帮助，因此一定要珍惜机遇。

历经六十一载，北医三院骨科老一代为后辈们提供了令同行羡慕的起步平台，后辈们也没有坐在前辈的荫护下乘凉。在党耕町教授、娄思权教授等前辈的教导下，后辈们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很多已在自己的领域成为行业翘楚和中坚力量。

这支实力超群的骨科大家庭强手如云，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在各自的天地里有一番作为，一直以来是三院骨科领导班子努力的方向。

1999年，刘忠军教授从党耕町教授手中接过科室主任的“接力棒”。2018年，三院骨科管理团队再次完成新老交替，这个沉甸甸的“接力棒”又传到李危石教授手中。“这两代班子都很团结，责任心都很强。”党耕町教授对第四和第五代科室领导人给予很高评价。

如今，兵强将勇的三院骨科是一个有特色的综合大骨科，在寰枢椎疾病、脊柱退变、脊柱肿瘤、脊柱畸形、脊柱与四肢创伤、老年性骨关节病及关节软骨与韧带损伤等疾病的诊治与研究上取得巨大进步，其疑难重症的诊疗和学术水平在国内靠前，人才梯队也很完善，团队成员在全国的影响力与医院地位相称，成为国内实力最强的骨科中心之一。

北医三院骨科的发展史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正是在大批像党耕町教授这样的老专家们辛勤哺育下，我国的卫生人才队伍和卫生事业才能不断成长和壮大。吃水不忘挖井人，薪火相传继初心，三院骨科年青的一代将从前辈的创业精神中不断汲取前行的动力，锐意进取，为把北医三院骨科建成世界一流学科而继续努力。





# “医”生之路，一生无悔

## ——记北医三院郭静萱教授

■ 文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杭成文



### 人物简介

郭静萱，1936年10月15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56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1961年毕业于分配到北医三院心血管内科工作至今。1981年赴美国进修介入心脏病学，回国后在王继山院长委托下协同其他同事于1987年创建了北医三院心脏导管室，在国内开展了北医三院首例冠状动脉造影手术及全国首例冠脉激光成形术等治疗。并成为中国冠脉介入心脏病学奠基人之一。参与完成了国家“七五”、“八五”及“九五”攻关等多项重大课题，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获得了中华医学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等11项科技奖项。

郭静萱教授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老专家，迄今为止已经从医58年。如今她虽已八十多岁高龄，但仍然精神奕奕，思维敏捷，她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平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一声“郭奶奶”。

郭静萱教授一直说自己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她出生在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有兄弟姐妹八人，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值得一提的是，郭静萱教授兄弟姐妹八人都从事医学相关的行业，多年来活跃于救死扶伤的第一线。在采访中，她说小时候的玩具多是听诊器之类的，稍大一些就有了白大褂，良好的家庭氛围在她心中埋下了学医的种子。郭静萱教授从小学习成绩就非常的优秀，在高中时期她还获得过选派前往苏联学习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1956年郭静萱教授高中毕业，填报的六个高考志愿中有四个是医学院，最后顺利地按第一志愿“北京医学院”录取，正式踏上了学医的道路，用郭静萱教授的话说，命中注定她要走上医学道路。

### 初心不忘，献身医学

郭静萱教授于1956年进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她认真刻苦，善于思考，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医学生。之后，郭静萱教授来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进行生产实习，自那以后，郭静萱教授便与北医三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毕业后，医疗系300人中，仅有13人被选

拔进行研究生学习，她被选为生化教研系的研究生。但当时，郭静萱教授不愿意离开自己所热爱的临床事业，恰好同期有一名同学被分配到北医三院妇产科，而这名同学更希望从事基础研究工作，趁此机会两人互换了名额，她也就如愿地留在了临床。这样一来，郭静萱教授也就放弃了攻读研究生的机会，谈及此事时郭静萱教授说，这是她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从未感到后悔。

事业与家庭总是难以达到完美的平衡，即便是一代“大家”也难免会遭遇这样的矛盾。郭静萱教授家中孩子尚幼时，白天由于工作脱不开身，时常将孩子放在托儿所托管，而每当值夜班时只得将孩子带到医院照看。1981年，郭静萱教授被医院选为第一批公派的临床医生赴美学习。彼时大儿子才上初中，小儿子才上小学，家庭离不开她，但她为了祖国医疗卫生的发展毅然选择了赴美留学。郭静萱教授每每谈及家庭，总说心中有愧，尤其是有愧于子女，但她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哪怕再来一次，她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多年的临床工作，加深了郭静萱教授对医学的忠诚和热情。她说医院就像她的家，她对医院有着无比深刻的感情，如果超过三天不来医院，便会感到不舒服，只有来医院转转，看看哪里有用的上她的地方，她才能安心。当她每次腰酸背痛的时候，只要一看到病人所有烦恼和不适都会烟消云散。哪怕到现在，郭静萱教授也会要求给她安排门诊坐诊，每周跟着科室查房，参加各种会诊。

### 心灵手巧，巾帼豪杰

1981年，郭静萱教授被医院公派赴美学习“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她遇到的第一个难关便是英语。改革开放前，国内英语普及度并不高。可以说她几乎没有任何的英语基础。于是她在工作之余通过广播自学英语口语，主动参加语言大学组织的英语培训，同时坚持查字典学习医学英语词汇，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攻克了语言关。

等她到了美国亨利福特医院，发现同一批的学员之中，她是唯一一位前来学习冠心病介入治疗的女学员，当时美国的带教老师还曾经劝她转到其他的科去。但郭静萱教授不服输，她要证明中国的女学员能行。那个年代做介入手术需要穿厚重的铅衣，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个头小的郭静萱教授就用绷带把铅衣绑在身上，就这样坚持跟了300多台的手术。在一次手术中，患者突发心脏骤停，她毫不犹豫地冲在第一个给患者做心肺复苏，并且成功抢救回了患者。正是这种不服输、不怕苦、认真踏实的精神改变了美国带教老师对她的看法，甚至改变了他们心中的中国人形象，在后来的手术中，郭静萱教授也就渐渐有了可以亲自动手的机会。

在国外学习的一年时间，郭静萱教授学会了介入手术操作，了解了手术流程，并且把一套导管设备带回国内。回国后，她主导建立了北医三院导管室，用这套漂洋过海的导管设备，开展了北医三院第一例冠脉造影。一有机会，她也会四处进行宣教，向其他医务工作者介绍“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技术，让国内更多的医生了解冠心病治疗的新手段，推动了国内冠心病诊断治疗的发展。

郭静萱教授回忆那段国外学习的经历，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心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新的知识技术如饥似渴地追求，驱使着她不惧怕艰辛，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前进。她非常感恩改革开放，感恩政府的政策，给了她这样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让她把新技术带回家，造福更多的患者，为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发展添砖加瓦。

郭静萱教授说做医生需要有“工匠精神”，不怕艰辛，不惧困难，勇于创新 and 探索。她希望我们“干一行，爱一行”，既然选择了医学，就要风雨兼程，

坚忍不拔地走下去。历经旧社会到新社会变迁的她，在访谈中也多次感叹新时代的美好安定，国家政府的开明政策，告诫我们要常怀感恩之心，敬爱祖国，报效社会。



#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 ——记职业病学家、医学教育家王世俊教授

文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郑亦沐、赵赞梅



### 人物简介

王世俊，192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山东人，大学本科，教授、主任医师。

专业特长：职业性中毒疾病的诊断、治疗与研究。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在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担任住院医师；1947年至1948年在北大医院神经内科任住院医师，1948年至1958年在北平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1958年至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工作历任内科副主任、职业病科主任、教授等职务，是北医三院职业病科创始人。

作为我国职业病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王世俊教授致力于职业病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60余载，成果斐然，桃李满天下，为我国职业病学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白手起家，在艰难中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的劳动卫生状况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我国的职业病医学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如何保障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心健康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的重大问题。

1958年，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现北医三院）建院，并被上级确立为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教学医院，时任院长左奇同志高度重视职业病的防治工作，决定成立内科职业病组，内科副主任王世俊教授怀着满腔热情接下了这个重担。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面对没有专业人才、没有先例病人、没有教学材料的“三无”困难局面，王教授一边查阅、翻译国外文献，一边带领职业病组同事深入工厂一线，边治疗、边学习、边研究。建科不久，北京市东城区发生了一起急性汞中毒的群体事件，王世俊连续驻厂十多天，观察现场作业环境，为工人做体检和化验，总结出了一份有关镏金工急性汞中毒的调查报告。

“我们的口号就是下厂！下厂！”不管是做临床、搞研究，还是带学生、开讲座，王世俊总是强调要掌握劳动现场职业危害的第一手资料。他带领全科

人员深入调查了北京市和外地上百家工厂、矿山，为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为企业建立完整的职业卫生档案，从而为职业病防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9年8月，王世俊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卫生和职业病学术会议作了鑿金作业工人汞中毒治疗经验的交流，使北医三院职业病科在国内同行中崭露头角。

“我这才算是入了门，一只脚踏进了职业病专科的大门。”王世俊谦逊地说。

### 勇于探索，在创新中发展

“做学问，不能盲目，更不能闭门造车。”王世俊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坚持把从实践中拿到的第一手资料和最前沿的职业病防治技术及手段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创新。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附近的工厂发生多例铅、汞中毒的患者，面对饱受折磨的患者，王世俊下定决心尽快研制出特效药物。通过查阅文献，他发现治疗血吸虫病的二巯基丁二酸钠（DMS-Na）对于急性铊中毒有效，那么这一药物是否同样适用于铅、汞中毒呢？王教授决定一探究竟。“当时每天都需要留足患者所有的尿液，测定金属浓度，一点都不能丢。”那些天他几乎24小时待在病房里，标本收集好就立刻检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严格的实验，他们最终发现，二巯基丁二酸钠有驱排多种金属的效果！

1964年，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北京医学院学报上，反响强烈，这在国内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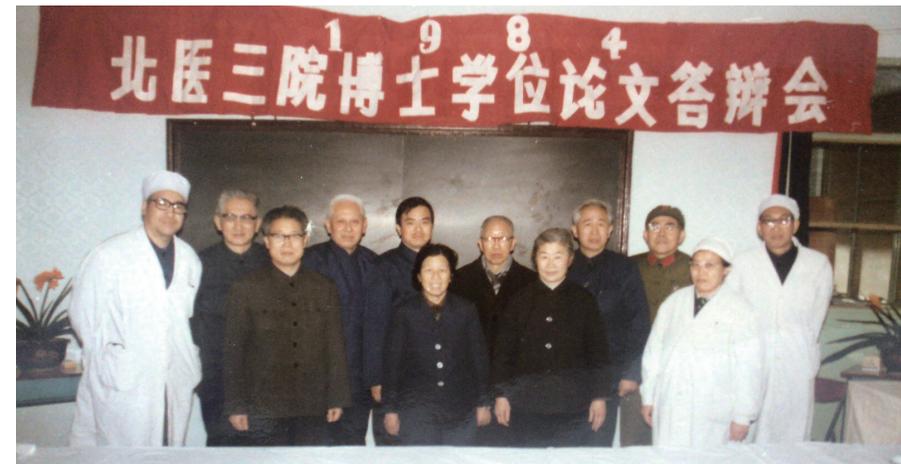
至国际上都是一个大的突破，解决了重金属中毒没有特效解毒剂的难题。同年，全国劳动卫生职业病学术会议在沈阳召开，王世俊的研究成果得到与会人员广泛赞许与认可。随后，该研究成果在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又在马尼拉召开的亚洲职业卫生会议上宣读，引起国外学者的兴趣和关注。王世俊带领的北医三院职业病科因此具有了极高的学术影响力。

王世俊多次被评为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他带领的北医三院职业病科也先后获得多项殊荣，陆续承担并完成国家七五、八五、九五重点课题，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教博士点基金课题，获得过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市级科技成果奖，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大量高水平文章，进一步树立了该科在国、内外的学术位置和影响力。

### 严字当头，在教育中传承

王世俊在做好临床和科研工作之余，也一直致力于职业病学人才的培养。1961年，在王教授的建议下北京医学院开设了职业病课程，为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增添了一门新学科。王教授素以学风严谨而著称，每次讲课前都会认真备课并翻阅近期书刊，力求每次讲课都有新知识、新内容。他撰写的学术论文简短扼要，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翻阅大量文献才定稿的。此外，他多次举办全国性职业病医师高级讲习班，亲自授课，为提高我国的职业病临床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文革”后，王世俊教授在全国率先招收职业病临床研究生，并在1984年为国家培养出第一个职业病专业的医学博士。

王世俊教授认为培养年轻力量、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是今后工作成败的重要环节，必须认真对待。为鼓励中青年医师积极工作，他曾建议对35岁以下的年轻医师和科技人员的论文设立评议制度，对优秀者给予奖励。在工作中，他对年轻人耐心指导、严格要求、大胆提携，使他们能尽快地成长。他查病房时，总



是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工作，从不对下级医师或护士呵斥责备。对别人工作中的缺点和诊治中的偏差，他也不急于批评，而是平等讨论，循循善诱，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让问题在切磋探讨中得到澄清，使大家都能心悦诚服地改正缺点。

“莫道桑榆夕阳晚，勿须扬鞭自奋蹄”，尽管王世俊教授年事已高，但他仍笔耕不辍，将自己数十年的学术心得无私地留传后人。王世俊教授奋进不止的精神将在一代代职业病科人中传承，激励着大家不断推动国家的职业病防治事业和职业病学发展迈上新台阶。



# 马大权教授访谈录

■ 文 / 2015级口腔医学本科生 陈一铭



## 人物简介

马大权，男，1932年10月出生，湖北宜都人，口腔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1952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1956年毕业留校主要从事口腔颌面部肿瘤、口腔癌、颌骨及唾液腺恶性肿瘤的诊治，尤其对唾液腺肿瘤的诊治有较深入研究。

作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资深教授，马大权教授经历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再到跨入新世纪等一些列重要历史节点，见证了北大口腔从独立建科，不断发展壮大，再到今天成为国内领先，世界一流口腔院校的发展历程。马大权教授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诠释了北大医学人厚道的行医理念与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谈及自己学医的初心，马大权教授回忆起1942年侵华日军对自己家乡的一次大轰炸，一幕幕悲惨的画面仿佛历历在目。也正是因为看到同胞们在日寇轰炸中身负重伤，却得不到医治的场景，让他下定决心投身祖国的医疗卫生行业，以“悬壶济世，大医精诚”的情怀拯救更多的生命，实现人生的价值。

1952年，马大权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口腔医学院。回忆起医院的发展历程，马大权教授对北大口腔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如数家珍。他提到，医院始建于1941年，那时是在西单背阴胡同内，1948年迁至西什库后库，1985年搬至魏公村，建起了今日的医疗大楼。

口腔颌面外科在解放前是一个空白，

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很多不该是医生做的也要去做，但这些都算困难，困难的是某些疾病的治疗在当时缺乏指导，要靠自己摸索。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回想起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时科室只有三张病床，而如今口腔医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病床120张，椅位450台，年接诊患者100万人次的全球最大规模口腔医院，马大权教授感慨万千。

马大权教授的青年时代也正是在北大口腔飞速发展时期度过的，时至今日北大口腔不但赢得了国内外较高的学术地位，培养了大批口腔医学人才，而且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医院文化。北大口腔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像马大权教授一样优秀的医学工作者不懈努力。

马大权教授回忆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医疗条件，不禁想起1957年接诊的一位右上颌牙龈癌伴颈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医院无法实施颈淋巴结清扫手术，导致患者不得不放弃治疗。而直到1960年李树岭教授前来参观，北大口腔才完成了第一台颌

淋巴结清扫手术。1968年，马大权教授自己主刀的第一台颈清手术从早晨9点一直做到下午3点，整整做了近6个小时。而现如今有了电刀，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同的手术1个多小时便可完成。

为了更好地医治病患，马大权教授从60年代开始专注于颌面外科肿瘤研究。他治疗了上万名颌面部肿瘤病人，在积累了大量临床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在国内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第一部关于唾液腺肿瘤的书籍《涎腺外科》，这是当时我国唾液腺肿瘤研究成果的最高结晶。在教学岗位上，马大权教授同样兢兢业业，将自己毕生积累的的经验与知识无私地传授给了一代又一代口腔医学生。这其中不乏有两任北大口腔医学院院长——郭传瑛教授和俞光岩教授。马大权教授向自己的学生强调：“教学”两个字包括了“教”和“学”两个层面，从教的角度讲，老师应当以为身教重于言教；从学的角度讲，学生需要善于发现身边优秀医生的过人之处，并有意识地学习将他人优点为自己所用。此外，

马大权教授始终认为，要成为一名好的医者，一定要先学会做人，做好人才能做好事。

几十年来，在口腔外科人的不懈努力下，颌面外科手术技术不断创新，过去面部肿瘤切除术后的修复方法单一，大的缺损无法修复，有不少病人因此放弃治疗。90年代微血管吻合技术的发展解决了这一难题，使颌面外科的治疗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马大权入学时，北医正实行劳卫制锻炼，操场上一幅名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横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马大权教授已经在颌面外科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服务了63个春秋。马大权教授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者北大口腔“厚德尚学、精医济世”的院训，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一例又一例危重患者，带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医师。回首往昔，展望未来。新一代的北大口腔人必将秉承优秀前辈们的精神，努力学习，认真实践，使北大口腔走向更加辉煌美好的明天。





# 荒芜中开拓，平凡中坚守

## ——记为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奉献一生的侯沂教授

■ 文 /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博士生 郑苏丽



### 人物简介

侯沂，1926年4月出生，籍贯山西省。1946年9月起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硕士毕业，1954年3月起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参加工作，现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退休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为主任医师、教授。侯沂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精神病脑电生理，特别是精神分裂症脑电研究在国内较领先。

陶渊明的诗中曾提到，“延目中流，悠想清沂。”“沂”在古诗文中，似乎总与清澈和煦相伴出现。想象中的侯沂教授，也该是如此的一位老人家吧。及至见到侯教授的样子，觉得她比自己的名字，更多了一分灵气，还有着老一辈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执着与认真。

侯沂教授，1926年出生于山西榆次，1954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1956年至1959年，她在伍正谊教授指导下作精神医学方向研究生。五十年代毕业后留校参加工作，一直致力于精神医学的教学、临床、科研等工作，尤其对脑电生理研究做出很多贡献。

2019年1月30日，北医六院领导和离退休办工作人员赴老领导侯沂教授家中进行慰问。侯老师的身体已经不那么硬朗了，但聊起精神科的事，感觉却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她的故事，是与我国精神科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

探访过程中，侯沂老师还拿出一张满是标注的报纸，说着对精神科的关切，与大家分享其对精神卫生学科发展的见解。从过去到现在，侯沂老师一直亲力亲为地关注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

侯沂老师的一生，是与我国精神卫

生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一生。1942年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前身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精神科成立，许英魁教授任科主任；1953年，留美归国的著名精神病学家伍正谊教授接任精神科科长。1954年，侯沂大夫毕业留校，成为最早的员工之一，甚至比1955年留学归国的沈渔邨院士还要早一年。

侯沂老师聊到了专业选择，她说：“那时候，把我分到精神科，我回到班里的时候，就跳着这么说，你看，我有一把钥匙。什么钥匙呢？就是我们进精神病房的时候开门的那个钥匙。我说我有这把钥匙，你们没有。当时就是组织分配的，高高兴兴就去了。”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病房提出废除普遍约束患者、让精神障碍患者过正常人生活的响亮口号，创造了许多沿用至今的为精神患者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办院方针。时任科主任的伍正谊教授要求每个工作人员待患者如同兄弟姐妹，上班不穿白大衣，以减少与患者之间的距离。他设计了北京四合院结构的病房，要求工作人员与患者一起进餐，以营造一个家庭的气氛。

侯沂老师从事临床精神病学工作近

50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还对临床脑电检查在精神科的应用做出了巨大贡献。1954年精神病学教研室成立，同年建立脑电生理研究室。侯沂老师在导师伍正谊教授的指导下，完成我国最早有关精神分裂症脑电图的研究论文（1959）。此后，侯沂老师任脑电生理研究室主任，先后对精神分裂症、老年痴呆等进行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她开始主要对儿童行为、学习问题等进行研究。

侯沂做研究生时，曾向神经病学专家、临床脑电图的奠基人冯应琨学习脑电图。经过3年的研究学习，她在1959年完成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氯丙嗪前后脑电图的观察与分析研究论文，得出了有意义的结果。沈渔邨院士肯定了侯沂老师在医教研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曾为侯沂老师写下如下评语，“侯沂同志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较繁重的情况下，建设电生理实验室，提高实验室研究水平和方法，是国内外最早开展这项新技术的单位之一，是我所电生理研究室的创建人，在电生理实验室检查结合临床研究课题中做出了成绩。”寥寥数语足以让吾辈窥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没有人走的路总是荆棘密布，披荆斩棘的人谓之开拓者。

改革开放后，侯沂老师带领的脑电生理研究室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增多。在时任北大精研所所长沈渔邨院士推动下，侯沂老师和同事们先后到美国、日本、古巴进修，学习了解国外经验，并为之协作，为脑电生理研究室的科研工作跟上国内外先进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侯沂老师总是强调所有工作的完成离不开很多人的配合，她说这些机会是沈所长多方联系才得到的，工作能够完成离不开大家的勤奋努力。

侯沂老师对科研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在90年代末就提出，应当把临床



1957年沈渔邨、许迪、侯沂、李从培合影



2018年慰问侯沂

问题与实验室研究联系起来，指出精神患者的脑电生理应结合多项指标，如目测脑电、各种定量分析方法以及多项事件相关脑诱发电位等等；并指出若临床症状分析、量表测查与生理、生化以及脑形态学（如CT、MRI及PET等）多项技术相结合，可能会得出有意义的结果。这些建议对现在研究脑电生理的学生仍然是指导。

交流的最后，侯沂老师叮嘱大家：“我觉得精神科医生最大的好就是，要无私地奉献，比如患者有时候打人，能

敢于上去抱住他，让他安静下来，给他打针治疗。帮助一个患者，就等于帮助他的全家。现在有的老患者还给我打电话，到现在还感谢我，有时候到过节还来看看我，进门以后拉拉手，拥抱拥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安慰。所以精神科大夫啊，必须有奉献精神才行。”

能为患者减少疾病痛苦，为家属排忧解难，是侯沂老师最大的安慰及快乐。侯沂老师的心中是精神疾病患者，而她走过的路，已然与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之路融为一体。



# 家国相连， 守卫精神梦家园

## ——访司法精神病学专家李从培

■ 文 /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唐雅静、孙秉玺、邵岩、张晓



### 人物简介

李从培，1925年1月出生，籍贯河北省。194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1950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等地工作，现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离休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为主任医师、教授。李从培教授主要从事精神病学临床工作和司法精神病鉴定、研究、教学工作。

李从培于1925出生于天津宝坻县的书香门第、法律世家，父母亲的性格和为人对他有深远影响。他一生“刚正不阿又谦虚谨慎，正气浩然又世事洞明。”他于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在那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的年代，他和同班同学共同发起和组织了进步学生社团——“点滴壁报社”和“长庚社”，并于1947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进”，1949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大学毕业后，李从培留任北京大学附属医院，成为新中国最早一批精神科大夫，不久开始参与新中国的司法精神病学的奠基性工作。“文革”时期，他被下放到甘肃省天水市精神病院工作10多年，在艰难困苦中不忘初心，恪尽职守。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的一系列工作和成就，使他成为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精神医学领域工作六十余载，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辈子都在守护精神病人的家园”。

我们前往李教授家拜访时，到访时间不巧，李教授正在休息，出门迎接的是李教授的夫人，年近90的她精神矍铄，招待我们进屋后，朗声对里屋说：

“李大夫，有学生来看你了，想和你聊一聊。”在等待李教授起床的空当儿，她拿出李教授生平相关的文字资料，如数家珍，娓娓讲述李教授的经历和事迹，满目慈祥。

我们从资料中得知，李从培教授认为：精神科临床业务工作要履行“三满意”原则，具体所指为要让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对临床诊断过程满意，对他们的治疗过程与生活安排满意，对他们的治疗有关的康复、疗养的整套安排满意。这要求我们必须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宗旨，不怕艰苦，不怕麻烦，真诚而耐心地对待病人；同时要熟练地掌握心理治疗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并应当尽个人的最大可能不断地深入钻研。

“文革”时，李从培教授下放，病人和家属追着火车给他送行；十一年后调回原单位工作，家属又是第一个来问候。在司法实践中，李教授为许多病人洗刷了冤屈，还曾帮助病人落实其子女的教育，但对想通过扣上精神病帽子而脱罪的嫌犯则绝不徇私。曾受李从培教授照顾的一患者的儿子逢年过节都会到家中问候。李从培教授时常觉得自己的一点点付出，病人就会如此真心，实在感动。

交谈中我们还得知，李从培教授的夫人退休前是北医公卫学院的教授，在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上颇有一番成就。年轻时，两人各自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生活上两人相敬如宾、相伴相扶，是令人钦佩的模范夫妻和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采访开始。李从培教授沉静安详，舒缓的言语消弭了我们的忐忑。他谦虚地说：“自己一辈子就做两件事：当精神病医生，做精神病鉴定。”“一些事情，在以往的资料里都有，没有多少可说的。”我们询问李从培教授当初选择司法精神病学的初衷，李教授只是腼腆地笑笑：“其实最初干精神科倒也不是因为热爱啊，或者其它太多高尚的情怀，主要是因为国家分配了这个任务；后来司法精神病学在我国是空窗，而精神病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弱势群体，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也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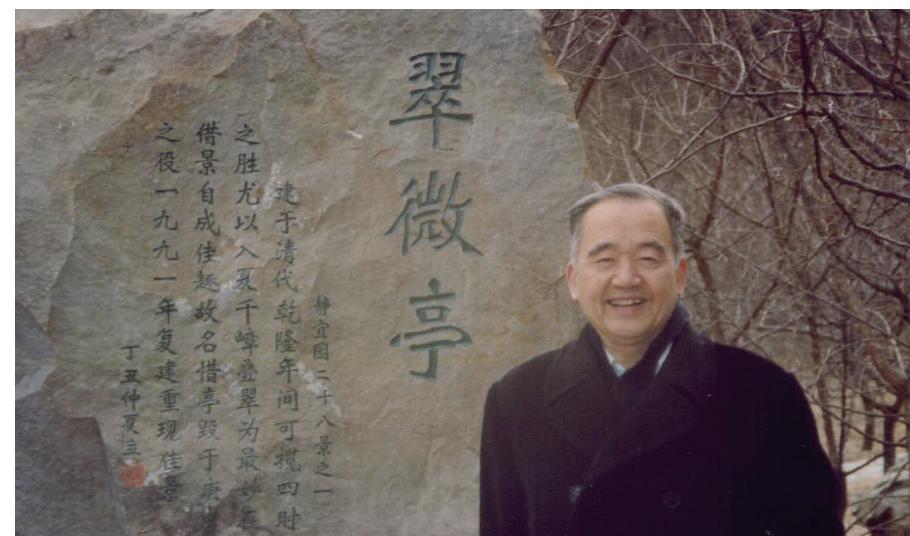
坐在我们跟前的这位为新中国精神医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司法精神病学的鼻祖，显得是如此的平和、谦逊、安静，和现今社会上的诸多浮躁现象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环顾四周，家装的简朴却深藏底蕴，另人感叹，占据一面墙的书柜中，藏书既有医学、精神病学、犯罪侦查学等专业书籍，也有中国画论研究、性学等文史著作，还有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的系列丛书。

采访接近尾声，作为初入精神科的小大夫，我们想要听一听李教授对新一代精神科大夫的忠告。他环顾、注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缓慢而认真地说：“精神科大夫不容易。”停顿片刻，然后徐徐补充：“因为精神病人和其它科室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想要帮助一个普通的患者，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对患者

进行教育、鼓励、劝说甚至批评，只要你的专业知识过硬，大概都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但是精神病人不同，你可能抱着一腔热血，说了很多、做了很多，但是病人却不吃你那一套。举个例子，当一个精神病人来到你面前，你可能会出于好意给他端杯水表达关心，但是病人可能并不能理解你的好意，反而把水泼在你的脸上。因此，想做好一位精神科大夫，光有热血情怀是不够的，还得加强自我修养，不能拿正常的社会标准

去跟他们计较，要去容忍、同情、理解病人。另一方面，精神病人终究是可以理喻的，所以你要拿正常的真心去对待他们，你要真的深入下去，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尽全力去获得病人的信任。还是那个泼水的病人，当他康复后，会主动找你，感谢你的帮助，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

采访结束了，李老师的话语久久萦绕在我们耳边，没有自夸，没有矫饰，却满满都是家国情怀。





# 责任与奉献

## ——访儿童精神病学专家王玉凤

■ 文 /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钟苑心、罗翔升



### 人物简介

王玉凤，1947年7月出生，籍贯河北省。1965年9月考入北京医学院，博士学位。1970年8月进入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参加工作，现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退休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为研究员、教授。王玉凤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精神病学。

王玉凤老师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儿童精神科专家，曾任儿童心理研究室主任、党委书记，现任北大六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名誉主任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退休前她全身心投入儿童精神卫生事业的建设，退休后她也一如既往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年事虽高但一直坚持在医疗、科研前线，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致力于促进和发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而王玉凤老师主动担当起守护他们的重任。由于我国儿童精神科医师极度匮乏，众多的患者期待得到专家的诊治，王玉凤老师面对急需帮助但是又挂不上号的患者，无论当天挂号患者是否已经远超工作量，为了能保证更多的患者尽快得到最好的治疗，她都会毫不犹豫地签下手中的加号条，半天的门诊经常延长至一整天，常常连续工作6-10个小时。

为了不耽误患者就诊，常常晚饭也顾不上吃，匆匆喝口牛奶便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很

少抱怨工作辛苦，反而经常在门诊结束之后拍拍我们的肩膀，鼓励我们体谅患者的难处。面对每个患者，王玉凤老师从不敷衍了事，力争使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满意的服务；如遇不理解的患者，哪怕需要再多时间，她也会不厌其烦地解释，直到患者明白为止。如今，虽然王老师已经退休，但退而不休，每周出3次门诊。

王玉凤老师曾随援藏医疗队赴阿里支边两年。1975年，王老师在环境艰苦的藏区中与医疗队员、藏族同胞护士给藏民们体检、治疗。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用王老师的话形容：“就这么一块巴掌大的地方，一座监狱，一个商店，一个篮球场，一个跟我办公室差不多大的书店，没有饭馆，没有理发店。人也没有多少，不用一年就都认识了。”

有一次，王玉凤老师跟同事乘救护车在大雪茫茫的藏区出诊，救护车在崎岖的山路行驶时突然抛锚，最后是靠借水修车才勉强开到了目的地。到了救护人家，没有电灯，只能打着手电给患者输液。

救助站还没有电话，没有报纸，只有三四个月才能来一趟的邮车，十二月

份封山之后，要等到来年的五六月份才能收到信件。大家只能靠着信件里只言片语和去边卡打听的消息，东拼西凑出国家发生的变化。

但是王玉凤老师没有半点抱怨，怀着对事业的执着，继续全心全意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回忆起当时的生活时，她笑着说道：“生活艰苦，但那让我学会了独立思考。”这是种多么坚毅的意志和精神！

王玉凤老师还有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精神。我国的儿童精神病学起步较晚，最初对于儿童的行为障碍并没有一套完善有效的诊疗方法。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况，王玉凤老师率先引进儿童感觉统合训练方法，研究建立我国首个儿童感觉统合功能评定的常模，并着手我国儿童行为障碍的干预训练。

听王老师说，当时一天来参加训练的，最多能有200多个孩子。感统训练初见成效，王玉凤老师并没有将这种方法据为己有，她认为新疗法应该最大程度帮助患者，因此她放弃申请专利，鼓励兄弟单位引进使用，最后将这套先进的训练方法推广到了全国。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她并没有止步于此，她又带领她的研究团队引进开发了脑电生物反馈训练、平衡仪训练、社会生活技能训练、执行功能训练、父母培训技术、认知行为治疗等先进的治疗方法，极大地提升了我国ADHD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并在国际上取得了很大反响。

目前，王玉凤老师培养的近百名学生作为儿童精神病学专业人才在全国多个医院和科研院所的重要岗位上积极贡献每个人的力量。王玉凤老师也一直在为提高国内ADHD诊疗水平奔走和努力。

2017年，王玉凤教授ADHD团队被深圳三名工程引进，驻点深圳市儿童医

院，开展医教研全方位合作，协助其在ADHD及神经发育障碍诊疗及研究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争创全国一流ADHD诊疗中心的目标，更多地造福ADHD患者及其家庭。

王玉凤老师的敬业与奉献精神也得到了认可，她曾获得“首都健康卫士”、“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多个荣誉称号。2019年由世界ADHD联盟举办的第七届ADHD国际大会上，王老师荣获了“ADHD突出贡献奖”。据悉，该奖项每两年颁

发一次，每次仅颁予一人，以奖励国际范围内在ADHD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这便是王老师得到世界ADHD学者认可的最好证明。

王玉凤老师坚持胸怀大局、心有大我、担当道义，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她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家的奉献精神，使国内数千万儿童和家庭获益，为促进我国儿童精神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的精神和事迹值得我们共同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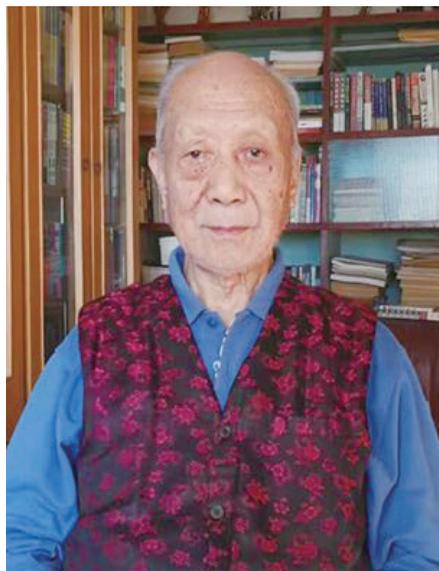




# 知霍防祸，承任毓人

## ——访流行病学专家魏承毓教授

■ 文 /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6 级学生 王万洲



### 人物简介

魏承毓，男，1928年1月24日生，甘肃省甘谷县人，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54年医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任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系教授。中华预防医学会授予“终身荣誉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 “十二年”与“六十载”

自清朝嘉庆、道光以来，霍乱便是我国公共卫生的难题。世界第一次霍乱大流行（1817-1823）至建国（1949）的130余年间，我国曾先后六次发生霍乱的大流行。然而，建国以来的12年间，霍乱奇迹般地“消失”，使得国内防疫工作放松了警惕，甚至在当时的教科书上，都找不到霍乱相关的介绍。霍乱，似乎已成为了历史。

1947年，19岁的魏承毓离开家乡甘肃甘谷，来到北京大学医疗系学习。54年毕业留校，服从决定，调离内科，随来华苏联专家研读流行病学，任流行病学教研室教职。

1961年6月中下旬以来，广东省阳江县几个沿海公社卫生院腹泻就诊量剧增，7月初时，每天可达百余例（最多一天182例）。其患者临床表现相近，病情凶险，病死率高。后又相继累及阳春、台山、电白、吴川、廉江等地。当地百姓认为，这次腹泻，是十二年间从未曾出现的“虎烈拉”（cholera，霍乱英文音译），这引起省卫生厅重视。7月6日晚，省厅检出霍乱弧菌后，立即上报至

中央卫生部。经卫生部派至当地的流行病学专家高守一、陈正仁确认，此次疫情的病原为霍乱弧菌埃尔托生物型。

为防治疫情以及社会民众恐慌，卫生部组织“工作组”深入现场指导防治事宜，学校决定派遣魏承毓加入其中，投入疫情工作。而这一投入，便是近六十年。

### 从现场到理论

抵达疫地后，当时卫生部防疫司司长、“工作组”组长王肇元因事回京，将阳江的防治工作交给刘秉阳、魏承毓等负责。在大学间，魏承毓并未学习过霍乱的相关知识，只能在疫情现场，边做边学，从实践总结到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工作。短短数月间，“工作组”先后前往廉江、湛江等地公社，调查疾病的发生发展、病例情况与防治措施。期间，卫生系主任金宝善深知其困难之处，经常去图书馆帮助整理霍乱的相关研究资料，以帮助他执行防疫任务。

此后数年，每年五月（夏季将要流行）至年末，魏承毓都要随时“待命”，卫生部一个电话，就要立刻赶往现场。“防

疫如救火”，不容迟疑。当时的卫生系、学校全面支持其工作，省去一切的审批流程。而“霍乱疫情”在当时属于保密工作，他的领导、同事们都心照不宣，从不询问。

一日晚上，魏承毓在廉江下面的公社进行调查时，卫生部防疫司副司长罗冬祥突然紧急致电，召其迅速赶往湛江。没有交通工具，中山医学院的彭教授骑自行车，用半天的时间，载着他赶路。抵达后，罗司长说，“有新任务了”。当时，海南岛东海岸陵水附近水域出现了大量的漂浮物，中央怀疑细菌战的可能，需要立刻进行调查。接到任务，他们迅速坐船赶往海口。第二日早，罗东祥因事回京，将防疫任务全权交给魏承毓负责。

海南的地理环境特点，决定了该地霍乱流行状况往往较为迅速、凶险。而当时，国内对霍乱的流行规律研究还很匮乏。魏承毓与当地卫生人员赵志国、刘敬华、翁万里等人，在3个月间，先后前往海口、琼山、琼海、儋县等地调查疫情，在众多的流行现象中，总结出“沿海分布”、“一户一例”、“来源不明”等理论，提出了相应的防疫措施。而后，浙江温州市瑞安县出现了首发霍乱病例，病人是长期居住在家中的老人。而广东与浙江之间的福建，却并未出现病例。魏承毓提出，霍乱的流行，亦可以有“远距离传播”、“跳跃式传播”的特点。1965年间，魏承毓先后在上海的10个区县进行调查，提出了“咸淡水”交界处，是霍乱易流行的地区。

一直以来，霍乱都被认为是“沿海分布”的。直到1964年，我国距离海岸线3000余公里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地带出现了三例霍乱患者。魏承毓研读历史资料发现，1960年时，在距离海岸线300余公里的泰国东部边境乌汶曾有过一次霍乱流行。后来，他提出，即



1960年代，魏承毓（左二）和同学在清河镇保健站

便是“非沿海地区”只要构成流行条件，便可传播流行，但存在“等级相关”的特点，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非沿海地区”防疫工作的重视。

从“实践”到“理论”，再从“实践”到“理论”，是魏承毓对卫生防疫工作的理解与总结。此间，他还担任了霍乱与腹泻病相关的诸多学术团体要职，并主持、参与了全国防治工作《霍乱防治手册》历版的编写与制订，从理论高度建构腹泻的宏观防治制度与措施。

### 承任毓人

魏承毓始终记得，上大学时泌尿外科的老师吴阶平，喜欢引用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一句话：“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对教育而言，“准备”，便是学习与思考的过程。

魏承毓说，让人民真正懂得传染病，才是重中之重，“必须要动员群众，动员全民参与”。传染病的科普教育，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数十年间，魏承毓先后承担河北、江苏、云南、江西、湖北、甘肃、宁夏、辽宁、新疆、南京、北京、广西等全国各地的各级卫生防疫培训班，

在遥远的新疆，举办过不下8次培训。这些，都是他对疾病预防控制“动员全社会参与”理念的践行。

在全国地方与学校承担着防疫培训工作的同时，魏承毓还对教学育人的工作倍加关注。他认为，“教学是对人的启蒙”，它的理想状态，是“对学生的一辈子负责”。“教学相长”，师生取长补短，互相进步。年过九旬的魏承毓，现在还经常使用微信和电脑与朋友和学生保持联系，而这些技能的掌握，还要归功于他的后辈学子，公共卫生学院“春燕行动”的同学们。

魏承毓喜欢用福楼拜的一句诗评价自己：“海是多么伟大，而我是多么渺小。”“一个人要乐于奉献，老觉得自己还不够”。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他，仍然心念防疫事业，家中也收藏着关于霍乱与腹泻病有关的各类材料。他希望自己的眼睛恢复一些之后，“靠着放大镜”写一本书，介绍霍乱相关腹泻流行病学的历史。

“中国正在越来越好，我觉得一个人要本本分分，为国家的富强，尽自己的能力所及，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国家，这是一个人人生的乐趣。”知霍防祸，承任毓人，九旬春秋，一生奉献。



# 读懂中国

## ——采访医学人文学院杨桂教授

■ 文 / 2017 级医学英语本科生 曾治、熊华仪



### 人物简介

杨桂，生于1928年5月22日，籍贯山西省沁源县，烈士后裔、中共党员、副教授、副研究员。1942年加入八路军，在军区医院学习护理工作，1946~1948年晋冀鲁豫军区野战部队直属邢台眼科医院工作，1950~1952年河北省保定市工农速成中学学习，1953~1956年北京政法大学学习，1956年9月入北京医学院党史研究室担任助教、讲师。在职期间曾经担任过北医附中副校长、基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兼任学生办公室主任、医学伦理教学研究会任常务理事、从事党史研究、学生教育、人文教育等工作。从教50年发表论文40余篇，1990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离休。

一踏进杨桂老师的家里，迎面而来的便是浓厚的老干部、老教授的气息。不大的屋子显然经过精心的设计，其中满是杨桂老师与妻子、女儿的各种合影，每一张相片都洋溢着杨桂老师那老一辈人的风采与自豪。

杨桂老师本人更是精神抖擞，九十余岁的高龄仍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坐在自己精心准备的讲桌前，杨桂老师似乎又回到了三四十年前的北医的教书生涯。虽然这次底下坐着的只有几个学生，但杨老依然以最饱满的热情为我们讲述了那段残酷却振奋、艰辛却自豪的建国往事。

杨桂老师从十几岁便开始投身于中国的救亡之中，参加革命至今已经77个年头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社会主义改造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开放到即将完成的全面小康，杨老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中心，他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亲历者。他看到过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也看到过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现在则正在看着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国人民强起来，杨桂老师以其近百年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将以必胜的决心与毅力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

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作了简要梳理之后，杨老将时间集中在一个点上——抗日战争。杨老认为，只有了解战争的残酷，才能领悟今天的幸福，才能坚守明日的希望。

对于抗日战争，我们了解的也许只有教科书上相对宏观的概括总结，我们只知道它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我们却从来没有机会深入探寻那段历史背后的生死与血泪。杨桂老师的父亲是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想必没有几个人能比杨桂老师更加了解那段历史，没有几个人能比杨桂老师讲述的更加动人与震撼。

杨桂老师总结了抗日战争中士兵的“五不怕精神”：不怕苦、不怕饿、不怕累、不怕鬼、不怕死。他认为，没有这个“五不怕”的精神，是不敢参加抗日战争的，因为那场战争太残忍、太艰苦了。如果共产党的士兵们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视死如归的勇气，抗日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可是，尽管我们有着上下一心的团结、宁死不屈的坚毅，也仍然无法阻止日本军队丧心病狂的折磨与屠杀；

尽管我们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也依然无法弥补他们对无数中国百姓所造成的沉重创伤。

因为痛苦，所以奋发；因为耻辱，所以铭记。杨老曾撰写过一本书，详细地记录了日本军队对中国民众惨无人道的杀戮。其中一个例子是丰润县的大屠杀事件，在这场屠杀中，日军用武力强迫村民们集中起来，后用机枪对其进行惨绝人寰的扫射；还有一个是山西沁源县的例子，其中有190多人被日军抓起来，放在玉米地里烧，190余人全部被烧死，无一生还；同样是发生在沁源的屠杀事件，这次日本军将129个村民关在庙里，放火把他们活活烧死……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杨老则尽自己的努力将其一个一个的回忆并记录下来，这正是为了告诫我们：勿忘国耻！

杨桂老师还回想起一次北京电视台接受采访时的情形，记者问他：“您参加战争时害怕吗？”杨老果断回答：“不怕！”杨老回答中的坚决与果敢并不是来自于对战争的轻视，而是源自于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关怀。

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白天出去了晚上还不一定能回来，即使是晚上出去，一两个钟头后也未必能活着回来。而面

对死亡的威胁，杨老丝毫没有表现出畏惧的神色，这并不是因为杨老天生就具有过人的勇气，而在于他始终坚信一句话：“人活一世终要死，为国牺牲最光荣！”凭借着对祖国深沉的爱，杨老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之中。

作为战争年代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杨老得到了国家给予的许多学习、发展机会。凭借自身突出的学习能力，杨老更是过五关、斩六将，通过重重考核，最终来到北医，并以教授的身份继续为国家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为北医的发展倾注一生，做出了贡献。

九十余岁的杨老和我们谈起自己的青春年华时始终神采奕奕，坚定自信。虽然杨老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但可以感受到，杨老对于自己的一生没有太多的遗憾，至少他可以自豪地说，这艰辛却激昂的一生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也无愧于自己。

正是因为有了一大批像杨老这样坚定的革命者、实干家，中国才能够在忧外患之中站起来，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富起来，才能在21世纪的现在与未来强起来。没有杨桂老师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今天，也就不

会有中华民族的明天。

爱国、立志、求真、力行，这是老一辈人为我们留下的路标，也是老一辈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杨老用他的一生践行着这短短的八个字，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接过历史的火炬，点亮明天，点亮中国梦了！



